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研究综合读本

45 姚华诗书画赏析 刘 恒

黔路纪行

48 “牂牁要路”楠干子的桥梁 姜 清

黔中往事

50 唐玄宗开元投龙简曾藏身安顺记趣 杜应国

53 苟江红军空坟 周开德

沧桑留痕

55 平坝万华禅院与“高峰八景” 胡应铃

58 黄平“两州”三十二景 廖尚刚

64 红色朗洞尽朝晖 王世海 周年荣

人物春秋

68 郑珍与唐树义的画外深情 王珺偲

72 朱洪祚：“三湘英烈”血沃黔北 吕金华

封面 公馆桥 （姜 清 摄）

封三 《贵州文化遗产》征稿启事

“咸同起义”的历史画卷

文/图 巴 晏

过去，苗族没有文字，其历史主要依靠口头文学流传。自从发明蜡染、刺绣等手工艺术后，苗族妇女便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记载”于服装上。人说苗族服装是“穿在身上的文书”，十分贴切。苗族服装尤其是节日盛装，由刺绣、挑花、织锦、花带、蜡染、银饰等部件组成。其中，刺绣围腰分外醒目。时至今日，苗族村寨男女老少，依然酷爱佩戴围腰。

有论者认为，围腰是“服饰的鼻祖”。早在石器时代，原始人类就有以薄石片钻孔系于腰部前面当作“围腰”使用的，这在东北某地史前考古发掘中曾出土过。类似“石围腰”的“木围腰”，云南省博物馆亦有收藏，据称解放前夕甚至解放初期，某些少数民族妇女曾使用过。原始人类使用“石围腰”遮挡下身，重在于防护。后来，人们用“木围腰”遮挡下身，有遮羞用途。而苗族村民佩戴刺绣围腰，其功能已由实用品升华为装饰物。围腰功能的变化，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

苗族围腰的历史价值，远远不止于此。1985年，贵州文物工作者走村串寨“抢救民族文物”，在苗岭山区雷公山麓清水江畔苗寨，发现一条被人称为“欢呼张秀眉打胜仗”的围腰芯子和一条“庆贺张秀眉打

胜仗”的完整围腰。前者高66.5厘米，宽32厘米，以红、黄、绿、蓝4色丝线刺绣人物、腾龙、飞鸟、蝴蝶于白布上。上部刺绣一位男子和一位妇女，女子在左边男子在右边作“腾龙飞舞”状。下部刺绣男女青年及少年儿童，均作“欢呼跳跃”状。另有游龙、飞鸟、小猴、蝴蝶等吉祥物，亦作“欢乐雀跃”之形。后者为一完整女用围腰，通高71厘米，面宽56厘米核心部位以红、黄、



“庆贺张秀眉打胜仗”围腰

绿、蓝4色丝线刺绣人物、腾龙于白布上，构图类似前者。在围腰两侧的枣红缎面上，绣有鱼龙、莲花、飞鸟、蜻蜓等动植物，造型生动，气氛热烈，颇富感染力。由于当年条件有限，使用黑白胶卷拍摄，艺术效果不很理想。

张秀眉，苗族，清水江畔“台拱”（今台江县）人，苗名叫“雄播”，是“咸同苗民起义”的著名领袖。相传他为一家姓张的汉族大户当长工，跟着东家姓“张”了。苗岭山区苗族村民实行“父子连名制”。这是父系制度下父亲名字与儿子名字世代相连的一种命名制度。苗族村民使用的“父子连名制”，有人认为应称“子父连名制”，原因是儿子名字在前，父亲名字在后，祖父名字更后。这与彝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景颇族等使用的“父子连名制”不同。比如彝族女杰、被洪武皇帝赐封为“顺德夫人”的奢香，其丈夫名“翠”，公公名“霭”，故称“霭翠”。而苗族村民使用的“连名制”则与之相反。比如某人本名“西”，父名“里”，则称“西里”。若用三个音节称呼他，则需要加上祖父的名字“往”，称“西里往”。有位人称“路牛”的苗族村民，从其高祖到来孙，十代人，称

谓分别是：一、高祖：楼匈；二、曾祖：清楼；三、祖父：阿清；四、父亲：牛阿；五、本人：路牛；六、儿子：条路；七、孙子：占条；八、曾孙：你占；九、玄孙：勇你；十、来孙：金勇。

清咸丰初年，所谓“苗疆六厅”即今日贵州的雷山、台江、剑河、丹寨、榕江、三都一带，连年遭受大旱，复加虫灾为害，农民颗粒无收，但官府仍旧横征暴敛，导致苗民无法生存。咸丰五年（1855）三月十五日，张秀眉、杨大六、包大度等发起“展梅尼聚义”，率众揭竿而起。八月十三日，杨大六攻克丹江（今雷山）城，六年（1856）攻克凯里城。同年，又与张秀眉会攻台拱城。八年（1858）奇袭麻哈（今麻江）城，攻克都匀府，与敌巷战，胜利告终。九年（1859）进攻黄平旧州城，十年（1860）攻克平越（今福泉）城，十一年（1861）联合天柱侗族农民起义军领袖姜映芳进攻王寨（今锦屏）、天柱。同治元年（1862）转战丹江、台拱等地。六年（1867）汇合其他义军东下邛水（今三穗），进攻思州（今岑巩）、玉屏、青溪（今属镇远）等城镇。太平天国失败后，朝廷纠集湖南、广西、四川、云南数省兵力攻打苗族起义军。同治八年（1869），湘军进攻黄平，企图打通前往贵阳的湘黔驿道，包大度等在黄平“黄飘”地方设伏，聚歼湘军1.8万人，史称“黄飘大捷”。义军乘势占据平定、下司（麻江地界）一线，扼凯里、丹江要道。黔军提督张文德进犯八寨（今丹寨），杨大六等截击之，鏖战于“鸡贾河”，重创黔军。九年（1870）春夏之交，义军在都匀、麻哈一带活动，出击平越，断敌粮道。十年（1871）正月，杨大六率领丹江、凯里、八寨部分义军出麻哈，攻平越，经过贵定，冲入龙里县境，省城为之大惊。三月七日，清军攻陷丹江厅，杨大六等率军撤至雷公山。十一年（1872），张秀眉在乌鸦坡、乌东坡决战中被俘。杨大六奋力突围走。为解救张秀眉，杨大六率众冲杀乌东山，在陶窑陷入清军重



张秀眉雕像

围，不幸被俘。十三年（1874），张秀眉在长沙惨死于“点天灯”，杨大六在长沙惨死于“骑铜马”。

张秀眉、杨大六等领导的“咸同苗民起义”，是苗族近代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农民战争。苗族村民以各种不同方式缅怀英烈。一位义军将领的儿媳妇当年即着手刺绣反映“黄飘大捷”的衣服，惜未完工便离开了人世。“黄飘大捷”过后44年，即1913年，这位村妇的女儿，根据传说，接着刺绣，终于完成。她俩以大红丝线“平绣”作战情景，人物多达近百个。个头有大有小，似乎表示军阶。有的骑马，有的执矛，有的骑龙，头顶华盖，场面壮观。此件生动形象表现“黄飘大捷”的苗族服装，堪称“穿在身上的史书”，可作者及其后都不忍心穿戴。1985年，嫁到施秉县平寨村的第二位绣娘的外孙女“龙阿泡”，将其出让给贵州省“抢救民族文物”办公室。顺便交代一下，该室是1984年文化部和国家民委联合召开“全国民族文物工作会议”后，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由省文物主管部门牵头建立的。笔者时任文化厅文物处处长，受命兼理办公室主任，参与“抢救民族文物”工作，得以知晓一些故事。

实地访问得知，“欢呼张秀眉打胜仗”围腰芯子和“庆贺张秀眉打胜仗”围腰，刺绣于“咸同苗民起义”100周年的1955年。

历史不算太长，但有纪念意义，且刺绣工艺不错，已由“抢救民族文物”办公室移交给省博物馆收藏。此后不久，苗族人民为怀念英雄张秀眉，在其故乡台江为他雕塑了一尊巨大的站像。

在被当作“苗族村寨博物馆”对外开放的杨大六故里——雷山县郎德镇郎德上寨，完好地保留有杨大六故居，以及当年农

民起义军在寨子后山上修建的战壕、围墙等遗址遗迹。这些历史陈迹，如今成了文化旅游的重要景点，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的生动教材。

补充解释一下：“杨大六”不是英雄的本名，而是苗族民众对他的誉称。郎德上寨苗族村民深谙个中情形，乐用“杨大六”称呼自己的祖先。郎德上寨苗族村民本无姓氏，历来沿袭“父子连名制”。大概是官府为登记户口、征收赋税方便起见，给居住在郎德上寨的苗族村民“赐”姓陈。虽然如此，村民仍习惯使用苗名，只不过在对外交往中使用汉姓罢了。清咸丰五年（1855）春，屯兵到郎德上寨征粮，将交不起粮的一位苗族村民活活打死。死者侄儿一怒之下将屯兵击毙。他对大家说：“只有造反，才能生存！”这位血气方刚的苗族青年叫“腊略”，对外则称“陈腊略”。战斗中，他勇猛异常，吓得惊魂未定的清军向人询问：“这是谁？”但听苗民赞誉道：“羊打罗！”苗语“羊打罗”即汉语“雄死了”“勇敢极了”之意。清军不懂得苗语，误以为这位身先士卒的悍将名叫“杨大六”。于是，“杨大六”的名字便上了官方文件和官书，以致后来许多人只知道“杨大六”而不知道“陈腊略”。❶

（作者单位：原贵州省博物馆）



杨大六故居

推动文化与旅游 深度融合发展的研究

文 / 吕祥均

文化与旅游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在当今的大众旅游时代，文化和旅游更是密不可分，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成为旅游的核心资源，旅游成为文化的重要市场。没有文化的旅游没有活力，旅游没有文化就没有魅力，二者相辅相成，共生共荣。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这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和产业竞争力的重大举措；是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发展创新型经济，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文化产品和旅游创新催生新兴文化业态、带动就业、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文化消费需求的重要途径，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历史说话，让文物

说话，让文化说话，这对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的城镇、乡村滋养了独特丰富的建筑文化，农耕文化，刺绣文化，银饰文化，饮食文化，节日文化，歌舞文化，婚俗文化，礼仪文化，民间信仰禁忌文化等，无处不文化，而旅游具有融合性强，关联度高，综合性广，带动性大，就业机会多等特点。文化与工业融合，就可发展新型工业旅游；与农业融合，就可发展新型农业休闲观光游；与林业融合，就可发展新型森林养生游；与茶园、葡萄园，庄园融合，就可发展新型茶旅一体化，农旅一体化；与体育融合，就可发展新型山体户外运动体验游；与温泉融合，就可发展温泉浴养游等不同旅游项目。一将文化注入旅游的肌体，就激活了旅游新业态，延伸拓展出工业文化，农耕文化，历史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文化，茶文化，酒文化、饮食文化等不同质的文化旅游产业链，多点嫁接，连点成线，连线成片，各业在链条上共同起舞，舞出产业，舞出就业，让人民获得幸福感。

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在全球所有旅游活动中，由文化旅游拉动的占40%，在欧洲超过50%。为此，党中央、国务院作出文旅融合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这就充分说明

马头寨远眺
(何先龙 摄)



了，抓住了文化就抓住了价值取向，抓住了旅游就抓住了巨大的市场。文化资源为旅游发展提供了最深厚、最持久、最具魅力的元素，浓郁的文化性、民族性、地方性、区域性最符合旅游的本质特征，成为旅游发展的生命和灵魂所在。实施文化旅游资源永续利用，可持续发展战略，文旅融合是繁荣文化旅游产业的最佳选择。纵观历史，展望未来，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是一条文化富民、文化强国之路。

一、深刻把握政策导向，遵循发展新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就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揭示了文化和旅游的内在联系，阐明了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针对性，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文化使旅游的品质得到大幅度提升，旅游使文化得以广泛传播。文化显得更加富有活力，旅游也显得更加富有魅力。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宜融则融，能融尽融，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工作思路，找准文化和旅游工作的最大公约数、最佳连接点，推动文化和旅游在职能、资源、产业、市场、公共服务、对外开放等领域全方位、全产业、全天候深度融合，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协同并进，为文化建设和旅游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深入探索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协同性、共生性，旅游文化其特征是旅游行为的综合性、时间空间的延展性、景观意态的趣味性、旅游内容的丰富性，以及满足游客文化需求多样化的客观规定性，促使旅游业必须具有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文化形态。把两个领域的产业项目同步规划、同步申报、同步立项、同步建设，实施文化和旅游两个市场的共同培育和统一管理，打造一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唱响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有活力，有魅力的文化旅游企业和文化旅游品牌。

开阳县持续强化品牌建设，深刻把握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趋势，深入研究自身特色优势，用文化提升旅游品味，更好地传播民族文化，引导旅游消费需求，培塑旅游消费热点。禾丰农耕文化体验园、布依十三坊、水东文化陈列馆就是一个鲜活的文旅产品，在田园植入“农业嘉年华、祖国永远在心中，全面小康”等文化符号和元素，建设诗意田园。在十三坊里展示农村生产生活用具，开发具有浓郁风土人情的特色产品，促进乡村文化旅游业多样化、个性化、专业化发展，陈列馆展示水东土司文化历史溯源，明德广场展演地方歌舞戏剧，吸引了众多游人开展研学游，生态观光游，民俗风情体验游，一边观赏田园风光、乡村美景，一边体验农耕劳作、碾米、榨油、纺布、刺绣、蜡染等生产生活民族风情，还可骑行田园，穿越村寨，领略田园生活。沿河亲水纳凉，激情狂欢。峡谷漂流、回归自然，感受大自然之美。从单一生产功能向休闲观光、户外运动、农事体验、生产保护、文化传承等功能拓展，把更多文化内容、文化符号注入景区景点，讲好“有意义、有意思”的故事，让人们循着故事来、带着故事走。在城乡互动、文旅融合、独具魅力的旅游体验中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留得住乡情。创新性发展民族文化，农耕文化，创造性地转化为经济优势。

二、深化体制改革，提升文旅公共服务管理水平

文旅融合不仅是要思想理念、产业的融合，更是要在政府层面、企业层面和消费者层面的多层次融合，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建设，文化旅游市场管理曾存在多头管理、条块分割，部门壁垒，各机构权、责、利界定不清，造成文化旅游资源的闲置、浪费和破坏、甚而开发无序，低水平、近距离建设，建出的是次品，留下的是遗憾。对一个地方的文化旅游资源保护利用和

开发有着及其重大的影响。当今把文化与旅游两大领域并集，有效整合文化部门和旅游部门的职能，旨在解决当下存在的文化、旅游“两张皮”问题，增强文化和旅游的互补性、有机性，推动文化和旅游形成共同发展的格局，实现文化旅游两大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促使文旅部门切实履行文化旅游资源保护利用和开发的职能职责，研究制定保护利用的管理办法，科学编制保护利用和开发建设规划，扩大对外招商服务半径，精准招商。对投资开发商进行一系列的资格审核，如专业资格、资金能力、信用等级、经营绩效等进行考察考核，对文化企业、景区经营者以及景区内许可企业的条件、资质、选拔、约束及惩罚等细节问题参照国家法律法规进行明确规定.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经营风险，有效地避免国有资源的流失。使文化和旅游在融合中产生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充分发挥文化和旅游在要素、产业、市场层面的共性，全面提升区域文化旅游供给能力、服务质量和综合效益。

三、强化顶层设计，全力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毛泽东同志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只有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承担主体责任，把文化旅游产业作为县域经济支柱产业来培育，作为一个富民工程来培塑，精准把握方向定位，明确工作路径，细化工作步骤，才能实现确定的目标。成立文化旅游融合发展领导委员会，实施党委统



马头寨民居一瞥
(吕祥均 摄)

领，政府统筹，分管领导主管，业务部门主抓，相关部门配合抓。形成例会制度，调度工作进程，分析研究工作对策，破解工作中的难点，打通堵点，一个方案一个方案地实施，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破解，一个节点一个地打造，有序有力有效推进工作进程。制定《关于加快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实施意见》，梳理工作清单，罗列部门责任清单，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着落，科学指导工程实施建设，形成一个部门启动，多部门联动的工作格局，旅游发展到哪里，文化就跟进在哪里，项目资金捆绑使用，联合项目，整合资金、聚合人力，项目走向不乱，资金流向不乱，人员去向不乱，独唱合成合唱，合拍合音，声音更加响亮，产生叠加放大效应。实行规划一张图，统筹一盘棋，管理一条龙，审核一支笔，资金一个口，规范项目管理，符合财经纪律，打造一个特色产品，带动一片群众，引领一方经济，致富一方百姓，提高地方税收贡献率，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最大化。

四、提升规划设计，引领全域旅游发展

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和地域特色，高起点规划、高标准设计，高质量打造“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旅游精品，构建旅游发展新业态，推动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文旅融合不是简单的叠加，旅游是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活动，既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追求，既是一种体验活动，又是一种文化领略。当旅游产品具有独特审美趣味时，才能成为消费者的追求，旅游目的地是消费者的主战场，赋予旅游产品什么样的审美趣味，取决于文化创意水准高低以及创意对文化资源开发的贡献多少。坚持科学规划、突出保护，古为今用、强化传承，优化布局、合理利用的基本原则，推动形成文化旅游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新模式。邀请有情怀、有实力、有能力、有经验的规划编制单位实地考察文

化旅游资源，挖掘文化资源，实施多家比选，思想碰撞，优化方案，科学编制全域旅游发展规划，经得起社会认可和实践检验，让文化资源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最丰富、最深厚、最具魅力的元素，充分运用先进技术挖掘、保护、传承和开发有形文化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通资源壁垒，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新动能。

五、提升服务功能，统筹推进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上，文化和旅游一向各有侧重，前者主要是本地居民，后者主要是外来游客。随着全域旅游发展的推进，二者的分界开始打破，文化和旅游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融合势在必行。特别是城市文化广场、博物馆、展示馆、文化馆和游览、娱乐、购物区域，乡村民族文化表演场，农耕文化体验园、非遗传习所等要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规划、建设的过程中充分考虑旅游的需要。场、馆、所、园既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阵地，又是旅游发展的重要载体。先从人员密集的场、馆、所、园等公共文化设施入手，增加、完善其旅游服务功能，将旅游“厕所革命”纳入公共文化建设，推动公共文化设施和旅游景区的厕所同标准规划、建设、管理，将更多文物保护单位、博物馆、文化馆、传统村落和非遗传习场所纳入旅游线路。充分发挥公共文化事业引领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涵养公共文化事业的作用。让游人享受高效、便捷、多样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切实增强广大游人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六、弘扬民族文化，加强文化对外交流与合作

文化的积淀成为历史，历史的活动成为文化，旅游是传播文化的载体，开阳县持续实施“文化兴县”发展战略，“以文化提升旅游品质，以旅游促进文化传播”为目

标，探索文化交流项目和旅游活动融合新途径。对文化和旅游的外宣资源进行整合，构建立体化、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宣传体系。文化馆、文化旅游企业联合持续开展“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送文化、送政策、送科技进乡镇（社区）村寨、入景区、学校、军营，扎根基层，贴近人民、贴近生活。倡导城镇（社区）乡村适时开展节庆事节庆活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唱响“水东硒州，诗画开阳”名片。通过“旅游引进来”，实现“文化走出去”，深化探索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模式，成立贵州开阳水东文化研究会，召开“水东文化”研讨论坛，邀请热爱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研究开阳地域文化，将研究成果广泛传播，提升地域文化品牌。积极参加文博会、农博会、旅交会等推介活动，以文化艺术演出、非遗展演、影视展播的形式传播文化。文化馆馆长何先龙同志深入研究“水东文化”，出版《千年水东》和《土司制度论稿》等专著，撰写论文50多篇，分别应中国明史学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委会等邀请参加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研究视角独特，有丰厚的水东文化意蕴。还应邀参与编撰国家重大社科招标项目《中国土司制度通史》。吸引着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不懈地探索、研究，也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旅游者来此考察、研究、参观，大幅度提高了“水东硒州、诗画开阳”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实现了生态保护、业态发展、活态传承。2019年接待旅客2350.49万人次，同比增长26.11%，旅游总收入18569亿元，同比增长28.26%。同时，重点建设一批文化旅游景区和乡村旅游示范点及星级茶（楼）馆，保护开发一批文化旅游名镇名村，推出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打造文化旅游品牌。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节庆赛事和旅游推介及人文交流活动，讲好当地人文历史故事、传播文明、交流文化，促进文化旅游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文

（作者单位：开阳县文化和旅游局）

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实践

——以三穗县杨至成将军纪念馆为例

文 / 耿秀福

三穗县杨至成将军纪念馆是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命名的第六批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何保持这一荣誉称号，一直是摆在三穗县杨至成将军纪念馆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立足三穗县杨至成将军纪念馆工作实践，从如何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何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管理，如何打造提档升级全新环境等方面进行探索，重点阐述了杨至成将军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背景情况，建设管理中积极的探索实践工作。

一、背景

十九大报告强调：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加强爱国主

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三穗县杨至成将军纪念馆是第六批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先后获得贵州省全国防教育基地；全国第三批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单位；黔东南州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中国人民解放军九六二〇一部队红色教育基地；黔东南州直属机关党员教育基地；贵州省直属机关党员教育基地；黔东南州公安消防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基地；2018年8月，省委、省政府将杨至成将军纪念馆命名为第六批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多年来，三穗县杨至成将军纪念馆在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做了扎实有效的探索实践，坚持弘扬将军精神、弘扬光荣传统、展示新时期杨至成将军纪念馆形象，当好标杆旗帜，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

二、探索实践

（一）定责任勇担当，建设工作高效的教育基地

按照“因事设岗，人岗相适”的原则，合理设置工作岗位。根据杨至成将军纪念馆的职能合理设置岗位，结合岗位特点职责选择适合岗位的人才，保证各类人才都能在适合的岗位发挥作用，为纪念馆事业长期、健康发

杨至成将军纪念馆



展提供支撑。按照岗位工作性质,在征求员工意见及建议的基础上,建立符合岗位特点的责任制,签定责任书,促推岗位责任落实。同时建立层层负责,层层抓落实,明确责任范围和权限。在人员编制不足的情况下,结合纪念馆工作情况,设置讲解员、藏品管理员、安保人员、保洁员、管理人员等工作岗位,2019年新招聘1名讲解员,落实1名见习生充实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队伍。为进一步明确工作责任,提升工作效率,县文体广电旅游局与纪念馆,纪念馆与讲解员、藏品管理员、安保人员、保洁员签订目标责任书,层层落实责任,明确工作任务,确保纪念馆各项工作有序推进。目前,三穗县杨至成将军纪念馆编制3名,各类工作人员8人(临聘人员7人),其中,馆长1名、讲解员4人(含见习生1人)、安保人员2人、保洁员1人,并签定劳动合同。通过精细化管理落实工作责任,管理服务水平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大幅提升,实现重大接待零失误、日常接待零投诉。

(二) 重消防强安保,建设安全稳定的教育基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安全稳定工作连着千家万户,宁可百日紧,不可一日松。面对公共安全事故,不能止于追责,还必须梳理背后的共性问题,做到一方出事故、多方受教育,一地有隐患、全国受警示。杨至成将军纪念馆作为第六批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同时作为全国第三批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单位,其自身收藏管理有二级文物、三级文物,以及其它文物资料图片等,消防安全工作尤为重要。多年来,杨至成将军纪念馆一直强化消防安全管理,扎实抓好消防安全工作。

1.加强安全教育,做到警钟长鸣。定期和不定期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教育,通过组织全体职工参加学习会议,学习消防安全相关文件精神,案例通报,法规政策等,提高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体职工消防安全意识。邀请贵州安民消防安全咨询服务中心等机构开展消防知识业务培训,学习培训消防设施设备操作技能、消防事故案例、消防知识、消防法律法规

等,通过案例警醒、案例学习达到学习培训的目的。

2.强化安全责任,抓好安全检查。纪念馆与安保人员签定安全工作目标责任书,严格安保人员交接班管理和相关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制作《文物藏品安全检查表》《文物展品安全检查表》《内外环境巡检登记表》《安保人员交接班登记表》《消防安全设施检查表》《文物出库归还登记表》等表格,安保人员定期和不定期对消防安全设施设备、视频监控系统、展柜、承重构件及其它设备、文物展品、内外环境、藏品库房等进行检查,认真填写相关表格,一旦发现问题及时妥善处理并按要求报送。

3.完善消防设施,开展应急演练。为提高纪念馆消防安全管理能力,2016年,安装杨至成将军纪念馆视频监控系统,配置摄像头、监控电视墙、存储设备等,大大提高纪念馆安全防控监管能力。2017年,将纪念馆展厅的所有灯光全部更换成环保节能、低热安全、使用寿命长的LED光源,进一步降低自身设备带来的消防安全风险。2018年,安装消防供水设施,配备消防箱、消防消水带等消防设施。2019年,根据我县文博单位实际,为杨至成将军纪念馆等文博单位安装智慧用电管理系统,并组织纪念馆工作人员与全县文化旅游系统全体人员开展消防安全应急演练,有效提高消防安全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

(三) 抓宣教传文化,建设服务优良的教育基地

1.日常工作不放松,参观人数保稳定。杨至成将军纪念馆坚持全年天天开馆,认真落实参观登记制度。近三年来,约36万人次到杨至成将军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参观活动。

2.搭建平台寻合作,宣教工作有推进。除开展日常散客接待、承接团队接待以外。杨至成将军纪念馆利用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贵州省全民国防教育基地、贵州省直属机关党员教育基地、黔东南州红色文化教育基地、黔东南州直属机关党员教育基地等金字招牌积极与县委组织部、国税局、县教育局、县

城关一小等机关单位形成合作机制，将杨至成将军纪念馆拓展为教育课堂开展“基层党员学将军”“学习将军精神，为国征税聚财”“开学第一课在这里”等活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17年，开通杨至成将军纪念馆公众号，纪念馆工作人员实时发布馆内动态，为广大游客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杨至成将军纪念馆、杨至成将军事迹的服务平台，进一步优化了文化服务、丰富了杨至成将军纪念馆红色文化教育宣传模式。

3.抓好重大接待，传播将军精神。2017年，圆满完成省、州领导等调研、参观接待10余次，“七一”、“八一”等主题参观接待60余场次。2019年，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县内外各部门纷纷到杨至成将军纪念馆开展革命传统教育，9月至10月接待参观团队240余个，全年接待参观团队565个。进一步宣传了将军精神，让将军精神跨行业、跨地域、跨文化交流，声名远播。

4.健全规章制度，细化管理措施。为加强和规范杨至成将军纪念馆的管理，充分发挥纪念馆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功能，建立健全了考勤管理、安全管理、安保人员管理、讲解员管理、保洁员管理、交接班管理、文物藏品管理等制度，并上墙公示，进一步规范了杨至成将军纪念馆的管理工作。

（四）抓硬件优环境，打造提档升级全新环境

没有好的硬环境，就难以满足不同观众的需求，服务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2003年建成开馆时，纪念馆正房三间为杨至成将军生平事迹展，厢房两间为三穗县建国以来的成就展。由于纪念馆总体面积小，原陈列主题和内容较多，用于展示杨至成将军生平事迹的比例较小，为此，2012年，县委、县政府决定对杨至成将军纪念馆重新布展，集中展示杨至成将军生平事迹，同时完善部分基础设施和服务配套设施，免费开放水平大幅提升。

纪念馆重新布展后，将杨至成将军生平事迹分成六个部分进行展示，第一部分“寻求救国真理，走上革命道路”；第二部分“参加

南昌起义，红旗跃上井冈”；第三部分“开创后勤局面，保卫红色苏区”；第四部分“长征路上筹粮，陕北会师赴苏”；第五部分“建立东北后勤，保障前线供给”；第六部分“建立中南军需，建国再立新功”。目前，纪念馆有陈列厅、保卫室、游客服务中心、旅客休息区等，环境绿化约400平方米，陈列厅采用文物、实物、图片、资料、半景画、缩微场景，以及声光电等方式集中展示将军生平事迹。展陈提升布展并完善基础服务设施后，纪念馆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2017年，杨至成将军纪念馆对各展厅的墙纸进行翻新，重新更换了所有展厅内的墙纸，让整个展厅面貌焕然一新。并修建管理库房，对无处安放的清扫工具及各种杂物进行归整，给参观群众创造一个整洁、干净的参观环境。同时配备各种办公设施设备，大大提高了纪念馆的工作效率。

三、结语

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人民群众是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主体。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示的是一段丰富的历史，像一部生动的教科书，弘扬爱国主义，就是要让人们从历史的财富中寻找源头，从社会的进步中汲取力量，从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中获得启示。三穗县杨至成将军纪念馆在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中进行了积极的有益的探索实践，不但强化自身建设管理，同时注重利用省州授予的各种金字招牌，与县内单位建立合作机制，共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坚持弘扬将军精神、弘扬光荣传统、展示新时期杨至成将军纪念馆形象，发挥着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❶

（作者单位：三穗县文体广电旅游局）

六枝特区三线建设 工业遗存的保护与利用

文 / 图 杨荣建

“三线建设”作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大调整，建设的重点在祖国的西南、西北。六盘水地处贵州西部，自然环境有利于备战，蕴藏丰富的炼焦煤和动力煤，作为攀枝花钢铁基地的煤炭供应基地，六盘水煤炭、建材基地建设是全国“三线建设”战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六枝特区作为“三线建设”时期的重要矿区和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驻地，至今还留下很多煤矿遗址、附属设施、机器设备、职工家属区等工业遗存。六枝特区“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遗存，有些已经消失；部分功能延续，继续使用或已改变用途；剩下的多面临拆除、重建或改造等问题。如何保护和利用六枝特区工业遗存，留住这段历史的见证，正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

一、六枝特区的三线建设

六枝为古地名，是对区域苗族分布的描述。清爱必达《黔南识略》所藏：康熙二十六年设县时，编六所为永丰、隆盛二里。五十五年，又裁西堡长官司，以其地入县。……凡屯军所住曰所，苗所住曰枝。县有内、外十二枝：波堕、利笼、补止、落

东、马那穹及内戛卧等，为内六枝；蜡柳、戛底、大弄、底冈、那史、外戛卧则为外六枝。这是“枝”的由来及“六枝”的最早记载，也是对旧时少数民族分布的描述。内六枝地名今多沿用，外六枝地名略有改变，个别地名现仅流传于老辈人口中；内、外六枝地域范围多在今六枝特区行政区划内：“大弄枝”在今六枝特区大用镇范围内，“底冈枝”即为今木岗镇抵岗村。六枝特区因“三线建设”而得名。1966年2月22日，六枝矿区改为特区，1970年12月2日，六枝特区与郎岱县合并为六枝特区，归六盘水地区管辖，行使县一级职权，现为中国唯一以“特区”命名的县级行政区划。

在“三线建设”战略提出之前，“六盘水市”还未成为一个统一的行政区划，实际指的是贵州省安顺地区的郎岱县、兴义地区的盘县、毕节地区的水城县。1967年，“六盘水”始成为一个行政区划；1978年12月18日，“六盘水”地区改设为省辖市。六盘水有着丰富的煤炭资源，被誉为中国的“西南煤都”；多山和复杂的地形地貌符合三线建设“分散、靠山、隐蔽”的战略方针；市境是东部地区进入云南乃至东南亚的主要通道，六枝境内的安水盐道是永岸口岸川盐在黔集散的要道；境内打铁关是滇黔古驿道上

的重要关隘，自古为“云贵襟喉”，清同治十年（1871），郎岱厅司马喻怀信在此镌刻“岩疆锁钥”四字。突出的资源和区位优势，使六盘水在“三线建设”战略提出不久，就进入国家最高决策层的视野，六盘水市是因三线建设而兴起的城市，六枝特区是因三线建设而兴建的特区，没有“三线建设”就没有现在的六枝特区。

“三线建设”战略提出不久，六盘水就被确定为煤矿建设基地，六盘水的三线建设是与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相互配套的重点项目。1965年1月，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在六枝下营盘设立，六盘水煤矿建设在六枝矿区拉开序幕。时称展开“一个战役、四个战场”的会战，即：续建六枝煤矿、修建轻便铁路“六枝矿至地宗矿”和准轨铁路“六枝火车站至地宗矿”隧道、新建地宗筛分厂，四项工程均在当年国庆节前如期竣工。1965年11月23、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到贵昆线将竣工的关寨铁路工地考察、到六枝矿区视察，邓小平为关寨车站题写站名、在地宗矿一个未建成的澡堂召开汇报会、为矿区工人解决吃蔬菜的难题，中央领导人的到来给六枝矿区广大职工以极大鼓励。

（一）六枝矿区的矿井建设

三线建设开始后，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确定六枝矿区新开工、复工矿井4对、小井5处，共增加原煤生产能力40万吨/年。建设的矿井有7个：凉水井矿井、六枝矿井、地宗矿井、大用矿井、四角田矿井、木岗矿井、化处矿井。

（二）矿区地面建筑项目建设

三线建设时期六枝矿区的地面建筑项目共有8个：地宗筛分厂、地宗选煤厂、凉水井洗煤厂、板梅电厂、六枝电厂、六枝矿务局机修厂、那玉砖瓦厂、马老箐石棉砖厂。

（三）其他工程项目建设

六枝特区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遗存包括：交通运输铁路、小型附属厂、文教卫生设施、矿区公用工程、设施设备、生产矿井、职工家属住宅（勾连塔式样的屋面）等7大类。

二、六枝特区三线建设工业遗存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工业遗产是指工业文明的遗存，经长期使用、保存之后，由于观念转变，其中的一些物质方面的结构与建筑和非物质形态的工

六枝矿工友之家



艺流程、生产技能等，因各种原因，成为被观赏、欣赏的对象，被认为是值得保存的东西。六枝特区三线建设工业遗存包括地面建筑、机械、车间、工厂、选矿场和矿区、货栈仓库，生产、输送和利用的场所，运输工具及基础设施，与工业生产相关的社会活动场所等。

（一）六枝特区三线建设工业遗存现状

六枝特区三线建设工业遗存有：六枝矿俱乐部（又名六枝矿工友之家，六枝矿区最早的俱乐部，苏式建筑）、六枝特区工矿集团办公楼（建于1968年）、地宗矿遗址（三线建设时期，六枝矿区第一口矿井；包括地宗筛分厂、地宗选煤厂等附属设施）、大用矿矿井、六枝矿矿井、大用矿工人之家、六枝工矿集团总仓库（含月台、库房、采煤机械等）、关寨1、2号隧道及关寨站（邓小平题写站名）、补林大桥（地宗矿至四角田矿的运输专线）、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遗址、六枝煤矿建设指挥部遗址等。

关寨站隧道、大用煤矿旧址、地宗矿遗址为六枝特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六枝地宗矿矿井、关寨火车站为贵州省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根据六枝特区党委政府工作安排，贵州省益正开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六枝记忆·三线建设产业园（“六枝记忆”三线建设博物馆）建设工作，六枝记忆·三线建设产业园（“六枝记忆”三线建设博物馆）位于地宗洗煤厂厂区内，建筑面积3230平方米，主要是征集、典藏、陈列六枝特区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遗存，是研究特区三线建设时期物事的场所，目前已征集到历史照片1000余张、相关实物2500余件、艺术品37件。

（二）六枝特区三线建设工业遗存面临的问题

六枝特区“三线建设”时期的工业遗存种类丰富、数量巨大。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除还在延续使用的生产实践设施外，很多工业遗存未得到充分的重视，蕴藏于其中的价值未得到充分认识；同时，由于自身禀

赋与周边环境的巨大差异，很多遗存被认为是工业废弃物，随着时间的流逝，各处遗存的现状千差万别，更为复杂。

一是工业遗存保护意识薄弱。六枝有着长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人们的传统思维中，文化遗产往往都是“古”、“老”、“旧”的东西。相对于郎岱古城、岩脚古镇的古建筑，六枝三线工业遗存多为现代产物；其代表的是技术过时的产业，历经时代淘汰的机械设备，因而人们往往不将工业遗存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联系在一起；不少人甚至对工业遗存有污染严重、有碍观瞻、技术落后、急需退出历史舞台的错误认识。认识的不到位、保护意识与发展理念的匮乏，一些工业遗存在不知不觉中消失。

二是工业遗存保护欠缺法律保障体系。工业遗存保护涉及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城乡建设规划，在城市化建设进程中，保护与建设的矛盾时常出现。已经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可按照《文物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实施保护；功能延续的遗存，继续发挥着其原有的作用；更多的遗存处于自然放置状态，由于缺少法律体系的保障，很多遗存面临着被遗弃、拆除的命运。六枝特区的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六枝煤矿建设指挥部已成为过去。

三是工业遗存的保护资金投入不足。资源型城市资源枯竭后，经济转型发展过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困境。工业遗存的保护缺乏有力措施，工业遗产资源的开发模式、历史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认识有待提高，工业遗存的存续、开发、利用与保护需要国家、地方、企业投入大量资金。基于思想认识不到位、保护意识薄弱、欠缺法律保障、地方经济基础差的现状，六枝特区工业遗产存续存在较大的资金缺口。

三、六枝特区三线建设工业遗存的保护与利用

工业遗存保护利用任重道远，六枝特区四

个“一”留住三线建设记忆，留住特区的根。

（一）申报公布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三条的规定，将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社会价值的工业遗存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或认定为可移动文物加以保护，有利于六枝特区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保存。2012年2月13日，关寨站隧道、地宗矿遗址、大用煤矿旧址由六枝特区人民政府公布为六枝特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2018年7月31日，六枝关寨火车站、六枝地宗矿井由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为贵州省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关寨站是贵昆线六枝至树舍段上的一个四等小站，是国家领导人视察六盘水三线建设的第一站。1965年11月23、2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到贵昆线将竣工的关寨铁路工地考察，为关寨车站题写站名，为全国仅有。邓小平视察六枝矿区时，其三弟邓肃初任六枝县委副书记。邓肃初，邓小平胞弟，比邓小平小9岁，曾用名邓蜀平、邓徐初、徐初，1913年11月生，1950年5月在重庆加入西南革大总校，参加革命工作，历任贵州省普安县青山镇镇长、普安县财政科副科长，安顺县财政局局长，六枝市（县）副市（县）长，贵州省政协委员。1967年3月16日凌晨，客死六枝，其墓现为六枝特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地宗矿矿井为三线建设时期六枝矿区

第一口矿井，地宗筛分厂、地宗选煤厂为“一个战役、四个战场”会战的重要项目，也是国家领导人视察的重点工程。1965年12月，大用煤矿向西南煤矿建设指挥部提交《六枝特区大用井田煤矿地质勘探报告》，作为建井设计依据；1967年1月12日，大用矿井主平硐发生瓦斯突出事故，98人遇难；1971年10月12日，六盘水地区第一个瓦斯抽放站在大用矿建成。大用矿为六枝特区煤炭工业的发展做出过贡献，为研究六枝特区三线建设历史提供科学依据。

（二）申请认定一批工业遗产名单

2018年11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了《国家工业遗产管理暂行办法》；2019年12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第三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工信部产业函〔2019〕403号），六枝矿区在列。六枝特区国家工业遗产名单包括：地宗选煤厂原（精）煤运输走廊，装（卸）煤仓，洗选车间，地宗煤矿主井硐，职工澡堂；六枝煤矿主副井硐，四角田煤矿主井硐，生产连（区）队办公区，矿锻工房，筒子楼，职工干打垒成片住房，职工大食堂，苏式办公楼与礼堂；地宗铁路专用线及补林大桥，物资总仓库木架构站台，火工品库，六枝电厂老厂房1栋，六枝电厂除尘设施等。

（三）开发利用一批工业遗存

十集大型文献纪录片《大三线》拍摄期间，其镜头对准六枝特区的三线建设群体、

地宗洗煤场



三线建设工业遗存，通过普通人的故事反映大时代的变迁，反映六枝特区这一段不平凡的历史；通过亲历者口述，忠实记录三线建设者对于祖国忠诚奉献的高尚情怀和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大三线》的播出，六枝特区对三线建设这段历史的研究热度不减，对六枝三线建设工业遗产的保护力度不减。六枝特区成片分布的工业遗存，将集中开发、利用、保护；废置、不存在安全隐患且规模较大的工业建筑，在保存其原貌的基础上，将开发做他用；成片的职工家属住宅，将开发做主题酒店；着重打造六枝的三线文化，设立博物馆，留住六枝的三线建设记忆，留住南下干部职工的“乡愁”；发展影视旅游，利用现有遗存，继续拍摄具有那一时期时代元素的电视、电影。六枝特区从发展煤炭工业到发展文化产业、旅游业，三线遗存是过度的桥梁，也是必然的趋势。

（四）设立一个专题性博物馆

三线建设工业遗存保护是贵州省“十三五”期间的重要文物工程。《博物馆管理办法》规定：博物馆的数量、种类、规模以及布局，应当根据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水平、文物等资源条件和公众精神文化需求，统筹兼顾，优化配置。鼓励优先设立填补博物馆门类空白和体现行业特性、区域特点的专题性博物馆。六枝特区设立“六枝记忆”三线建设博物馆是必然的。

“六枝记忆”三线建设博物馆设计之初，即划分陈列展览、藏品库房、文物保护技术区、公众服务区和办公区等功能区；藏品征集严格按照《近现代文物征集参考范围》的规定来实施，同时做好已征集到的历史照片、相关实物、艺术品的认定工作；完善博物馆设立的相关条件后，将向社会开放。

六枝特区是一座因“三线建设”而兴的城市，三线建设历史是六枝的根、三线建设精神是六枝的魂，记录这段不平凡的历史，保护、传承、宣扬好六枝特区三线建设工业遗产，从遗产中感悟和增强六枝特区的文化自信。^①

（作者单位：六盘水市六枝特区文体广电旅游局）

参考文献：

[1] 薛林平.建筑遗产保护概论.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 6.



六枝矿职工家属区

遵义汇川红军标语及其保护利用

文 / 卢 训

汇川区位于贵州省遵义市中心城区北部，处在黔北山原向黔中丘陵过渡地带，是重庆经济圈与贵阳经济圈辐射交会的中心区域。2004年6月8日，汇川区挂牌成立，与遵义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员”的运行机制。2016年5月14日，遵义县^[1]松林、毛石、沙湾、山盆和芝麻等划转至汇川区，形成8镇6街道的格局^[2]。1934年前后，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湘江失利后，中央红军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1935年1月4日~7日，红军突破乌江，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并在此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随之采用了毛泽东运动战的主张，取得了娄山关战斗和四渡赤水等胜利。1935年3月31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中央红军在遵义历时3月有余，共歼灭和击溃敌人四个师、两个旅另十个团，俘敌3600余人^[3]，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在此期间，中央红军留下了众多文化遗存，包括战斗遗址、宿营地、渡口、文献、标语和武器装备等。据不完全统计，遵义迄今共发现各类红军遗址200余处，标语350余条^[4]。红军标语是红军长征中的“第二武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值得探

讨与研究。

一、汇川红军标语概况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家的号召下，各级党委、政府先后组织了三次不可移动文物普查和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基本摸清了文物的整体家底。汇川区经数次普查，先后在高坪镇与泗渡镇等地发现红军标语，现就有关情况简述如下。

观坝红军标语^[5]，位于汇川区泗渡镇观坝村郑家福、毛成华及刘太云堂屋、吕天清家照壁上，共9幅20余条，面积达7.84平方米。该处的红军标语基本是墨书在木质房屋建筑构件或泥夹壁（用泥加石灰、竹条筑成）上，部分有落款，文字有些被湮灭、磨泐。这些红军标语基本无安防、消防等措施，且受人为与自然因素的影响，病害发育明显，亟待进行处理与维护。

高坪红军标语^[6]，最初位于高坪镇新街范西林和王正义家民房上，是拆旧建新时发现，标语书写在两块木质面壁上，共2条，长1.86米，宽0.81米，无落款，横向墨书。因发现时附属物已毁，考虑到标语的安全及价值，遂征集收藏至遵义县文管所进行保护与展示等。

董公寺红军标语^[7]，位于董公寺镇和平村田坝村民组，现存标语13幅，其他情况不详。

板桥红军标语^[8]，位于娄山关村长征组葛仕桥家房屋板壁与板桥集市杨天纪家房屋板壁上。另据当地人回忆，在板桥洋房子板壁、板桥小学侧面墙壁以及柏杨村和平组（泥巴墙）后水河边岩石上均有红军标语。现存标语4幅，其他情况不详。

二、汇川区红军标语内容

截至目前，汇川区共发现红军标语4处，多数墨书在建筑构件上，字体亦不讲究，或许与长征战况及指战人员教育水平有关，但不论怎样，这些标语在瓦解白军，夺取白军士兵、播散革命火种和开拓民智上发挥过一定的作用。这批红军标语基本是《关于各部队立即动员遍写标语的命令》颁布前后所书，涉及红军长征中的许多政策、措施等。为有效了解这些政策和措施，选录部分标语分类进行概述：

一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如“武装保护苏维埃”“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二是宣传工农红军的性质和宗旨，如“红军公买公卖，红军不拉夫，不抓兵，不派粮草”“反对白军拉夫”“红军公买公卖”“红军不拉夫，反对白军拉夫”“红军是帮助工人农民的，白军是帮助土豪劣绅的；不当白军，当红军去；红军是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白军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不当白军，当红军去”“红军到，干人笑，绅粮叫；白军到，绅粮笑，干人叫。要使干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弟兄拖枪炮，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红军是帮助工人农民的，白军是帮助土豪劣绅的。不当白军当红军去！红军官长对士兵又和气又亲热，白军官长对士兵又打又骂。杀死白军官长当红军去妙、妙、妙！白军弟兄和红军联合起来，

打倒吴奇伟，薛岳与周浑元！（或刘湘、王家烈，看地区决定）反对白军官长克扣，要发饷，要发□！”“红军是帮助干人的军队，当红军去帮助工人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是自己的军队”。

三是策反国民党士兵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如“不打白军的红军北上抗日去”“白军弟兄们拖枪到红军中来抗日救国去”“白军弟兄暴动起来杀死反动□□□”。

四是宣传建立革命根据地，如“创造云贵川新苏区”。

五是策反国民党士兵，如“白军弟兄不打红军的回家”“白军弟兄组织士兵会要求言论结社集会的自由”“白军弟兄□变到红军中来”。

六是号召民众起来打土豪，如“消灭地主武装”。

七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消除赋税，如“首先消灭王家烈的军队”“消灭一切苛捐杂税”“打倒抽收苛捐杂税的王家烈”“打到贵阳去，活捉王家烈”“打到强迫□□□做工事的王家烈”“官僚军阀面团团，害得穷人没裤穿；打倒吴奇伟薛岳周浑元，（或刘湘、王家烈，看底盘决定）太平世界在今年；帮助红军打平天下，工人农民一齐去”“反对王家烈强迫民众修马路”。

八是其他，如“白军士兵□□□□□，会□算清钱饷”“农民武装□□□□□□”“红军□□□□□□□”。

通过分类概述，不仅使宣传内容更为直观，内涵更具多重性，如“红军是帮助工人农民的，白军是帮助土豪劣绅的；不当白军，当红军去；红军是打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白军是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不当白军，当红军去”，通过对比方式，既宣传了工农红军的性质和宗旨、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又淋漓尽致展现了白军的丑恶，积极倡导工农当红军。长征过程中随着所处地区与时局的变化，其红军标语内容亦有不同，如红军过汇川时，就尤为侧重对红军性质和宗旨、策反国民党士兵与反对日本帝国

主义和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消除赋税的宣传，这点从标语数量上可以印证。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如台江平兆场发现的“红军是推翻国民党军阀统治的唯一武装力量，欢迎苗族兄弟加入红军。^[9]”其宣传重点则主要针对少数民族群众。红军标语落款意义重大，不容小觑，通过对落款的分析，或许能大致了解红军过汇川时的部队与建制等，而部队为了军事上的需要，隐蔽了部队原来的番号，严令各部队机关一律用代名，且经常变换^[10]。汇川区红军标语落款可分为无款和有款两类，其款识包括何治国、红军宣、红军、红色警宣和红□□□等，多数为“通用款”，基本无法查证部队建制与军事部署等。这批红军标语中，有一条值得重点关注，为泗渡青年何治国所书^[11]，说明红军当时的宣传是富有成效的，不然民众不会自愿参与标语书写和宣传。另外，通过分类不难发现部分标语由于受人为和自然因素的影响，已不同程度存在粉化、空鼓、褪色、泛碱、剥落和霉变等病害，甚至有扩张或者灭失的风险。

三、红军标语的保护与利用

汇川红军标语是我党在长征过程中政治宣传的重要形式和实物见证，是一笔珍贵的红色文献和文化遗产，被称为见证中国革命历史的“活化石”。红军标语蕴涵着中国共产的执政纲领、宗旨性质和政治主张，真实客观记录了红军征战历程和历史足迹，并在鼓舞军心、团结民心 and 播撒红色基因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因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让后世能切身感悟这段历史，进而实现铭记历史沧桑，看见岁月留痕，留住文化根脉之目的。针对于此，提出如下保护利用建议，盼能促进汇川红军长征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一）充分调研，确定保护策略

就汇川红军标语保存状态而言，有馆内和馆外两种形式，其中馆内标语藏于遵义

县文管所，在此不作赘述。馆外红军标语多数附着在建筑物与构筑物上，其建筑物与构筑物的保护情况直接决定了红军标语的保护状况，因而加强建筑物与构筑物申报文物保护单位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获取更多专项资金的支持有效途径。如广西河池红军标语楼，现存红军标语55条，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获国家文物局专项资金实施防雷工程，有效改善了红军标语的保存环境。汇川红军标语历经岁月沧桑，已存在粉化、空鼓、褪色、泛碱、剥落和霉变等病害，情况不容乐观，区分轻重缓急实施抢险加固工程或保养维护工程已迫在眉睫。花溪区针对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高坡红军标语开展的防风化加固工程^[12]，解决了风化脱落、雨水冲刷、风化裂隙、表面污染和开裂等病害对红军标语的威胁，这点值得借鉴与学习。在解决病害后，如能持续开展安防与监测等工作，或将对标语的保护与维修提供参考。鉴于前述标语病害，完善文物保护单位“四有”档案亦刻不容缓。红军标语是文物保护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物保护单位确立和提档的有力支撑，收集、提取红军标语的有关信息，包括GPS采集、拍照、录像、三维建模和文字抄录等，对标语提档、展示与利用等均有助益。另外，应借助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契机，提升红色文化资源的级别，并力争进入省、市建设保护规划，争取各类保护传承工程实施，由此促进汇川红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长远发展。

（二）强化研究，创新展示手段

汇川红军标语自发现以来，仅有部分论著对其现状、内容进行简要概述，基本未开展深入、细致研究，因而加强对汇川红军标语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通过研究才能有效挖掘红军标语的内涵及其背后故事，助力于红军标语后期展示以及当下党的政治与思想建设，而全面、深入的研究，才能在有效理解和掌握红军标语内涵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系统的阐释，进而达到提升红军标语的展示、教育水平的目标。高坪红军标语已展

示在“播州长征标语馆”。观坝红军标语紧邻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及其陈列馆，如将汇川境内的标语利用说明牌、图片、影像、三维建模、AR与VR等形式，以“一物两展、图物结合”的专题展览方式展陈在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陈列馆内，增加陈列馆的本土特色，并适时引导游客前往实地参观体验来辐射带动周边红色文化遗存展示，进而扩大本土红军标语的知名度。同时，借助遵义市“一核一线两翼多点”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核心展示区以及若干展示带和特色展示点的建设和汇川区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打造，有序实施研究发掘与数字再现等工程，或可提升汇川区红色文化资源的美誉度。

（三）增进协作，拓展利用渠道

汇川红军标语如何开发利用，这点值得思考。或许因开发对象不同，其开发模式也有差异，但目的都是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军故事，弘扬革命精神。近年来，随着研学活动的兴起，研学旅行团队接踵而至，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应借此契机开展多种多样的红色文化与教育活动，如组织部分研学团队对红军标语进行现场写生、培训、演讲比赛和讲座等，加深参与者对红色文化的认知，进而培养对红军长征文化的兴趣、爱好与艺术再创造等能力，通过这类寓教于乐之的活动来助推红色文化的传承。汇川区文旅旅游局、娄山关管理处等部门近年来组织的文创设计大赛，可适时拓展红色文化基因与要素的设计范围，借助娄山关品牌效应来更好带动汇川红色文化资源的开发与整合。另外，在“重走长征路”、“娄山关·海龙屯国际山地户外运动挑战赛”及“娄山关大捷”等户外活动的助推下，国内外许多团队和单位等到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进行实地体验，并透过长征路线上的遗址、红军标语和纪念馆等，来铭记历史和传承红军长征精神。

红军标语是汇川红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多得的红色文化资源，并且在使命和责任，也是一切文创产品的根。鉴于此，遂提出些许保护利用建议，希望能对

红军标语的保护开发有所助益，更盼其达到抛砖引玉之目的。^{〔文〕}

（作者单位：遵义海龙屯文化遗产管理局）

注 释：

〔1〕2016年3月20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撤销原遵义县，设立遵义市播州区。2016年6月6日，遵义市播州区正式挂牌，标志着遵义县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2〕遵义市汇川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遵义市汇川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2：1-2

〔3〕田建刚.中央红军在黔北地区作战经过[Z].政协遵义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遵义军分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遵义文史资料（第十辑）.遵义.遵义市人民印刷厂.1986：1-2

〔4〕遵义市中共党史学会、四渡赤水研究中心编.遵义红军标语[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36-90

〔5〕泗渡镇文化志编纂委员会编.遵义市汇川区泗渡镇文化志[M].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18：161-163

遵义市中共党史学会、四渡赤水研究中心编.遵义红军标语[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37-39

何烨、杨毓丹、赵永祥.历史的见证——汇川区文化遗产图释[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9：365-366

〔6〕遵义县宣教文卫委员会、遵义县文化体育局、遵义县文物管理所编.遵义县文物志（第二集）[Z].遵义.遵义康达印务公司.2003：94-96

何烨、杨毓丹、赵永祥.历史的见证——汇川区文化遗产图释[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9：283-284

〔7〕政协遵义市汇川区委员会编.红色印记 中央红军在汇川汇川区文史资料第5辑[Z].遵义.政协遵义市汇川区委员会.2011：78页

〔8〕政协遵义市汇川区委员会编.红色印记[Z].中央红军在汇川//汇川区文史资料第5辑.遵义政协遵义市汇川区委员会.2011：79

〔9〕贵州省博物馆.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Z].贵阳.贵阳新华印制公司铅印厂印刷.1983：790

〔10〕贵州省博物馆.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Z].贵阳.贵阳新华印制公司铅印厂印刷.1983：748

〔11〕泗渡镇文化志编纂委员会编.遵义市汇川区泗渡镇文化志[M].北京.中国文化出版社.2018：161

〔12〕彭银.高坡红军标语防风化加固工程[M].贵州省文物局、贵州省文物博物馆学会编.文博与发展//贵州文化遗产保护文集（一）.贵阳.贵州科技出版社.2010：327-332

三都水族土布工艺的传承与保护

文 / 陆 春

一、简介

三都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苗族自治州东南部，地处苗岭山脉“月亮山、雷公山”腹地。东邻黔东南州的榕江县、雷山县，南接黔南州的荔波县，西界独山县、都匀市，北连黔东南州的丹寨县。全县总面积2400平方公里，辖21个乡镇，总人口35万，县境内居住着汉、水、布依、苗、瑶等14个民族，其中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97.96%；水族22.26万人，占总人口的65.9%，全国50%以上的水族聚居在这里。县境内有大小河流42条，林木幽深，自然环境优美，是贵州省十个重点林业县之一。国道321线、省道206线、夏蓉高速公路横贯县境，正在建设的贵广快速铁路过境而过。



土布织制

水族是个历史悠久、人民勤劳、创造和保存着独特而丰富的民族文化的民族，文化底蕴深厚。水族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和历法，水书并驾甲骨文、比肩周易，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深层次文化元素。三都山青水秀，民族风情独特而浓郁。这里有秀甲西部的尧人山国家森林公园，有百亩画廊的都柳江省级风景名胜区，有各具特色的怎雷、水各、姑鲁、巴茅等原生态民族村寨，有世界之迷玄机难解的“下蛋石”，有闻歌起舞的风流草，有预测天象的“晴雨石”，有被誉为象形文字的“活化石”的水书，有被誉为刺绣“活化石”的水族马尾绣，水书、水族马尾绣和水族端节列入了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古朴典雅尽情狂欢、世界历时最长的水族端节，有风情万种、欢歌如潮，被称为“古老的东方情人节”的水族卯节，有令人心醉的水族歌舞等。水族民居依山傍水，古朴典雅的“栏杆式”建筑鳞次节比、工艺精湛、错落有致，有奇特的牛角雕、剪纸、服饰等民间工艺和风味独特的鱼包韭菜、糯米酒等传统饮食融为一体，构成了一幅幅优美的水族山乡风情画卷。

三都水族先民自古就会纺花、织布。他们自种棉花、自栽蓝靛。衣着达到自给自足。土布制作一般是先用弹好的棉花纺成

线，再把线挽成卷，用白芨浆加线果，把线果放到布线器上。布线、定格好后放到织布机上织。织出的土布有白土布、青兰土布、大小花格土布等。除白土布外其它土布可以直接剪裁服饰，制作棉被，垫单等。三都土布制作具有优越的条件，东片区的拉揽乡、打鱼乡、都江镇、坝街乡、巫不乡、羊福等乡镇森林覆盖率较大，山高沟深荫森，适应种蓝靛，南片区的水龙乡、中和镇、三洞乡、周覃镇、九阡镇、廷牌镇、塘州乡等阳光充足，是适应种棉花之乡镇。

水族土布具有很好的实用价值，千百年来它解决了水族人民穿的问题，使之有了遮羞，御寒之物。土布制作历史悠久，研究它有助于研究水族人民的历史。扎染工艺充分表现着水族同胞对美好爱情和幸福生活的向往，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土布色泽古朴、花纹美丽奇特，布料厚实耐磨，具有冬暖夏爽，透气吸汗的特点。是水族同胞制作衣物和床被、床单等的上好布料，同时也是婚嫁中馈赠宾朋的送礼佳品。现在每床花垫单可卖200元左右，经济价值很好。但由于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这门技艺现在面临濒危的绝境，再不保护抢救，我们的民族文化将会消失。

二、历史渊源

水族同胞有自己的文字，但史书上没有记载水族同胞纺花、织布起源于何代。千百年来他们都是通过口传心授，母传女，师传徒，织布、雕花、刺绣、做扎染的技艺传承至今，不断发展。也许这些技艺同他们的发展史一样渊远流长。由于水族的起源和迁徙没有确切的文献记载，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水族是由古代南方“百越”族群中“骆越”的一支发展演变而形成的单一民族。秦汉以前，岭南一带居住着“骆越”、“西瓯越”、“南越”等许多部落，它们与东南沿海和西南地区的其他诸越部落，统称为“百越”。“百越”不但孕育了中国

的稻作文化，同时也演化为南方许多民族的共同祖先。水族民间传说，他们的祖先原先居住河南商丘睢水流域一带，是当时王朝的贵族，掌握着朝廷里的历法和祭典活动。殷商晚期，周王和商王打仗，水族祖先被迫离开睢水流域经安徽、江苏、江西、广东迁徙到广西邕江流域一带。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兵50万进军岭南，遭到当时西瓯、骆越等部落的顽强抵抗，直到公元前214年才统一岭南。受战乱的影响，水族先民被迫第二次大迁徙，来到广西环江、龙江流域一带，在那生息了八百多年。唐朝建立后，在水族居住地环江地区设置抚水州。北宋期间，广西环江一带连年发生旱灾，水族先民被迫离开环江进行历史上第三次大迁徙，来到都柳江、樟江流域一带。历史民族学家的研究认为，水族社会没有经历奴隶制，而是直接由原始社会跨入了封建领主制，从唐代开始，封建领主制经济在水族社会中延续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直到明朝洪武年间，由于“调北征南”和“调北填南”，江南大量汉族进入水族地区之后，受汉文化的影响，水族社会才开始进入封建经济时期。

自古以来，水族人民就自种棉花、自纺、自织、自染、自裁、自缝衣服。全家穿衣从挖地种棉直到用手工缝制成服装全由妇女承担。每家每户都有纺车、织布机、染缸、染料（蓝靛自种）。每户、每村、各地区的妇女织出的土布常常喜欢拿来攀比，手工、技艺高超的妇女，纺出的线、织出的布质量要比一般妇女胜出许多。纺纱、织布、扎染的技艺小女孩们从小就开始学，聪慧的女孩十三、四岁就能熟练地掌握这门技艺，一般的女孩这般年龄也会制作了。

三、土布制作基本内容

（一）土布制作流程

- 1.弹棉花并加工成条状。
- 2.纺线、挽线、上白芨浆、煮线、晒纱。
- 3.染纱。

4.绕线果，布线，定格，梳理，绕轮，布经线。

5.梭子放置纬线，用摆子撞实。

（二）染绘土布布料织成后，有些可直接裁剪成各式服装和其它用品，有些则需要进一步染绘成各种花色品种，富有装饰性的图饰花布。

水族土布的床单花布主要运用各种扎染技术进行染绘。其主要流程如下：

1.在白布上绘图，主要图案有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等，也有鸳鸯戏水，龙凤呈祥等。

2.用各种扎染技法进行处理，主要有缝绞法和捆扎法，也兼有各种自由扎法。

3.浸染、晾干、扳线、镶边，完成染绘。

（三）水族印染制作

水族的印染分为蓝靛染、豆浆染和扎线染三种。蓝靛染是豆浆染和扎线染的基础，白色的布匹一般都要用蓝靛才能染上各种花纹和各种颜色，蓝靛的原料就是蓼蓝，蓼蓝一般在地里种上，也有的在深山里直接采到。蓼蓝收割后，先将收割下来的蓼蓝洗干净，然后放进水缸里浸泡。浸泡二十天以后，蓼蓝的枝节会变红，腐烂沉淀的蓼蓝会分解出蓝幽幽的色素。然后把蓼蓝杆叶捞出，往水缸里投放一定量的石灰水，再用一种特制的搅拌器将蓼蓝水和石灰水充分搅动。搅拌器在水缸里上下运动，蓼蓝水上下翻腾，生成蓝幽的泡沫，非常漂亮。蓼蓝水和石灰水充分搅动后净置，使蓼蓝的蓝色色素凝结沉淀后过滤，就可以得到蓝靛染料了。

蓝靛染料制成后，就可用其来染布。染布分青黑两种，要想染成青色布，还要将干枯的蕨叶和马桑树枝叶放在一起烧，由于

马桑树的枝叶水份大，很难烧成灰，而只能烧成碳。要将马桑碳带回家放在瓦缸里，再用石灰将其盖住、捂闷，让马桑碳充分燃烧后变成马桑灰。用温水将马桑灰打湿，充分搅拌后放

入竹箩筐里压紧，让灰充分发酵。再分步用热水将灰浸泡，在竹箩筐里铺上棕网，过滤而得含有碱性的马桑灰水。把灰水倒进染缸中，再放进蓝靛和适量烧酒，用木棒搅动调匀，就成了蓝色的染料水。再用棉被蓑衣等把缸口盖好，泡上一个星期，好的染水在搅拌时会产生很多泡沫，而且蓝色中稍稍泛出黄色。当用手指浸入染水，手指变蓝时便可以开始染布。把织好的布匹放进染水里浸泡，然后取出滤干，又放到清水里荡洗，晒干。第二天再继续染，反复浸染五六天后，白布便可以染成蓝色。

如果想要将布染成黑色，就需要上山采集一种水语叫“梅凤”的植物。将“梅凤”的皮和叶放入大铁锅里熬，当熬出的汁液达到一定浓度时，将汁滴在手指甲上不流动为好，再把皮叶捞出，把蓝布放入铁锅里煮，煮透后将布取出平整地放在地上自然晾干。晒干后便可以拿布到池塘里“和稀泥”，即用池塘里的黑色烂泥将煮过晒干的布匹浸泡，再用清水洗净，晒干。将煮过“梅凤汁”，和过“稀泥”的布匹再放入染缸里浸染五到六天，就可以把布染成黑色。如果想要颜色浅一些，染的次数就少一些。少染成蓝色，多染成青紫色乃至黑色。染好的布匹凉干后，再将布折迭起来，放在锤布石上锤平，布就会变渐渐发亮。经过捣捶的布，泛出蓝黑幽幽的光泽，好看极了。

四、相关器具制品和作品

1.土布制作的主要器具和设施

脱籽车、弹棉器、干棉杆、纺车、挽线器、绞车、布线器、布线支架、分线器、小竹筒、织布机、大活轮、小活轮、梭子、竹块等。

2.扎染用的器具和设施以及原料

染缸、染料（主要是蓝靛、补助一些红、黄、紫等色料制剂），雕扎针、线、白土布、竹杆等。

3.土布制品、扎染制品

晾晒土布



白土布、青兰土布、大小花格土布、反纱布等。主要缝制衣、裤、围腰、长帕、垫单、棉被、背带，各种花纹的扎染垫单等。

五、基本特征

1.乡土性特征

水族土布从原材料种植到织染、绣工艺流程，直至使用者，都在水族内进行，具有鲜明的乡土性特征。

2.多样性特征

水族土布的制成品类型多样，有织成的各色花布，有织、染、绣一体的各色花布；其用途也有多样的区别；有各种年龄段的区分（如老年人、青年人、小孩的用布多色皆有不同），如不同物品的区分（如服装和床上用品用布不同），有文化功能的区分（如婚嫁用花格布、丧葬用青平白布）等等。

3.艺术性特征

水族土布做工精致，风格典雅，具有鲜明的水族艺术风格，与其它地区其它民族的相似品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人们往往购置以为馈赠佳品。

4.女性化特征

水族土布制作的全流程，从原材料种植到最后成品都是由水族妇女实施，水族女性从小就参与到这个流程之中，成为传承主体，终其一生。土布制作的多样性更多体现在女性服饰和女性用品的范围；因此，水族土布制作所显现出来的文化风格具有鲜明的女性化特征。

六、主要价值

1.实用价值

衣食住行是人生的四大要素，土布的主要价值在于它从古至今解决了水族人民穿的问题，使人们有了遮羞御寒之物。

2.历史价值

有了濮越人就有土布制作，扎染技艺，所以研究这门技艺的发展有助于研究水族人

民的历史，研究中国古代织染技术的历史，研究水族妇女生活史等等。

3.文化价值

土布制作、扎染技艺，传承至今其制品越来越精美，众多色彩相间的土布、绘制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美丽的床单，凝结了古今水族同胞的智慧。它们当中的每一件制品都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4.经济价值

土布色泽古朴、花纹美丽奇特、布料厚实耐磨，具有冬暖夏爽、透气吸汗的特点，是水族同胞制作衣物和床被、床单等的上好布料，曾一度供不应求。

七、传承体系

土布制作、扎染技艺历史悠久，虽无史可考，但在水族地区传说在濮越时期就有了这门技艺。传承至今已有千百年的历史。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水族地区内形成了如下一些比较有名的传承谱系。据调查，近来的有如下传承谱系。

1.纺织谱系

王密，女，1953年生，中和镇中和村河寨人，早年就迷恋上了纺花、织布、刺绣等技艺。她主要从师于母亲杨氏，出嫁再向寨子石们学习，由于她肯学肯专，不多久技艺都比母亲及石们等人高出了许多。她有时还到外村学纺织、扎染、刺绣等手艺，现在她是村中最受敬佩的人。在实践中还创造地织出许多与众不同的花格布，反纱布等。经过几十年的磨砺，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刺绣和扎染也自有特色。她家现在存有三套纺织设备，利用空闲时间就进行纺织，她说卖一床垫单就有200元的收入，当问到她一年的收入时，她就乐哈哈地说：“这活也不赚多少钱的，只是年老了没能出去打工，在家做这纺织能够解决家庭日常之用。

潘采，女，1962年生，塘州乡枚育村人，从小在母亲及亲友的传授下，成了一个纺织能手，现在利用空闲时间还从事纺花、

织布。同时常常教授自己的儿媳及村里的青年女孩学习织布、扎染工艺。家中的各种纺织器物都还保存齐全。

杨月，女，1960年生，中和镇拉旦村人，小时跟自己的母亲学习纺织，家里有一套齐全的纺织工具。常在农闲时进行纺织，织的布、垫单拿到市场去出售，有一定的收入，能够解决家庭日常生活之用。

2.染布谱系

纺织在水族社会中目前还有近千余人会做，但染布确实的很少。七八十年代染布的人算还多，现在太少了。据调查，在水族较为集中的南片区近年来从事染布的有。

潘国胜，1939年生，塘州乡雄寨村，已故。

潘国录，1931年生，塘州乡雄寨村，已故。

潘政言，1940年生，塘州乡雄寨村架寨组，还健在，但身体欠佳，尚未从事染布了，后代无人愿学，都出去找钱谋生。

石昭，男，1932年生，中和镇中和村河寨组，已故。其子石毛、石波现在还健康，还在为民染布，但他们说：“现在穿土布的较少，做这个没得吃，看来还是要出去打工谋生了。”石连安，1937年生，中和镇中和村河寨组，已故。他的三个小孩没有哪个愿学染布。

八、涉危状况

水族自古每家都有纺车、织布机、染缸，妇女个个会织土布、搞扎染。60年代至70年代是土布纺织的鼎盛期，因为那段时间国家凭票供应布料，水族的纺织，扎染由此盛行。现在随着经济全球化，现代文明逐渐取代传统文明，年轻一代的妇女懂得纺织、扎染技术的人渐少。目前我县22万的水族群众只有千余人会纺花织布，但她们中的许多人已经不再从事这项工作了。雕花做扎染的人更少，设备也大量被毁坏，只有少量的属于商业目的制作者纺织少部分到市场

上出售。现代许多水族小女孩都不知道什么是土布制作，扎染；穿戴土布的少之又少。打工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村中很少见到男女青年。找人学都困难，多数从事手工制作扎染工艺的“匠人”年事已高，面临“人亡艺绝”的危险，所以现在再不抢救这门工艺很快可能就消失了。

九、传承保护与建议

以人为本，着力打造民间传承人的整体素质，关键是如何提升水族土布民间传承人文化水平，要下功夫去培养建设化和相对稳定化，以优秀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要建设好该项文化艺术的研究人员队伍，同时，抓紧培养民间民族文化传承人工作，并使之长期化和相对稳定化，以优秀的产品和服务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

着力打造水族土布原生态民族文化品牌是产业发展的根本，三都是水族的大本营，是水族文化之都，水族文化品牌一定要打响。

实施精品工程，发展龙头作用的原生态土布要挖掘和保护起来，要把水族土布包装搞成精品，让游客满意，买得放心。精品工程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心，因此要以一个地区为主导，来带动其他地区，做好表率。以三都九阡片区为中心，着重对水族土布技艺文化的抢救和保护，通过招商引资开发水族土布精品，做大做强以满足顾客的需要。

总之，三都水族土布制作工艺相当繁杂，我们应该加大力度去抢救、挖掘、保护，才能使它不再失传。近年来由于民族文化成为时尚的今天，许多游客到三都想买一样实惠的土特产品都供不应求，因此建议在今后的水族特色一条街里的土特产品一定要丰富，品种齐全，以满足广大顾客的需要，同时也加快三都的经济发展。文

（作者单位：三都水族自治县水族文化研院）

孙清彦与“西南屏障”石刻

文 / 孙惟宏

一

黔西南州“西南屏障”石刻于1985年被贵州省人民政府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名至实归的。

该石刻位于兴义市捧乍镇小学（原关帝庙）外墙当街处。捧乍古镇是贵州西南边陲，与云南、广西隔南盘江相望，素有“滇黔桂锁钥”之称。石刻的字是誉满滇黔的书画名家竹雅孙清彦于清同治七年（1868）在这里留下的手迹。石刻总长4.5米，分5块碑，每块高127cm、宽90cm，横立。整个石刻皆行书，其中，“西南屏障”四个大字为榜书，各占一块碑，每字近一米见方。四字采用阴凹阳凸的双勾线刻法。跋文占一块，12行244字，阴刻。其文曰：

嗟呼！发逆蔓延半周，海内回夷肆扰，今逾十年。况夫地本弹丸，官失文武，兵食两乏，固守其难。苟非捧人士云如、文山、仲谦、瑞图、云图及云亭诸绅民，同心效死以存孤城不及此噫！余乙丑偶临，周览形势，内山外河，垣堑天成。益皇然于无信不立之旨焉！孰意阳极而剥，诸君乃自坏长城。犹幸天祐、云亭支手持危，重振全局而鼎新之，从兹官民合一，上和而下应，岂不永固藩篱耶！噫！灵武失而明亡，睢阳守而

唐兴，边城得失之故，其所系岂浅鲜哉？此即墨二城田单所以为复齐之本也。题曰“西南屏障”大书深刻并缀数言，以告夫后之官此者。

大清同治七年戊辰九月庚戌之吉

诤授朝议大夫花翎道銜即补知府昆池孙清彦书并识

“西南屏障”石刻的书法及跋文内容堪称孙清彦“书”和“文”的合璧。其书法字势挺拔，笔力圆劲，藏锋润骨，逸秀中尽显端庄，端庄中隐现风骨。四字相互呼应，重心稳健，蔚然大气。而跋文则笔势连贯，流畅生动，神采飞扬，自成章法，洋洋洒洒，大有一气呵成之势。总观全貌，足见工力深厚，气派大观。石刻经过一个半世纪时光的打磨，使这个精妙的书法珍品，增加了几许沧桑古味。跋文是对为什么要写“西南屏障”的一个注解，文虽短小精悍，但记叙、抒情、议论并用，文采华丽而不张扬；引经据典，透出其历史掌故的渊博和思想境界的

“西南屏障”石刻



高远成熟。该跋文更是对当地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二

那么，昆池孙清彦为何在此写下这几个大字？意义何在？

孙清彦(1819—1884)字士美，号竹雅，云南呈贡人。孙氏在昆明、呈贡是从清康熙一直代代相传的书香世家。到孙清彦时，其诗文书画更是集古贤之传灯，开后学之门径，殆所谓数世之积习而毓秀于一人。传至今日的昆明“金马”“碧鸡”两牌坊坊眼的书写者，竹雅孙清彦也。

咸丰年间，云南回族起义军直逼昆明，作为廪生的孙清彦毅然投笔从戎以报效朝廷，入赵德昌军门幕府，署理文牍。咸丰九年又随赵军入黔。此时黔地也烽烟四起。同治元年(1862)，朝廷派赵德昌军援助已被回族义军久困的兴义府城(今安龙)，3月21日，“德昌大军抵城下，环城贼（指回族义军。下同）营皆退，人皆相庆更生，力请入城，夹道欢呼。”孰意军中有人受贿赂，是夜将半，放贼入城，四面纵火，烧杀践踏，军民仓惶无措。官民是夜出逃，尽向西路奔走，直往兴义县进发。沿途死伤者又无数，兴义知府胡霖澍出逃时也被乱军所杀。官军退至兴义县城，“德昌乃请委孙清彦署府事，暂住兴义县城，相机进剿。”。9月29日，“回贼陷兴义县城……德昌率孤军，拥难民，将走捧乍汛……于是兴义五属皆陷贼。”赵德昌绕道捧乍回省城后，留下孙清彦带残兵并兴义县刘氏团练留守捧乍。从此，长于诗文书画的文人孙清彦，不但沾上军事，而且还亲自带兵征战。他亲身经历了兴义地区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民族与民族之间、民族与官府之间的这场战争。

同治二年(1863)二月，刘氏团练首领刘官箴（字鸿魁，刘官礼之兄）收复兴义县城，孙清彦军以县城为据点视机而行。同治三年(1864)，孙清彦带军东进。“贼首马忠

与张凌霄争权，为凌霄逐出，奔木咱寨，与苗目韦仕良约降孙清彦，愿取城自赎。清彦纳之。清彦用张有恒及军功朱天贵计，结滇军肖林等为内应。忠首先登城，仕良助之，遂复城。时三年九月十六日也，迎清彦入城安民，清彦以忠首功上。”³。但好景不长，是年12月，法国主教胡缚理出面干涉官军镇压回族教民以搅抚局，上报朝廷，贵州巡、督二府将责任推到下属，最后将孙清彦撤任以作交代。同治五年，兴义府城再次被回族义军占领，接任知府李保衡巷战死之。十郡城复陷。这场拉锯战又一直延续6年，致使无数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孙清彦虽然被撤离，调往异地再任知府，但这场惊心动魄、生死就在瞬息之间残酷而野蛮战争，对他来说是刻骨铭心的。

三

府城尚如此，府属下县、镇的命运更可想而知。

兴义县的捧乍距县城44公里。它是明代普安军民府十二营之一，在清代被设为兴义县的一个“汛”，有军看守。由于特殊地理位置，它不单是黔、滇、桂商贾云集之地，更是兴义府属下的一个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咸同年间，捧乍汛和兴义府城一样，城池屡遭攻陷。在此期间，据史料记载。孙清彦至少在捧乍到过或住过三次。

第一次即同治元年（1862）9月，赵德昌军从兴义府败走西逃，先进兴义县，后又退捧乍汛。不久赵德昌绕道罗平回省城，被请委的署理知府孙清彦只有靠地方团练留守捧乍张家营盘。

第二次是同治四年（1865），也就是跋文中提到的“忆余乙丑秋偶临”这一年，正值官府与义军“停兵议抚”的片刻，孙清彦巡视了捧乍汛，察看了那里的地形和军事。

第三次是同治七年（1868）九月，就是书写“西南屏障”的这一年。这时孙清彦

孙清彦墓地



不在兴义，而是任郎岱同知。来此，是应刘官礼之约到兴义县城，顺便到捧乍。

可以看出，孙清彦署理兴义知府，由于战争，并没有好好在兴义府（安龙）署理府事，从同治元年到他离任的同治三年，他更多的时间是在兴义县，而不是在府城安龙。他不仅同兴义县知县陈聘儒关系极好（在兴义马岭营上寨留下“祥凝紫气”石刻署的知府和知县的名），更与兴义下五屯刘氏兄弟刘官箴（字鸿魁）、刘官礼（字统之）结下生死之交的友情。以至于在战后的同治十二年（1873）又专门到兴义县，为刘官礼重建的笔山书院写下《学书枝言》，刻成四碑，立于书院内，成为镇院之宝。

而捧乍汛，则是赵德昌军退败在兴义的最后据点，也是孙清彦作为知府能以留守在兴义的最后据点。在这里，他借助于陈聘儒以及刘氏团练得军事力量，发展壮大，最后获取了记入史册的收复兴义府城的胜利。因此，孙清彦对捧乍是情有独钟的。

四

三年时间里，孙清彦不论在兴义府、兴义县、捧乍汛，所看到的，都是血雨腥风、尸横遍野的野蛮杀戮。在此以后，他调任都云知府独山知州、郎岱同知、安顺知府，也都遇到同样的战争与杀戮。这不由得使他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这场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官府如此残酷战争？怎样才能化解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实现边陲的安宁和稳定？因此在同治七年（1868）再到捧乍时，应诸生之邀，要这位书画家留下墨宝时，他已意在笔先，一口气奋笔疾书，写下“西南屏障”四个大字及244字的跋文。

跋文简洁精炼。开头是聊聊数语，勾画出当时战乱局势。孙清彦借捧乍诸绅民在“官失文武、兵食两乏”的危机下，仍“同心效死以守捧乍孤城的精神给与了赞扬。可是“内山外河，垣堑天成”的地理优势在这种乱局形势下都没用了，这是“不信不立”

的根本原则都不存在的缘故。过度强硬的政策必然会产生背离，如果这样下去你们只会自毁江山。幸好现在有人出来支撑危局，想让捧乍重新昌盛起来。那从现在起，只有“官民合一，上和而下应”，“藩篱”才能永固！从“阳极而剥，乃自毁长城”到“官民合一，藩篱永固”，这一反一正的事理看出孙清彦跋文立意。进而从“灵武失而明亡，睢阳守而唐兴”也是一反一正历史事件加引证，得出边城得失的缘故，是最清楚不过的道理。也是田单以即墨二城作为收复齐国之根本。所以题上“西南屏障”大书深刻，附上几句话，目的是告诫以后在这里为官的人。

无疑，“西南屏障”正是孙清彦力图让边垂安宁和稳定的理想追求；而跋文则是大声疾呼：要使西南成为大清王朝的坚固屏障，“官府”最需要做的是取信于民。阳极而剥，就不能做出违背人民意愿之事。只有“官民和一，上和而下应，岂不永固藩篱耶？

孙清彦书写“西南屏障”的立意表达，并非突发奇想，而是经历战争和杀戮后的深思熟虑。这与他在此后书写的《郎岱木城碑记》中“所恃，在官民相固一心耳。”“境内一心，使匪无隙可乘，以固边厥焉。”的观点完全是一致的。

“西南屏障”及跋文反映出孙清彦作为“知府”的治国治民思想，这种思想中的很多闪光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其可贵的。直到今天，当我们再读它时，会感到孙清彦的这种思想仍在闪光，会对少数民族地区处理好各种关系的重要性有新的启迪。这，或许就是“西南屏障”的历史价值。文

（作者单位：贵阳市住建局）

参考文献：

- [1] 任可澄.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M].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校勘.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856-857
- [2] 任可澄.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M].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校勘.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887-888
- [3] 任可澄.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M].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校勘.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999

可乐墓葬与 周边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文化

文 / 图 毕 洋

1960年以来在贵州赫章发掘的可乐墓葬，是黔西北地区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可乐墓葬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战国秦汉时期云贵高原地区的文化，而且由于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与巴蜀文化、滇文化、汉文化墓葬中随葬的铜器相同，因此，可乐墓葬对于深入理解云贵高原战国秦汉时期的文化与社会变迁、探究云贵高原与巴蜀地区乃至中原地区的文化联系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赫章可乐、巴蜀文化以及滇文化墓葬中的文化特征进行初步地比较分析，以期今后进一步研究提供方便。

一、可乐墓葬

截止2012年，赫章可乐经过正式发掘清理的战国至秦汉时期墓葬共计327座^[1]，其中汉式墓（报告称甲类墓）49座，地方土著族群墓葬（报告称乙类墓）278座^[2]。这些墓葬大都分布于山间坝子，集中于祖家老包、锅罗包、罗德成地等地点。从地层关系和墓葬随葬品看，各墓葬时代虽有差异，但都为同一个时期的墓葬。发掘简报、报告判定甲类墓的年代为西汉早期至东汉中期；乙类墓年代为战国早期至西汉晚期^[3]。

甲类墓分布于7个地点，大都有封土（多数已遭破坏），除七座砖室墓外，余皆为竖穴土坑墓^[4]。一般而言，甲类墓规模较大，一般长约3-6米、宽约3米，有墓道或无。葬具大多腐朽，仅存木棺椁碎片、漆片或棺上装饰的鎏金铜片和铜泡钉。

乙类墓无封土，均为竖穴土坑墓，无墓道。墓室一般长约2米，宽1米左右。墓葬排列较为密集，且有一定规律。可确定的葬式不多，主要有仰身直体和侧身直体两种。大多墓葬无葬具，仅少数发现有棺木痕迹或漆皮残片。乙类墓还有一些奇特葬俗，如“套头葬”，即用铜釜套头或分别用铜釜套头、套足，亦或用铜釜套头、铜洗垫足。此外，还有用铜洗垫头、铜洗盖面、铜戈插于头侧地面等特殊葬俗。

甲类墓随葬器物较为丰富，出土有漆器、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石器 etc 共计约有400余件（组），种类包括生活实用具、生产工具、兵器、装饰品、模型器等。甲类墓及其随葬品与贵州其他地区^[5]、四川^[6]、湖南^[7]以及中原地区^[8]汉墓，在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等方面都基本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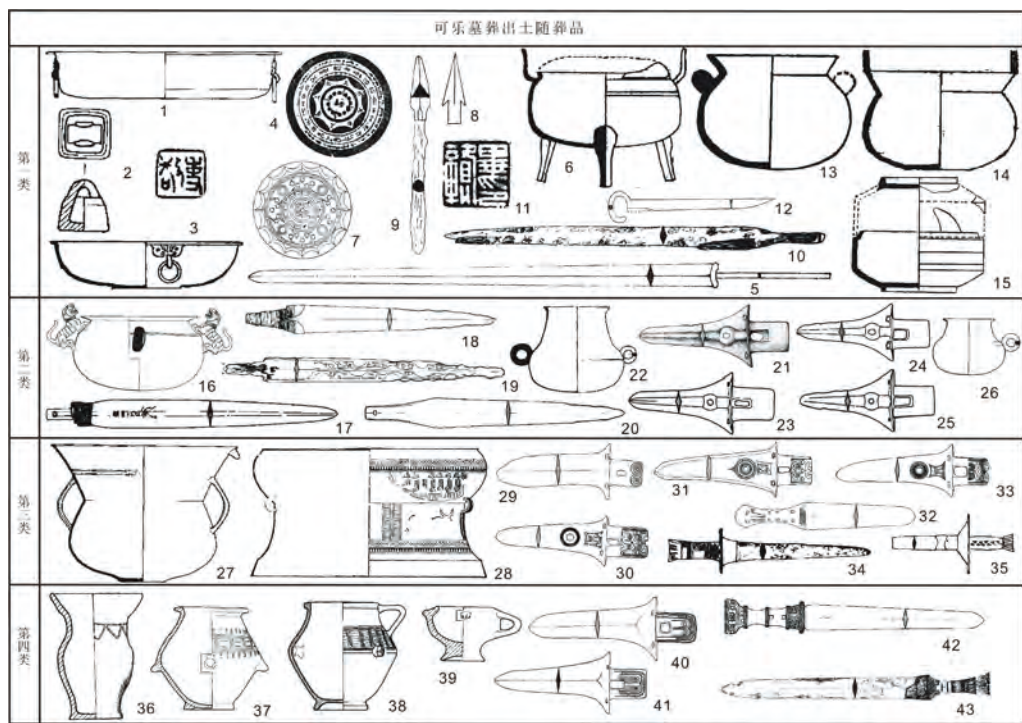
乙类墓随葬陶器较少，最主要器类为罐，主要器形为广肩扁圆腹平底罐、直口长腹圜底罐和乳钉纹折腹罐。以这三种罐为基

础，各墓的陶器大多仅出1件，或另有釜、杯、瓶、砚、豆、纺轮等。这些陶器基本为乙类墓中常见的器形。

铜器种类和数量较陶器丰富，其特点在于有数量较多的青铜容器、兵器和装饰品，每类器物又有多种类型，不仅有可乐自身的特点，还大体包括了滇文化、巴蜀文化及汉文化墓葬中常见的器形^[9]。如青铜容器有釜、洗、釜、匜等4类，兵器有剑、戈、铍3类及兵器附件等，装饰品有钗、簪、铃、挂饰、镯、戒指、带钩、扣饰、首饰等9类。其中，兵器中的蛇头形茎首铜剑和铜柄铁剑为滇文化中的常见器形，柳叶形剑包括了战

国早期至西汉早期巴蜀文化柳叶形剑中的各种形制^[10]，而铜镜则与汉墓中出土的“日光镜”相似；同时，在与乙类墓的相同区域内（如锅罗包），亦分布有西汉昭宣以后至东汉中期的汉式墓，由此可见，可乐墓地是黔西地区的一个较为中心的遗址，墓地也比较稳定地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

由此可以看出，可乐墓葬出土的随葬品可以明显的分为四类（图一）。第一类是中原文化器物，如铜鼎、铜钁、铜洗、铜鉴、铜镜、铜钱、汉式剑、铁釜等；这部分器物虽然同样见于贵州其他地区，但它们与巴蜀、中原地区的汉式青铜器较为一致，应当



图一

1.M273：2铜洗、2.M274：42篆书“敬事”铜印、3.M8：39铜盘、4.M23：17铜镜、5.报告M46：1铁剑、6.M48：29铜鼎、7.M199：1铜镜、8.铜铍M10、9.M126：8铜铍铁铍、10.M146：1铁剑、11.M175：4铜印、12.M176：11铜削、13.M178：18铁釜、14.M49：16铜釜、15.M178：8铜釜、16.M274：87铜釜、17.M296：3铜剑、18.M298：7铜剑、19.M277：5铜剑、20.M309：2铜剑、21.M356：3铜戈、22.M277：2铜釜、23.M296：2铜戈、24.M334：1铜戈、25.M335：1铜戈、26.M312：1铜釜、27.M277：1铜釜、28.M153：3铜鼓、29.M299：1铜戈、30.M317：1铜戈、31.M318：1铜戈、32.M325：3、33.M365：3、34.铜柄铁剑（无编号）、35.M104：2铜柄铁剑、36.M292：1陶瓶、37.M304：1陶罐、38.M322：1陶罐、39.M338：1陶杯、40.M277：7铜戈、41.铜戈M210：1、2、42.M365：5铜剑、43.M67：2铜柄铁剑

（采自《赫章可乐发掘报告》及《赫章可乐二〇〇年发掘报告》）

来源于四川、重庆或中原等地。第二类为巴蜀式器物，如柳叶形铜剑、蜀式无胡戈、铜釜等；这部分器物与巴蜀青铜器相同，其来源地当为巴蜀地区；第三类为滇文化器物，如蛇头形茎首铜剑、一字格喇叭形首柱状茎铜柄铁剑、鼓形釜、石寨山形铜鼓及小件装饰品、环纹海贝^[11]等，应当来源于云南地区。第四类为当地土著文化器物，如镂空牌形茎首铜剑、乳钉纹折腹罐等。正如此，学者们都指出了可乐墓葬出土铜器与中原、巴蜀、云南等地区出土铜器的相似性，以及可乐墓葬所指示出的各地之间的文化交流^[12]。

二、川南、滇东北地区的巴蜀文化墓葬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今，四川地区发现的巴蜀文化遗存颇为丰富。时代较早的如新津宝墩^[13]、成都南郊十街坊^[14]、广汉三星堆^[15]、西郊化成村^[16]、成都金沙^[17]、青白江三星村^[18]等，其年代范围大约在夏商至春秋早期，大部分均集中在成都平原地区。这一时期的巴蜀文化墓葬除出土有较多小件骨器外，其他大多无随葬品或多为陶器、玉石器。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金器、玉石器、象牙等贵重物品主要用于祭祀活动而非随葬^[19]。

春秋中晚期至战国中期，巴蜀文化遗存几乎遍及四川全境。具有代表性的有成都商业街^[20]、彭县竹瓦街^[21]、绵竹船棺墓^[22]、成都青羊小区战国墓^[23]、石人小区战国墓^[24]、新都大墓^[25]、成都百花潭十号墓^[26]、金沙巷战国墓^[27]、西郊战国墓^[28]等。这一时期，墓葬中随葬品的数量和种类大量增加，以青铜器为主的贵重物品开始出自墓葬而非遗址。如成都商业街船棺葬，该墓葬出土有陶器、漆器、铜器等，种类包括家具、生活用具、生产工具、乐器、兵器及其附件。其中，陶器有瓮、盂、罐、釜、豆、器盖，铜器有矛、戈、钺、斤、印章、带钩及饰件多种。

而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成都平原的巴

蜀文化墓葬逐渐减少，其遗存分布有延至川南、滇东北地区的趋势，如峨眉符溪战国墓^[29]、犍为金井墓群^[30]、乐山共安乡^[31]、宜宾化工厂^[32]、珙县猫儿沟^[33]、云南水富张滩^[34]、营盘乙区墓^[35]、绥江回头湾^[36]等。对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时巴蜀文化墓葬的变化和特点，可举犍为金井墓群、云南水富张滩出土器物进一步说明（图二）。

1977-1984年，在犍为金井公社及其邻近的五联公社三次共发掘巴蜀文化墓葬14座，出土（含采集）遗物总计240余件。这批墓葬所出陶器较四川其他地区同类墓中所出陶器数量颇多，占出土遗物总数的四分之三以上。器形方面也较丰富，有釜、罐、豆、盂、盒、碗、钵、壶、盏、杯、盆、釜、甑、鼎、缶等，以小件器皿最多。其中，小口罐、圈底罐、绳纹釜特别多，占陶器总数的三分之二；其中又以圈底器最多，圈足器、平底器、尖底器较少，不见三足器。从陶质来看，以夹砂陶为主，泥质陶很少；陶色方面，以褐色陶最多，灰陶较少。纹饰均为绳纹，多饰于圈底器上，另还有少量器物饰压印纹、弦纹和附加堆纹。釜和圈底罐这两种陶器是这批墓葬的代表性器物。

这批墓葬所出铜器虽较少，但所出器类如扁茎无格柳叶形铜剑、圈底辫索纹环耳的铜釜、铜甑、铜釜，短戟式宽叶状铜矛、“烟荷包”式铜钺、各兵器及肖形铜印上的“巴蜀图语”如虎、蝉、花蒂、手心等纹饰与四川其他地区战国晚期巴蜀墓葬出土的基本相同。如五号墓出土的三枚铜质“巴蜀印章”，其背面施有内向连弧文，一般而言，虽然战国晚期已有连弧文铜镜出土^[37]，但西汉以后才逐渐流行^[38]。又如三号墓，不仅出土的铁钺与四川各地西汉墓中出土的铁钺相同，而且其伴出的铜釜甑，其底部有四个小钉足，这与成都东北郊西汉墓^[39]、湖北云梦西汉墓^[40]、涪陵小田溪秦墓^[41]出土的铜釜与铜釜甑也相同。加之所出陶鼎的足已经变矮，其时代应偏晚。其他陶器如陶釜形体较小，明显是专供随葬用的明器。因此有学者

认为，这批墓葬应属战国晚期（秦灭巴蜀后）至西汉初期的蜀人墓^[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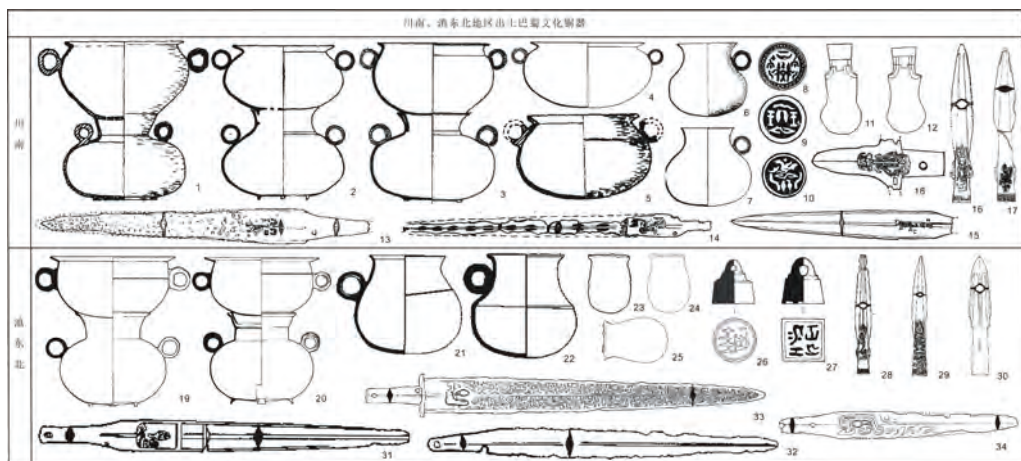
水富张滩墓地经1989、2005年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22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相互间无叠压、打破关系，填土以褐色土居多。多数墓葬有人骨，以仰身直肢葬为主，无葬具。出土随葬品近500件，包含陶器、铜器、铁器、玉饰、料器、钱币等，以陶器、铜器为主。

出土陶器均为夹砂陶，不见泥质。陶色以灰褐、黑褐、黄褐陶为主，手制和轮制兼施，以轮制为主。素面陶器居多，纹饰主要为绳纹，大多位于器物肩部以下。器物以圈底器为大宗，另有少量平底器、带耳器等。器形有罐、器盖、釜、豆、钵、单耳杯、碗、尊、纺轮、网坠等，具有代表性的器物是双耳圈足罐、无耳绳纹圆腹圈底釜。

随葬铜器有铜剑、铜矛、铜釜、铜锯、铜刀、铜钺及镯、环、带钩等饰品。很多墓

葬还出土有铜印章，多者数枚，印面以巴蜀图语为主。已有研究表明，随葬的陶器、铜器、兵器及各种料饰等均与涪陵小田溪^[43]、昭化宝轮院船棺葬^[44]出土器物十分相似。从墓葬出土的无格椭圆茎柳叶形铜剑、环首铜刀、短戟式宽叶状铜矛、辨索纹环耳釜甑、圆形空首椭圆形釜钺的形制及部分兵器饰有的变形虎纹、手心纹、变形蛙纹、蛇头纹等纹饰来看，这批墓葬具有浓厚的巴文化因素。此外，该墓葬还出土有中原式铜剑、铁斧、环首铁刀、篆书白文“万岁”铜印、半两钱、同心圆圈纹铜镜等器物，这说明其时代应偏晚。因此我们认为，这批墓葬的年代约在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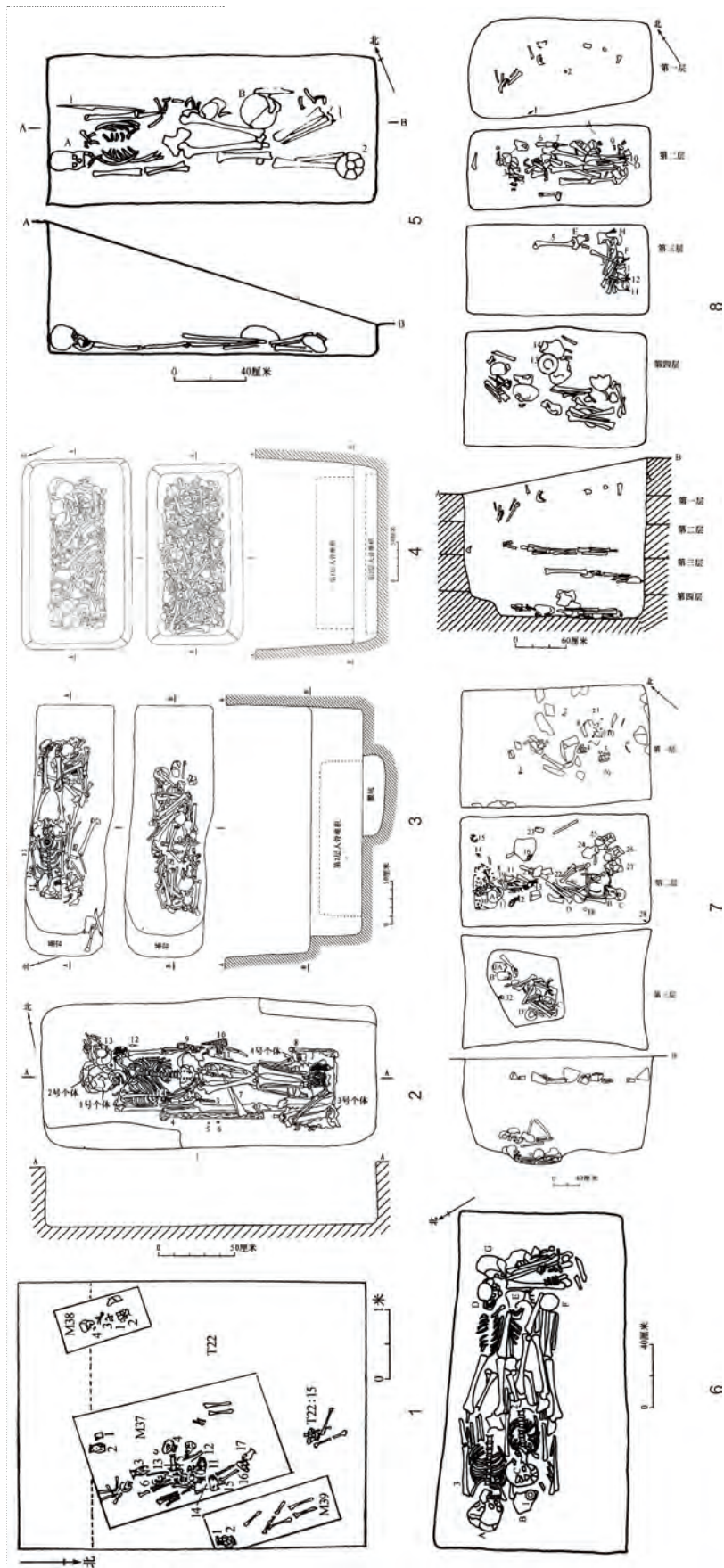
从以上考古资料可以看出：1.成都平原地区的巴蜀文化遗存最为密集和丰富，时代最早且一直延续；而四川南部及滇东北地区一带的巴蜀文化遗存则较为分散，其时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有愈晚愈偏南的趋



图二

1-3、19、20.铜釜甑（金M6：6、五M3：1、金M1：11、张M7：5、金M19：18）；4、5.铜釜（金M1：12、金M6：42）；6、7、21、22.铜釜（金M6：7、金M1：13、张M3：4、张M4：3）；8-10、26、27.铜印章（金M1：7、金M6：38、五M5：6、张M14：31、张M21：31）；11、12、23-25.铜钺（金M1：1、金M5：11、张M4：6、张M12：3、张M21：21）；13-15、31-34.铜剑（金M1：5、金M5：9、五M1：1、张M1：6、张M4：14、张M8：16、张M12：1）；16、17、28-30.铜矛（金M1：16、金M6：2、张M1：1、张M4：2、张M21：22）；18.铜戈（五M6：1）

（1-15采自《四川犍为县巴蜀墓发掘简报》、《四川犍为县巴蜀土坑墓》、《四川犍为金井乡巴蜀土坑墓清理简报》；16-34采自《云南省昭通市水富县张滩土坑墓地试掘简报》、《云南昭通水富张滩墓地发掘简报》）



图三

1.多人二次葬墓（梨M37-梨M39）；2、3、4
多人二次合葬、叠葬墓（金M166、金M7、金
M200）；5.一次与二次合葬墓（纱M35）；
6.八人合葬二次葬墓（纱M28）；7.三层丛葬
（纱M1）；8.四层丛葬（纱M2）

（1.采自《夜郎文明的考古学观察——滇东
黔西先秦至两汉时期遗存研究》；2-4采自
《云南澄江县金莲山墓地2008~2009年发掘简
报》；5-8采自《云南宜良纱帽山滇文化墓地
发掘报告》）

势。2.在年代较晚的巴蜀文化墓葬中,随葬器物以生活用具、兵器为主,极少生产工具。其中,出土陶器的种类与数量最为丰富,火候一般,又以小件器类为主,明显与生活有关。随葬铜器中的生活用具与较早的同类墓相比明显减少,少见贵重铜器;加之各类铜器中,亦有中原式铜、铁器如中原式铜剑、篆书白文铜印、铁斧、环首铁刀、半两钱等,这些一方面说明了巴蜀族群所受早期汉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文献资料记载秦灭巴蜀后巴蜀族群逐渐南迁相吻合。如此,巴蜀族群的文化因素是如何进入黔西北可乐地区的,这就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三、滇文化墓葬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云南地区发现的滇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晋宁石寨山^[45]、金沙山^[46]、宜良纱帽山^[47]、昆明羊甫头^[48]、呈贡天子庙^[49]、石碑村^[50]、江川李家山^[51]、澄江金莲山^[52]、安宁太极山^[53]、东川普车河^[54]、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55]、潇湘平坡等墓地^[56]。从考古材料来看,在各滇文化墓葬中,或多或少均发现有分层叠葬(丛葬)、多人合葬、二次合葬和捡骨葬等葬式葬俗。因此,对于战国至西汉时期滇文化墓葬葬式葬俗的变化和特点,可举宜良纱帽山、玉溪金莲山墓地作进一步说明(图三)。

纱帽山墓地是滇文化墓葬中人骨最为丰富、保存最好的墓地之一。该墓地反映出来的墓制、葬式和葬俗以及对遗存人骨的研究等方面,进一步丰富了滇文化的内涵。1989年,在该墓地发掘滇文化墓葬共57座。这批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未见葬具、墓道、封土堆等。墓葬形制较为特殊者有14座,其中,3座墓底有单边生土二层台,6座有腰坑,3座有脚坑,均为长方形;另有2座墓底有形似腰坑的两坑。各坑内有分离的人骨若干,少者1例,多者10例。除少数墓葬

外,大部分墓葬均出土有种类和数量不一的随葬品,以青铜器为主,其次为陶器;另外还有少量的铁器、玉石器和玛瑙等。发掘者根据14C测定数据及与周围地区其他滇文化墓葬中所出同类器进行对比,将这批墓葬分为四期,判定年代为战国中晚期至东汉初期。

这批墓葬葬式复杂多样,可分为单人葬、合葬和分层丛葬三大类,以分层丛葬墓最多,合葬墓次之,单人墓最少。其中,单人葬仅有10座,主要为仰身直肢葬。合葬墓17座,可分为二次合葬和一次与二次同穴合葬。二次合葬墓5座,墓坑内骨架较为散乱,所葬人数有二、三、四、七不等。一次和二次合葬墓12座,墓坑内一次葬骨架保存较为完整。除1例为侧身屈肢葬与二次合葬外,其余皆为仰身直肢葬与二次合葬,墓内所葬个体有二人合葬3座、三人合葬5座、四人合葬2座和八人合葬2座等。随葬物品有铜削、陶壶等。墓内人骨经鉴定,一次葬者为男性,二次葬者为女性。

分层丛葬22座,是墓地中最为复杂的一种特殊葬式,即将同一墓坑分为若干层,腰坑、脚坑也单独算一层,层与层之间用填土相隔,从二层至六层不等。每层放置骨架若干,有一次与二次合葬,也有二次合葬;包括二层丛葬墓6座,三层丛葬墓10座,四层丛葬墓4座,五层丛葬墓1座和六层丛葬墓1座。分层丛葬中,各层骨架随葬器物的种类和数量多少不一,如铜剑、铜镞、陶罐、纺轮等。

金莲山墓地经过2006、2008年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409座,均为竖穴土坑墓,未发现葬具。墓葬间叠压、打破关系复杂,葬式多样,有单人葬、多人合葬、二次葬、断肢葬、叠肢葬、堆骨葬、垫肢葬、叠层葬等,几乎囊括所有滇文化墓葬的埋葬形式。在出土有骨架的墓葬中,以仰身直肢葬最多,其次为侧身直肢葬,再次为仰身屈肢和断肢葬,最少的为俯身直肢葬和侧身屈肢葬^[57]。

关于金莲山墓地葬俗,简报公布了几座墓葬材料,如M166为单层叠肢、垫肢葬,

共有4个个体。其中，1号个体为女性，位于最上端，仰身直肢；2号个体为男性，被压于1号个体下，仰身直肢；3号个体为男性，处于1号、2号个体的足骨之间，二次葬；4号个体被压于1号个体之下，侧身直肢。该墓出土有随葬品21件，包括陶器、铜器、铜铁合制器、铁器、玉石器等。又如M184，为分层叠葬。墓坑内人骨共分为3层，①层为女性，一次仰身直肢葬；②、③层为二次葬，骨骼散乱，大多为肢骨，无完整头骨。墓中出土随葬品仅4件。其他如M155、M200等都是单层或为双层多人捡骨二次合葬，其中M200至少发现有31个个体的头骨^[58]。

相关研究表明，在滇文化墓葬中，这种在同一墓坑内由较多个体相互叠压而埋葬的葬式并非偶然现象。其中，金莲山墓地叠层葬有66座，占16.95%；羊甫头墓地叠层葬墓有40座，占4.9%；石寨山墓地叠层葬3座，占3.4%；李家山墓地有合葬墓，占13.7%，暂未有叠层葬墓发现；纱帽山墓地叠层葬占39%，合葬墓占30%，两者占了近70%。因此，从葬俗和葬式的年代变化特征来看，以纱帽山墓地为例，Ⅰ、Ⅱ期以分层丛葬墓为主，Ⅲ期以合葬墓为主，Ⅳ期以后则以单人墓和合葬墓为主；在合葬、丛葬墓中，以二次合葬最多，一次与二次合葬次之，一次葬最少；一次葬中，又以仰身直肢葬为主。有学者认为，叠层葬始见于石寨山墓地，是滇文化的古老葬式，而单人葬则是滇文化的主要葬式^[59]。

此外，类似的葬式和葬俗还在贵州黔西地区也有发现。如银子坛墓地经过三次发掘，共清理墓葬166座，在该墓地较晚阶段的墓葬中，都清理出将多具人骨架散置于同一墓坑内的独特葬俗^[60]。

此外，类似的葬式和葬俗还在贵州黔西地区也有发现。如银子坛墓地经过三次发掘，共清理墓葬166座，在该墓地较晚阶段的墓葬中，都清理出将多具人骨架散置于同一墓坑内的独特葬俗^[61]（1978、1979年报告中被称为是随意处置尸首的“排葬、乱

葬”）。

如79年清理了21座土坑墓，墓葬形制较为特殊者有20座，其中单人葬11座，层葬、丛葬9座。朝向皆不规则，以仰身直肢葬为主。有的仅有头骨或仅剩肢骨；有的平面横行排列，还有的垂直逐层迭压葬。随葬品以陶器为主，铜器次之，铜铁兵器极少。不仅有成人合葬，也有大人、小孩合葬。成人合葬又分为分成叠葬和同层合葬等。从发现的合葬墓来看，有二人合葬、三人或三人以上多人合葬等多种。

由此可以看出，滇文化墓葬中流行的“多层叠葬”、“多人二次葬”等葬式葬俗在威宁中水银子坛晚段墓葬中依然存在。这似乎可以说明，作为“西南夷”青铜文化体系中最为发达的滇文化，其文化发展对于周边族群的强力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中水墓地所出的青铜中，不论是兵器中的剑、矛等还是装饰品中的扣饰、手镯、贮贝器等无不都是直接来源于滇文化或仿滇文化的青铜器生产，中水银子坛类遗存体现着浓厚的滇文化色彩。由此，与中水墓地较为邻近的可乐墓地，其墓葬中出土的蛇头形剑、一字格喇叭形首剑、石寨山形铜鼓及海贝等随葬品，应当是从滇池及其周边地区吸收而来，是滇文化对该地区影响加强的反映。

四、结 语

综上所述的比较和分析可见，黔西北与巴蜀、云南等地区之间的联系。赫章可乐的考古发现使我们对这一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文化变迁有了更多认识，其重要意义也因此得以进一步显现。

不惟如此，可乐墓葬的意义还在于它同时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蛇头形茎首铜剑、石寨山型铜鼓，这些习惯上所称的“滇文化青铜器”以及滇文化墓葬中各种复杂的葬式葬俗，以云南地区发现较多；还有柳叶形剑、三角援戈、弧刃钺、宽叶状矛、印章等“巴蜀青铜器”，以及铜兵器、印章上的

“巴蜀符号”等，过去也以成都平原发现较多，时代也较早。但由于可乐墓葬的发现，我们现在知道它们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时期也出现在黔西北。如此，这些“滇文化青铜器”及其墓葬中与滇文化类似的葬式葬俗和“巴蜀青铜器”是如何产生和流传开来的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地探索。

另外，可乐墓地位于黔西北乌蒙山脉中段，西面据滇文化核心区域（滇池地区）还有一定距离，东面据巴蜀腹地也相隔较远，因此，可乐墓地如何沟通滇文化与巴蜀腹地？特别是可乐大量汉式器物、汉代建筑基址的发现，这无疑突出了可乐在汉代随着中央王朝对西南夷地区设郡置县等一系列政治措施中所发挥交通地理位置的重要作用。这些重要问题，关乎我们对可乐墓地所目睹的深入认识。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

注 释：

[1] 贵州省博物馆.贵州赫章县汉墓发掘简报[J].考古.1966(1);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赫章可乐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86(2);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赫章可乐二〇〇〇年发掘报告[M].文物出版社.2008:13、46;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贵州赫章县可乐墓地两座汉代墓葬的发掘[J].考古.2020(5)

[5] 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59年(1);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至宋墓发掘简报[J].考古.1961(4);贵州省考古研究所.贵州兴仁安乐汉墓发掘报告[M].贵州田野考古四十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3:236-264。

[6] 沈仲常.成都扬子山的西汉墓葬[J].考古通讯.1955(6);宋治民.大邑县西汉土坑墓[J].文物.1981(12)

[7]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五里牌古墓葬清理简报[J].文物.1960(3)

[8] 洛阳区考古发掘队.洛阳烧沟汉墓[M].科学出版社.1959:160-185;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长安汉墓[M].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428-459

[10] 江章华.巴蜀柳叶形剑研究[J].考古.1996(9):74-88

[12] 张合荣.夜郎文明的考古学观察——滇东黔西先秦至两汉时期遗存研究[M].科学出版社2014:105-126;张合荣.夜郎青铜文明探微——贵州战国秦汉时期青铜器研究[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329-333;宋世坤.试论夜郎与巴蜀的关系[J].贵州文史丛刊.1982(1);宋世坤.贵州故夜郎地区青铜文化

初论[M].中国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176-182宋世坤.试论夜郎与汉文化的关系[M].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2:255-260;叶成勇.黔西滇东地区战国秦汉时期考古遗存研究——以南夷社会文化变迁与文明化进程为重点[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88-89

[13] 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四川新津县宝墩遗址1996年发掘简报[J].考古.1998(1);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成都新津县宝墩遗址田角林地点2013年的发掘[J].考古.2018年(3)

[14]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南郊十街坊遗址年度发掘纪要[M].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2001:1-28

[15] 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广汉中兴公社古遗址调查简报[J].文物.1961年(11);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广汉三星堆遗址[J].考古学报.1987(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土坑[J].考古.2004(10)

[16]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西郊化成村遗址1999年度发掘报告[M].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2001:127-145

[17]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金沙遗址“兰苑”地点发掘简报[M].成都考古发现(2001).科学出版社.2001:1-32;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遗址“置信金沙园一期”地点发掘简报[M].成都考古发现(2002).科学出版社.2004:1-41;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金沙遗址——阳光地带二期地点发掘报告[M].文物出版社.2017:328-345

[18]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青白江三星村遗址试掘简报[M].成都考古发现(2004).科学出版社.2006:255-282

[19] 施劲松.罗家坝墓葬与成都平原东周时期的文化[J].四川文物.2018(3)

[20]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商业街船棺葬[M].文物出版社.2009:27-29

[21] 王家.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J].文物.1961(11)

[22]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绵竹县船棺墓[J].文物.1987(10)

[23] 成都市文物管理处.成都三洞桥青羊小区战国墓[J].文物.1989(5)

[24]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西郊石人小区战国土坑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2(4)

[25]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J].文物.1981(6)

[26] 四川省博物馆.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发掘记[J].文物.1976(3)

[27]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成都市金沙巷战国墓清理简报[J].文物.1997(3)

[28] 四川省博物馆.成都西郊战国墓[J].考古.1983(7)

[29] 陈黎清.四川峨眉县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J].考古.1986(11)

[30]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犍为县巴蜀土坑墓[J].考古.1983(9);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犍为县巴蜀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84(3);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犍为金井乡巴蜀土坑墓清理简报[J].文物.1990(5)

[31] 四川大学历史系.大渡河南岸发现的蜀式青铜剑[J].考古与文物.1985(6)

[32] 四川省宜宾地区文化局.宜宾地区文物志[M].1992: 225

[33] 崔陈.珙县西汉土坑墓[J].四川文物.1987(2)

[34] 云南省昭通市文物管理所.云南省昭通市水富县张滩土坑墓地试掘简报[J].四川文物.2010(3);昭通市文物管理所、水富县文化馆.云南昭通水富张滩墓地发掘简报[J].文物.2015(9)

[35] 王涵.云南昭通管盘古墓群发掘简报[M].云南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年: 386-394

[36] 昭通市文物管理所.昭通田野考古(之一)[M].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 112-114

[37]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沙山湖桥一带古墓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57(4)

[38] 王有鹏.犍为巴蜀墓的发掘与蜀人的南迁[J].考古.1984(12)

[39]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东北郊西汉墓葬发掘简报[J].考古通讯.1958(2)

[40] 湖北省博物馆汉墓发掘组.湖北云梦西汉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3(9)

[41]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J].文物.1974(5)

[42] 王有鹏.犍为巴蜀墓的发掘与蜀人的南迁[J].考古.1984(12)

[43]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涪陵地区小田溪战国土坑墓清理简报[J].文物.1974(5)

[44]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M].文物出版社.1960: 36-54

[45] 云南省博物馆考古发掘工作组.云南晋宁石寨山古遗址及墓葬[J].考古学报.1956(1);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M].文物出版社.1959: 10-12;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三次发掘简报[J].考古.1959(9) 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第四次发掘简报[J].考古.1963(9);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晋宁石寨山——第五次发掘报告[M].文物出版社.2009: 13-15

[46] 昆明市博物馆.晋宁县金砂山古墓地清理简报[M].大理丛书·考古文物篇.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 1487-1517

[47]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宜良纱帽山滇文化墓地发掘报告 [M].南方民族考古(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12: 313-392

[48]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羊甫头墓地[M].文物出版社.2005: 1-16

[49]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呈贡天子庙古墓群的清理[M].考古学集刊(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32-142;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

贡天子庙滇墓[J].考古学报.1985(4);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呈贡天子庙古墓群第三次发掘简报[M].大理丛书·考古文物篇.南民族出版社2009: 1602-1606

[50]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呈贡龙街石碑村古墓群发掘简报[M].文物资料丛刊(3).科学出版社.1980: 86-97

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昆明呈贡石碑村古墓群第二次清理简报[J].考古.1984(3).

[51]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M].文物出版社.2007: 6-9

[5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澄江县金莲山墓地2008~2009年发掘简报[J].考古.2011(1)

[53] 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安宁太极山古墓葬清理报告[J].考古.1965(9)

[54] 熊正益.云南东川普车河古墓葬[M].云南考古文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8: 378-385

[55]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八塔台与横大路[M].科学出版社.2003: 15-22、151-160

[56]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曲靖市麒麟区潇湘平坡墓地发掘报告 [M].云南考古报告集(之二).云南科技出版社.2006: 1-59

[57] 蒋志龙.金莲山墓地研究[D].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72-75

[58]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澄江县金莲山墓地2008~2009年发掘简报[J].考古.2011(1)

[59] 蒋志龙.关于云南金莲山墓地的初步认识[J].考古.2011(1)

[61] 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威宁中水汉墓[J].考古学报.1981(2);贵州省博物馆考古组.贵州威宁中水汉墓第二次发掘[M].文物资料丛刊(10).科学出版社.1987: 113-130

安顺文庙

镂空雕龙柱雕成年代之管见

文 / 图 吴忠兴

安顺文庙大成殿前的镂空雕云龙石柱可谓今古奇观，闻名遐迩。然而，究竟雕成于何时，一直是一个谜。地方志书没有详细记载，雕刻者也未落款识，耄耋长者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说是明洪武年间文庙始时的遗物，也有说是清代文庙重建时雕成的。而有清一代，文庙就经历过几次建毁。

描述文庙的史料太过简略，是让人难以确定龙柱雕成年代的主要原因。对于文庙历代的建毁情况，《明实录·太祖洪武实录》《贵州图经新志》《贵州通志》《安顺府志》等史料多为笼统的描述，不要说具体到龙柱的雕成年代，就是当时建筑的概貌也不能得其一二。同时，由于古代建筑的毁建，都会对前期建筑有所继承：或在原有基础上建设，或对原有材料加以利用，每一座历史建筑常常汇聚不同时期的历史文化信息。因此，几经修缮的文庙的镂空雕云龙石柱的雕成年代，成为谜团也不足为怪。

那么，文庙镂空雕云龙石柱究竟雕成于何时呢？我们一直力图解开文庙龙柱雕成时间之谜。

查阅安顺文庙有关的地方史料，可以看到，对文庙镂空雕云龙石柱有直接描述的仅有民国《续修安顺府志》第二十卷杂志“十四龙柱石工”，其中说道“安顺府学宫以石工擅名，殿前龙柱工艺尤为突出……惜作者未留名，但传曰‘苏石匠’。学宫落

成，张壮恣提督以督署御书坊两狮太小，欲易之。苏仰体其意，精心刻成，磊砢雄峻，威镇一方。继又刻一对于将军第宅外，以后继无人，已移归江西会馆。”

描述未提及龙柱的雕刻年代，有限的信息是：文庙龙柱雕成时就很有名；石工不仅仅雕刻了文庙的一对镂空云龙石柱，同时还雕刻了另外两对石狮；两对石狮的雕刻与一位叫张壮恣的提督有关。

既然《续修安顺府志》这样言之凿凿，此事自然不可能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况且提督已称得上封疆大吏，志书对他们的记载应是有根有据，不敢杜撰。为此，张壮恣提督贵州进驻安顺的时间，就成了查找文庙龙柱雕成年代的主要线索。

那么张壮恣提督贵州进驻安顺的情况怎样呢？

清咸丰《安顺府志》武职官谱记载了贵州提督46人，民国《续修安顺府志》武武官记载了贵州提督23人，共计记载贵州提督69人。其中张姓提督6人，分别是：张勇（不知任职年代），张文焕（康熙五十二年任），张和（乾隆四十一年任），张国相（道光十九年任），张亮基（同治二年任），张文德（同治六年任）。可以看出，6名张姓提督中没有张壮恣此人。

提督不是小官，有清一代，提督为从一品，即是说一品大员怎么会没有这个名字呢？

安顺文庙镂空
雕石龙柱



是不是古人为了张扬龙柱而附会了这个故事呢？张壮恁的信息一直萦绕在我们心中。

某日翻阅清咸丰《安顺府志》，“壮恁”之名跃然眼前。卷三十三职官志<六>武名宦传“张国相传”说：“公姓张，讳国相，字廷佐。云南永昌府龙陵厅人，……少孤，事母至孝，年十四入营。”因战功卓著，道光“十八年奉旨补授福建陆路提督，……随即改调贵州提督。……至黔两任，于二十五年以伤疾辞休，请旨入籍贵州。蒙恩予告，准其入籍贵州，并赏食全俸，以养余年。……辞休后，居安顺四载。谢世时，年七十有五。……事闻，蒙圣恩轸念老臣，赐谥‘壮恁’，予祭葬。”

这段史料告诉我们，张国相提督因战功显赫，死后获誉皇帝赐谥“壮恁”，“壮恁”即是张国相的谥号。传中也就张国相提督贵州的时间、任期，辞休后改云南籍入贵州籍，并居住安顺等作了记载。

张国相传的撰写者张祥河“以粮储使与张国相同寅，继与糟务，朝夕相亲。”史料很可信。同时，张国相提督驻安顺是符合历史背景的，因为贵州提督自康熙六年移驻安顺到大清朝结束未再改驻它处。

那么，安顺文庙大成殿在张国相提督贵州时是否进行过修缮呢？如果没有进行过修缮，这一记载也是不能成立。

《安顺府志》营建志“学校”对这时期的文庙作了这样的描述的“……道光十七年，署知府宋庆常、教授黄淳、训导彭拔才建议增修，乡宦宋劭毅倡捐，暨合郡绅耆杨春发等买地广基。十八年，知府经武济兴工改修崇圣祠、两厢、大成殿……。二十年，知府张镒修成。”

史料告诉我们，该次改建历经三任知府，历时四年，道光十七年开始筹划、十八年兴工建设、二十年建成，并确切说到大成殿在改建之列。

从道光十九年张国相提督贵州驻安顺，与安顺府学道光间的建设史料来看，文庙进入施工后的第二年即道光十九年张国相就到了安顺，其应亲眼目睹了文庙的建设及龙柱的雕刻过程。在他看到文庙龙柱的精湛后，于是产生了“督署御书坊两狮太小，欲

易之。”的念想，也就有了苏石工“仰体其意，精心刻成”，以及再“刻一对于将军第宅外”的后续工程。也正是这一后续工程与府志记载文庙改建情况的相互印证，形成了确定龙柱雕成年代的关键一环。

再从时间跨度来看龙柱雕刻故事的可信度。道光十八年（1839年）文庙开工改建，至民国《续修安顺府志》撰成，时间相距约90年。如果20岁的人参与文庙的这次改建，那么50年后（即1890前后），70岁的他们将亲身经历文庙改建的故事讲给20岁的人听，这是完全可能的，而再过50年（1940年前后）这些亲耳聆听过这段故事的年近古稀的人有可能参与府志的编撰，或成为撰写这段故事者采访的主要对象。这些人应目睹了将军第宅外石狮“以后继无人，已移归江西会馆”的历史。应该说信息是准确的。

再从龙柱的雕刻风格上看龙柱的形成年代，石雕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技法演变基本概括为从简到繁，由写实到写意，由具象到抽象，由威武到憨态。这一变化在清代显得尤为明显，特别是清后期其繁缛、柔弱、纤细已近成为一个时代的特征。从文庙龙的表现形式上看，特别是龙头的表现，已完全没有了清初乃至明代龙头的狰狞与霸气，虽然动态十足，但其更多显示的妩媚。我们将之与现存的清代各类官窑瓷器上表现的龙的形态对比，可以看出与之风格几近。

综合分析，安顺文庙镂空雕石龙柱就是道光间文庙大规模建设时的产物，具体年代是：除去道光十七年的改建筹备时间，十八年的选材、采石、运输、树立、成坯、打磨等工作流程，最后雕成的具体年代应在道光十九年（1840）至道光二十年（1841）间，悬殊不会超过1年。

按《续修安顺府志》所载，与文庙龙柱同等技法雕成的还有两对石狮，但早已没有了踪迹。如果能找到当年所雕石狮，其“磊砢雄峻，威镇一方”的艺术手法，也必将成为重要的地方历史的文物。❧

（作者单位：安顺市文化局）

平溪卫改设玉屏县考略

文 / 图 汪 兴

卫所制度是明朝洪武皇帝朱元璋为强化对国土疆域进行有效管治的重要政治和军事管理体制之一。而平溪卫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它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三年（1390）三月三十日，是玉屏县治的前身。到清雍正五年（1727）改称玉屏县止，前后跨越了明、清两朝，其中，在明朝为254年，清朝为83年，共计时长为337年。那么，平溪卫为何在清王朝建立83年后才被裁改呢？其裁改进展情况又如何呢？

一、清初对卫所的变革

自明洪武初年开始建立起来的卫所军屯制度，到了明朝中后期，由于“卫所之官，各占军余，而屯军愈缺，卫所苦于屯卒之负，而公用不支，屯卒苦于卫所之役，而逃亡相继，”^[1]致使“洪武间各卫军士，屯田十分之七，近年征差逃故者多，遂以余丁老幼足之，且余丁递年供应正军，复命田屯，实为重困，乞将老幼如例屯田，余丁优免。”^[2]而到了明万历年间，“本朝粮田之法，今已废坏。军士逃亡过半，耕种之人，多非本军，皆民承佃。”^[3]军士的“逃亡”和“屯田”的易人，使得存续200多年的卫所体系到明末时，基本上已是“名存实亡”了。

清顺治元年（1644），清王朝建立之后，对明朝遗留下来的政治和军事制度进行了变革，而这种“变革”则是一种渐进式，尤其是对“名存实亡”的明代卫所制度改革表现较为明显。据《清实录·世祖实录》卷28第1730页载：“指挥、千户、百户已尽裁，而卫所必不可裁，每卫应设掌印官一员，兼理屯事，改为卫守备，千户改为卫千总，每所设一员，俱由部推，百户改为卫百总，每所设一员，由督抚选委，其不属于卫之所，俱给关防，卫军改卫屯丁。凡卫所钱粮职掌及漕运船事务，并都司、行都司分辖，皆宜照旧。从之。”此项政令是在保

玉屏印山书院，始建于清道光七年（1827），今为玉屏箫笛博物馆。



留“卫制”的前题下而展开的，主要是将军管型行政区转化为府州县制，并分区域、分时段、分类型，由内而外渐进地变革卫所，逐渐完成由卫所制向府州县制的平稳过渡。其实施政策包括：“民属郡县，军属卫所”，改“卫军”为“屯丁”，永不勾补，将上交赋税的数量、收缴方式和对地区人口管理的方法与州县相统一，调遣裁撤各级军官，将卫所主要管理权交给地方文官管理，保留卫所边卫、城守、漕运等关键职能，逐步取消世袭豪强的特权等。

“卫制”改革不仅使其军事职能被八旗、绿营取代，由此“军”“民”户籍二员对立的矛盾得以化解，而且还减少了一大笔行政支出。然而由于此项改革属渐进式的，因此，所耗费的时间也较长。据有关史料记载：贵州境内的24卫、2个一级所、32个二级所。自康熙元年（1662）开始，到雍正五年（1727），其裁改前后用了65年。其中，康熙元年，裁9所；康熙五年，裁10所；康熙十年，裁6卫、2所；康熙二十一年，裁1所；康熙二十二年，裁1卫、1所；二十六年裁撤14卫、11所，达到最高峰。雍正三年，裁1卫；雍正五年，裁2卫。但在裁撤之后，由于黔东南古州等厅发生苗民叛乱等因，又于乾隆三年（1738）复置了古州左卫、右卫，八寨卫、丹江卫、台拱卫、凯里卫、黄平卫、清江左卫、右卫等九卫；于嘉庆六年（1801）置石岷卫。直到宣统三年（1911）才被裁撤结束，前后历时二百五十年。

二、平溪卫被延改的原因

清王朝对明代“卫制”的改革始于顺治初年，据有关史料记载：顺治三年定屯田官制，裁卫所指挥千百户，每卫设守备一员，千户改为卫千总，百户改为卫把总，分理卫事。而对平溪卫制的变革则是从顺治十六年（1659）开始，据清乾隆《玉屏县志》卷9事纪志第200页载：“顺治十六年己亥，裁

卫指挥世职，设守备一员。招集流亡，填实孔道。编官军为屯民。”同时，“设驻防千总一员，领防兵一百名，俱于沅镇五营轮拨。康熙初年，改设把总一员，领兵五十名。”^[4]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对平溪卫的改革仅停留在对“裁卫指挥世职”“编官军为屯民”和缩减的兵额方面，没有从根本上对“卫制”进行完全裁撤。分析其要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西南地区仍存在着许多不安定因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1644年，清王朝虽然统一了北方，但南方尤其是盘据在大西南的南明永历政权仍然尚存。因此，对其进行军事进剿，加快大一统的进程成为清廷的第一要务。而南明永历政权一直延滞到康熙元年（1662）4月才被灭亡。其二、平西王吴三桂征南结束后，清廷以“贵州接壤云南，皆系岩疆要地，且苗蛮杂居，与云南无二。其一切文武官员、兵、民各项事务，俱照云南例，著平西王管理。”^[5]然而，盘据在西南边陲的吴三桂却于康熙十二年（1674）起兵反于云南，直到康熙十九年（1681）才被平定。平溪、清浪、偏桥、镇远四卫虽隶属于湖广管辖，但其所辖地域已完全深入贵州境内。因此，所受其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

二是湖广、贵州巡抚两相博弈，使朝廷一时无定论。对于平、清、偏、镇四卫的归属问题的争议，始于明朝中期，由于事权不一、推诿扯皮现象时有发生。对此，右副都御史郭子章在《咨兵部总督再议四卫（黔楚更隶府卫）》道：“四卫之武弁，畏黔近则耳目难欺，利楚遥则法目疏阔。”^[6]同时，又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上奏了《播平善后事宜疏（区画播地）》，奏章中建议“合无以黎平一府、永从一县，改隶湖广，镇远、偏桥、平溪、清浪四卫改隶贵州。文武官军俸粮，岁费公用，悉仍其旧，则军民合为一家，上下不相秦越，即有寇警，谁能诱之。伏乞圣裁。”^[7]并得到了明廷的批准。但因湖广方面的激力反对，改隶仅2年时间

后，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又被拨回湖广。

到了清朝时期，湖广和贵州两都司虽没有针对“四卫”隶属关系的划转有直接的争议，但却在生儒“应试”上做起了文章。据清乾隆《贵州玉屏县志》卷九事纪志载：

“顺治十七年，总督赵廷臣，题请平、清、偏、镇四卫生儒，照旧赴黔应试。”“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巡抚杨雍建，题割平溪、清浪二卫划归湖广，次年因以二卫学校归楚。”“康熙二十八年，巡抚田雯，疏题设贵筑县学，并以平溪、清浪二卫归黔。”两相争取的结果是“雍正五年，奉旨将平溪改卫设县，赐名玉屏，永隶贵州。”^[8]而其中关于“永隶”二字的用词，在清朝廷对某一“地域划转”的圣旨中极为罕见。

三是清廷暂时中断了“卫所”改制的进程。据有关研究论证：自康熙三十二年宣府镇卫所改制之后，卫所归并州县的进程却突然陷入停滞，且这一停滞期持续了约30年^[9]。虽然其间有部分朝廷官员上疏要求继续裁改，但均被圣祖“卫所改州县，不可准行。余如所议。”^[10]

四是民间的声音。民间的声音主要来源于“卫学”方面，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因平、清、偏、镇四卫考生遇“洞庭覆舟”之变，平溪卫人侯位应广大学子之请，向朝廷题请将“平清偏镇四卫”卫学附贵州乡试，由湖广举人名额内，拨五名入黔，平溪卫学附思州提调。后又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复以四卫学归楚。进入清朝时期，先后进行了二次反复改隶，致使二卫诸生对迢遥川途，洞庭惊险，恒多畏阻，两科以来，无一士子能去武昌参加应试。面对民间的疾苦，康熙二十八年（1689），贵州巡抚田雯在“请建平溪清浪两学疏”中呼吁道：“诸生应试，东下武昌，迢遥川途，不下二千五六百里。资斧既难，而鼓柁洞庭，士心恒多畏阻。臣赴任时，身过其地，同声呼吁，云两科以来，从无一士能赴武昌应试者，情实可悯。应请复还黔属，就近提调之

制，以示作养。”^[11]再次请求二卫学重新归黔。直到康熙三十三年（1694），才重归“思州府提调。”^[12]

三、裁卫设县的进展情况

雍正年间，清廷再次重启“卫所”的改革始于雍正二年（1724）的一道上谕：“滇蜀两省曾经裁减卫所，未闻不便。今除边卫无州县可归，与漕运之卫所民军各有徭役，仍旧分隶外，其余内地所有卫所，悉令归并州县。”^[13]而对平溪、清浪两卫裁撤的动议是在雍正四年（1726）四月戊寅，由铜仁府正大营同知冯光裕提出的，他在向朝廷的奏疏中指出：“湖南平溪、清浪二卫，与贵州思州府接壤，去湖南省会辽远，请改归贵州管辖。”^[14]那么，这个冯光裕是何许人也？据《清史稿·冯光裕传》载：“冯光裕（1684—1740），字叔益，山西代州人。康熙五十年举人。雍正元年，出任云南大姚知县，历任贵州铜仁府同知，升贵州思州知府，调云南永北府知府、丽江府知府，擢云南驿盐道副使。雍正八年升云南按察使。”他“迁贵州铜仁同知，赴阙引见。时古州苗方乱，世宗询及之，光裕对苗不可尽杀，宜随机化导，令归版图，上韪其言。”由此赢得官声。

玉屏县境图
(选自乾隆
《玉屏县志》)



冯光裕的奏章引起了清廷的重视，并于雍正五年（1727）二月辛酉复意“定改湖南改归贵州之清浪、平溪二卫，属思州府管辖。”^[15]“奉旨将平溪改卫设县，赐名玉屏，永隶贵州。”^[16]同时，为全面推进裁改，雍正五年（1727）闰三月丙戌，云贵总督鄂尔泰疏言：“湖广五开、铜鼓、平溪、清浪四卫改归黔省管辖，应增设官兵防守五开、铜鼓，请将黎平府协官兵拨防。查黎平协，原设副将一员、守备一员、千总二员、把总四员、兵六百二十名，今加五开、铜鼓二卫，地方辽阔，恐难兼顾，应添设守备一员，兵三百八十名，合原设之官兵，分为左、右两营驻防。平溪、清浪，乃水陆要冲，应拨镇远协分防思州之游击一员驻扎，拨把总一员、兵一百五十名，分守平溪；把总一员、兵五十名，分守清浪。至思州系府治，亦不可无官兵防守，应於镇远协内拨千总一员，兵五十名驻防。其自湖广归并黔省之天柱营，所有参将、守备、千总等官，应令黎平协副将兼辖。再，平溪、清浪二卫，请照五开、铜鼓之例，改为二县，设知县、典史、教谕、训导各一员。均如所请”从之。寻定：五开新改县曰开泰，铜鼓新改县曰锦屏，平溪新改县曰玉屏，清浪新改县曰青溪。”^[17]而对于裁改后官兵的调整，雍正五年（1727）四月己丑年，湖广总督福敏也疏言：“绥宁县地方，苗杂处，应黄桑坪设营，弹压，……请将已改归黔省之铜鼓、五开、平溪、清浪四卫守备千把五员并原防守黄桑坪把总一员、兵三百零四名应为绥宁营……。”^[18]

平溪改卫设玉屏县的序幕拉开后，首先便是地界划分工作的开展。雍正六年，黔楚两省召开划界会议，并议定“将附近湖广麻阳县之麻屯拨归麻阳；附近湖广沅州之沅屯，拨归沅州；将附近玉屏县之沅州西溪六里，拨归玉屏。”^[19]会后，玉屏代理知县卢造按照会议的要求，将沅、麻两屯册籍移送沅、麻两州、县。但在雍正八年。沅州仅“将平三一里中之四、八两甲拨归玉邑。”

而“东门外与其平二里及平三里之一、二、三、五、六、七、九、十等甲田土相连，南门外与其平四、平五、平六田土相连，仅存坡岭坟山。自东门外起，至鲇鱼堡黄泥坡止，由明至今，历系军山，属玉管理，切夫马及修路等项为玉邑人民应役。其余地界，皆与沅属参错。”^[20]至此，地界划分工作暂时告一段落，玉屏县的地界也由原来平溪卫时的“平屯、沅屯、麻屯”，仅存“平屯”一地了，辖2甲33户。其区域为“东至湖广沅州三十里；西至本府、镇远、清溪搀杂交界二十五里；南至湖广沅州界三里；北至本府界二十里；东西广三十五里；南北袤三十三里。”^[21]与今日玉屏县域地界大致相仿。

其次是县级机构的配置。按照清廷对每个县级机构设置的有关规定，玉屏县“设知县、典史、教谕、训导各一名。并将分防思州游击移往玉屏。”^[22]县署还“下设6房（吏、户、礼、兵、刑、工）、3班（快、皂、壮），配有书办10人，门子2人，皂隶12人，民壮30人，禁卒2人，轿伞扇夫7人，斗级2人。”^[23]同时，县辖地有四，即“东乡、南乡、西乡、北乡。”^[24]所辖村寨有：地（帝）城、高家冲、大树林、张家湾、孔塘、叶家寨、隘门与军屯、岩下、滥泥沟、何家屯、杨家冲、白岩、太平桥、半山、又潮水沟至贺家屯共19处；长冲、廖家坡、牛家场、杨柳冲、谢家桥、洪水湾、才冲、喇恰畈、务杨铺、官树垄、地引、大坪、冲坝垄、安塘坡、青山沟、孟寨、两河口、猴子桥堰2处、唐家屯、小地千垄、崇滩、猫猫冲4处、詹家屯、竹寨、马家坪5处、帚箕湾2处、高楼坪、团仓户、白果林、打油里、洪家湾、迷楼、庆寨4处^[25]。

其三是户丁和田赋的划转。在户丁方面；据清乾隆《玉屏县志》卷5赋役志第106页载：“又楚省沅州拨归管辖，原额三十二丁四分九厘七毫三丝五忽，额征丁银：二十七两一钱三分六厘二毫二丝九忽三微一尘。”乾隆年间，沅州府“又黔

省拨归玉屏清溪施秉等县，寄庄随粮人丁一百三十五丁九分三厘零。”^[26]其中，“又黔省拨归玉屏县寄庄随粮屯丁六十四丁五分。”^[27]在田赋方面：清《沅州府志》卷13田赋第147页载：“又雍正八年，沅黔麻归拨黔省玉屏、青溪、开泰、镇远、施秉五县寄庄原额屯田地，二百四十四顷二十三亩四分三厘四毫三丝五忽二微一尘四纤五渺。”其中，“沅州开拨黔省玉屏县管辖，原额及续报首垦民赋田地塘二十一顷八十亩九分七厘七毫三丝。”^[28]又据清乾隆《贵州玉屏县志》卷5赋役志载：“原额屯田地：二万六千一百九十四亩三里九毫三丝，内除雍正八年拨归楚省沅州、麻阳县管辖熟田：九千五十七亩二分三厘五毫四丝忽八微七尘，又雍正十二年分拨归荒田：四千六百三十八亩六厘三毫四丝二忽七微五尘二纤外。实额田：一万二千四百九十八亩七分四厘四丝四忽三微七尘八纤。”^[29]。文

（作者单位：铜仁市侗学研究会）

注 释：

[1] (明)朱健.古今治平略[Z].复印体.崇祯十一年(1863).

[2] 明实录·宣宗实录[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中华书局.1974

[3] (明)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M].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影印本.1978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委员会.贵州玉屏县志·清乾二十二年(1757)修·注释本[M].钟德善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74

[5]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古籍整理委员会编,清实录贵州资料辑录[M],广东:汕头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第15页

[6] (明)陈子龙等.皇明经世文编[M].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影印本.1978: 419-420

[7] (明)郭子章.播平善后事宜疏[M].明经世文编//郭青螺文集.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62”

[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委员会.贵州玉屏县志·清乾二十二年(1757)修·注释本[M].钟德善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200

[9] 毛亦可.清代卫所归并州县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100

[10] 康熙起居注[Z],康熙四十五年三月初四,第1949页

[1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委员会.贵州玉屏县志·清乾二十二年(1757)修·注释本[M].钟德善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224

[12] (清)蒋深.康熙思州府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编.影印本.巴蜀书社.2006: 4

[13] 清世宗实录[M]卷19雍正二年闰四月甲申

[14] 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633

[15] 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797

[1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委员会.贵州玉屏县志·清乾二十二年(1757)修·注释本[M].钟德善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200页

[17] 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49

[18] 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53

[1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委员会.贵州玉屏县志·清乾二十二年(1757)修·注释本[M].钟德善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51

[2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委员会.贵州玉屏县志·清乾二十二年(1757)修·注释本[M].钟德善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51

[2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委员会.贵州玉屏县志·清乾二十二年(1757)修·注释本[M].钟德善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51

[22] 贵州省岑巩县志编纂委员会.岑巩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10

[2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委员会.贵州玉屏县志·清乾二十二年(1757)修·注释本[M].钟德善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413

[24] 贵州省岑巩县志编纂委员会.岑巩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49

[25] 贵州省岑巩县志编纂委员会.岑巩县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 50

[26] 杜莲英编, (清)沅州府志[M]上册卷12户口,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4月,第141页

[27] 杜莲英编, (清)沅州府志[M]上册卷12户口,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4月,第140-142页

[28] 杜莲英编, (清)沅州府志[M]上册卷13田赋,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年4月,第148页

[2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委员会.贵州玉屏县志·清乾二十二年(1757)修·注释本[M].钟德善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 107

姚华诗书画赏析

文 / 图 刘 恒

姚华被称为“京师第一通人”，在书法、绘画、诗词曲方面皆有诣。贵州省博物馆藏有一批姚华的书画作品，上有书诗词曲。现择几件精品，对姚华书法、绘画、诗词曲进行赏析。

姚华（1876—1930），字一郢，号重光、茫父、莲花庵主等。贵州贵筑（今贵阳）人，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曾留学日本，就读于法政大学。归国后于清政府和北洋政府中短暂任职，后隐归，潜心于文章学问，亦旁及书画篆刻。据姚华夫子自道，他是“诗第一，书第二，画第三”。尽管如此，四十之后方始步入画坛的姚华，画名并不逊于其诗书之名。弟子郑天挺曾评价

说：“贵筑姚先生以文章名海内三十余年，向学之士莫不知有弗堂。晚年潜豁古寺，出其余绪以为书画，见者惊为瑰宝，而文名反为所掩。”贵州省博物馆藏有姚华书画作品甚多，现择其部分佳作，供大家一品诗、书、画相合的中国传统文人画境界。

姚华生活的年代，恰逢中国社会“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之际。欧风美雨席卷，中国文化风雨飘摇，使中国传统社会从器物到制度，再至思想，历经一变再变，从“中体西用”，走向中学不复为体的不归之路。与思想界一发不可收拾的喜新厌旧心态相呼应，绘画界也掀起了批古变革的“美术革命”，从对“四王”的批判，扩大至对宋元以来文人画的整体否定，认为文人画的“写意”画法是近世中国画衰微之祸源。而学者兼画家的姚华，与中国画学会的同仁们在欧风美雨的浪潮中坚守中国传统文人画的精神，反对绘画领域的西化论调。姚华曾说，中国传统的文人画是“学也，且非学也，性灵也，文章也”。也就是说文人画不仅是一门单纯展示画家绘画技艺的艺术，更是一门中国文人求学问道，明心见性的艺术。因此，中国文人画的根本特点是“画以载道”，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发明，是中国文人性灵的抒发呈现。



人物团扇
(作于1916年，绢本，
规格：21×21cm)

姚华进一步提出“文人之画有人存焉”、观其画如见其人的美学主张。这种强调绘画是对画家内心情感的自然抒发的论调，是对倪瓒“逸笔草草，聊抒胸中之逸气”，以及石涛“我自用我法”的传统绘画理论的延续。在姚华的艺术实践中，我们也可一窥这种“心师造化”的艺术理论。其所作花卉避尘脱俗，清新可人，“以书卷气见长，铅华洗去，挹露带雨，楚楚有屈子香草美人遗意”。正所谓画如其人，观其画，可以窥其人的儒雅之风，恬淡之境。再加之题诗表意，画家性情与感悟尽在画中。

姚华深知艺术必须既有传承又有流变，任何固守与撕裂都是危险的。他指出，艺术既要有传承，学习古人与今人的一切好处，又要突破古今人的藩篱，能出古入新，挥洒胸臆。因此，姚华及同时代的中国画学研究会画家们，上溯元宋唐汉，博习诸家，从中寻求中国画的生命力之源、以求采古变今。在此基础上，姚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画风。如他的山水画颇有北宋山水的雄壮之气象，刘海粟曾评价道：“姚华山水，山外浮山，水外绕水，于不可复加处作繁笔，于不可再略处作减笔，奇兵侧出，墨点如蹄痕化鼓，山鸣壑应，林莽惊风，天台桃源，近在咫尺，人间之烟火，生生不已。石田骏骨，髭残枯烟，更见蕴藉深沉。”

姚华与好友陈师曾时常研讨汉唐画像砖，二人相互激赏。姚华凭借深厚的小学、考据学功力，直接用汉唐画像砖补益绘画。陈师曾对他的古画砖入画很是欣赏，曾有诗《题弗堂所藏仕女古画砖》：“蛾眉奇绝内家妆，粉墨凋零想汉唐，好古另开金石例，弗堂双璧费评量。”姚华的人物画大都直接取养于汉唐画像砖，他惯用“勾乙”法描绘人的面部，使人物更显端庄典雅，颇有汉唐之风。

姚华对文人画的创新，更体现在他首创的颖拓之法上。颖拓是介于书与画之间的一种艺术形式，以规摹古代金石碑刻为主。先用双勾法钩出轮廓，再用墨填匡廓外的部

分，留双勾轮廓内为空白，做出黑底白字的拓片效果。功夫全体现在动笔用墨上，兼书兼画。姚华也说：“是画是书无能名焉矣。”所拓之物广泛，不仅有碑刻，还有南北朝及隋唐时期的佛造像及金石器皿等。在他民国三年（1914）与陈师曾合作的祝寿之作《“古欢图”立幅》中，可一窥他颖拓入画的风格。图中有壶、釜、豆、鐏斗四体古器物。此四体古物皆颖拓所成，使得器物既有金石的质感，又有文人画的凝动飞扬。虚虚实实，尺幅之间容纳无尽之像，画面立增古意。器中花卉乃陈师曾补绘，笔法老辣熟练，设色浓湿枯槁富于变化。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诗画一体，是文人画的基本特征之一。早在宋代，苏轼就有诗云“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以诗入画，以画绘诗，诗与画，两种不同艺术形式的结合正是文人画的魅力所在。但却要求画家诗书皆通，画作根



带叶腊梅图

(作于1928年，纸本，
幅面：80×149cm)

秋帆催客归
(作于1925年, 纸本,
幅面: 28×68cm)

古欢图
(与陈衡恪合作于
1914年, 纸本,
幅面: 34×117cm)



植于深厚的学养之中。姚华作为一个传统的科举文人，精于金石小学考据之理，书法诸体皆善，独树一帜。早年更是以诗闻名，在他的《弗堂类稿》中，诗词有十一卷之多。此外，他还是与王国维齐名的戏曲理论家。因而，姚华又被誉为“旧京都的一代通人”。如此全面的文化修养，自然使得其画作自有一种臻于化境的境界。

姚华自语，其作仅是“博其诗与书之趣”，虽只是他的自谦之语，却道出了其作品为诗、书、画三者共同营造的一种艺术境界。

《“秋霁”图立幅》为民国二年（1913）秋所作。此时姚华始步画坛，正值中年。画中是秋日晴空下的莽莽高山，上

方有题诗曰：“人生能几莺花节，一度莺花一黯然。忽忽秋霜吹上发，诗情画意亦缠绵。”寥寥数语写出了诗人感叹时光易逝，岁月催老，华发早生的心境，俨然一首悲秋伤怀之作，与画中秋境两相应和，更添悲秋之情。

诗词之外，姚华亦以曲入画。姚华是一个戏曲理论家，著有《蓼猗室曲话》和《曲海一勺》两部戏曲理论著作，更有《蓼猗曲》曲集传世。他画《重阳秋菊图立幅》，右上方留白处题有曲《阅金经》：“蟹紫螯初健，月明霜紧催。时节重阳花正开。杯，几家倾玉醅。秋又去，却教花唤回。”画中菊花三簇，淡粉淡黄，花繁枝茂。此曲却写出一派重阳秋夜、明月高悬，手持蟹螯与酒杯赏花的画外场景。正如姚华所说：“画有暗意，不能悉显也，则以题透之；画有省笔，不悉详也，则以题足之。”以上两幅画作所题之诗与曲，正是为显画之暗意。

又如，他的《兰花图折扇面》中一株兰花静立于扇面左侧，清幽静雅。右侧大面留白则题诗一首：“繁红落尽始凄凉，直到忘忧也未忘。数朵殷红似春在，春愁特此系人肠。”此首伤春之诗，以行草写成，一句一行，行云流水，正好与左侧兰花两相呼应。使之成为画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平衡了画面的整体感觉，又抒发了画中所寓之情。姚华的绘画，很好地诠释了中国传统文人画的内在精神。画中这种静虚自守，中正平和的气韵，也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更是我们这个急速发展的时代所需要的精神内核。^②

（作者单位：贵州省博物馆）

“牂牁要路” 楠干子的桥梁

文 / 图 娄 清

据当地口碑相传，很久很久以前，野猫河畔的一株楠木树的枝杈缝隙处，意外生出一株柑橘树，楠木树和柑橘树合为一体，前人因之，称“楠柑子”，不知何时，衍变为“楠杆子”，并一直沿用至今。这里，就是德江县楠杆土家族乡所在地，一处史称“牂牁要路”或“牂牁要冲”的地方。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兴于春秋，消亡于战国的牂牁国，存在的时间虽然只有百余年，但它却是贵州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阶段。鉴于此，楠杆土家族乡的历史便可以上溯至2500年前。

据文献记载，明洪武十年（1377）属水特姜司，二十八年（1395）改水德江长官司为思南宣慰司所辖。永乐十一年（1413）设立贵州布政使司，贵州建省。十二年（1414），置思南府，治所水德江（今思南）。万历二十三年（1595）除水德江长官司，改安化县，治所在思南府南郭。楠杆为安化县辖四十甲之西路墟市，称楠杆子，也叫栏干子，指的是现今乡政府驻地所在的兴隆社区。明代开场设市时的场期为四、九。因此，明代及以前，楠杆子既是思南府北路经婺川通四川陆路大道，也是婺川南下经思南往贵州（今贵阳市）的通省要津。明以来，思南府往北经“松溪路抵婺川县”，自

思南府至婺川县所设铺舍有府前铺（在府治前左，属思南府）、鸛鹑铺（属水德司）、板坪铺（属水德司）、煎茶铺（也有说蛇盘铺属水德司）、松溪铺（属蛮夷司）、天井铺（属婺川县）、丰乐铺（属婺川县）、牛塘铺（属婺川县）、县前铺（婺川县治前右）。其中天井铺即在今楠杆土家族乡楼房村。楠杆子虽未设铺舍，但为道路必经，自天井铺北行至此，向西翻越天半寺坳口，西北下，渡“险如天堑”的丰乐河丰乐渡。仅由松溪铺至楠杆子，则不必绕行天井铺，可走石重盖，正如文献记载那样，“石重盖为煎茶口楠杆子要道”。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整个思南府，包括婺川县和印江县，铺司兵共81名，天井铺设铺司兵2名。

清康熙设邮递铺，自思南府至婺川县设鸛鹑铺、板坪铺、煎茶铺（蛇盘铺）、松溪铺、天井铺、丰乐铺、牛塘铺、县前铺共八铺，松溪铺和天井铺改归安化县管理。据清《会典事例》记载，松溪铺至天井铺二十里。至清道光年间，楠杆子有铺民三十余户。后设有塘汛，即天井塘。

由于官道所经，楠杆子历为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清咸丰同治年间，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咸丰八年（1858），教民杨二率号军屯兵天半寺，准备攻打婺川县城，县令

楠杆结龙桥

阮文藻征召濯水南客寨庠生覃元贞与生员刘靖宇携团练分途进剿。其中覃元贞由柏香坝渡河攻中路，杨二部居高凭险扔石头还击，势如骤雨。覃元贞率壮士百人冒石强攻，杨二部只得放弃天半寺撤退，覃元贞等追至楠杆子时，与赶到的刘靖宇部汇合并夹击而大破号军。这是清《都濡备乘》的记载。

据民国《婺川县备考》记载，咸同年间，虽因战乱致使“大道荆棘”，但四川和湖广的烟商仍然取道楠杆子经婺川入川，每日所收厘金约“百金”。收取厘金的厘金局系咸丰末田兴恕所设，厘金数“十石抽一石。以一成归乡团，一成归城局，八成解省。地方有事仍许动用”，推行后“月可得五百金，军用稍裕”。因故，还在“布商到婺川必经”的印江县所属袁家湾也设有厘金局。同治元年，田兴恕“令克七星营，营在天半寺侧。令张光朝守之，以遏贼出路，又令邹明标屯天半寺，以护粮道。招降楠杆子、天井塘贼七百人，以曾白四、杨兴科领之，名其团曰‘顺存’”。

清光绪八年（1882）安化县治迁大堡（今德江）。民国二年（1913）改安化县为德江县，全县改编为9个区，楠杆子为西1区。民国年间，楠杆子有中心学校一所，国民学校九所，仓廩一所、二间。民国十七年（1928）楠杆子与县城接通电话。二十年（1931）楠杆子始设邮箱，经煎茶代办局送县里邮局，一日一班。三十年（1941）并入煎茶，不久改联保，三十二年（1943）改为楠杆乡。

1950年楠杆乡为18乡镇之一，随后数



度变更，于1992年撤销天井、楠杆、洋乐三个小乡合并成楠杆土家族乡迄今。

楠杆子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文物类型齐全，古道、桥梁、寺庙、民居、摩崖石刻和碑刻、营盘、茶园等一应俱全。但最具特点的是以镇风桥为代表的八字撑架木梁桥。该桥俗称“花花桥”，位于兴隆社区上坝组西北隅，为铜仁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西北东南向跨刺子沟。始建年代不详。据东南桥头建桥碑记记载，清道光五年（1825）上坝杨氏族人在“头人”带领下重修。根据桥屋大梁题记，现存桥梁建于清光绪四年（1878），由杨光文，杨光武。杨光富弟兄三人倡导乡人集资重建。桥长13.66米，宽6.14米，桥跨10.2米。桥面距水面高5.23米，桥屋通高7.68米。以9根原木，大小头交替至于两岸石砌桥台上作简支梁，梁上横向铺设木板形成桥面。为加强简支木梁受力条件，木梁下增加一组八字形斜撑，成为八字撑架结构。桥面上建桥屋五间，中间金柱抬升做四角攒尖顶，桥头金柱抬升做悬山顶门楼。桥屋四角发戗起翘，屋面曲线优美。桥屋内设坐凳栏杆，栏杆外挂披檐。桥屋中间西南侧设神龛，内供神像，东北侧桥面上安置岩菩萨。桥两端门楼上分别墨书“寿长”和“镇风”，表明人们的期许及建桥目的。

而这种八字撑架木梁桥，是已知贵州历史上仅见于思南府的古代桥梁建筑形式，现有遗存除德江县楠杆土家族乡“结龙桥”和“镇风桥”外，还有思南县张家寨镇桥岩村“桥岩凉桥”、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中界乡新齐村“新齐风雨桥”，仅此而已。桥梁以单跨简支木梁为主体，木梁下利用一组八字形斜撑增加桥梁弹性支承，成为八字撑架结构。桥梁的八字撑架，虽不如伸臂木梁那样可大步提高桥梁净跨，但能改善较长简支木梁的受力条件。贵州现存八字撑架木梁桥中，以楠杆结龙桥的跨度为最大，以镇风桥整体保存最为完整。文

（作者单位：贵州省文物保护研究中心）

唐玄宗开元投龙简 曾藏身安顺记趣

文 / 图 杜应国

近读庄严先生的《唐玄宗投紫盖洞简记》一文（收庄著《山堂清话》），内中提到与安顺有关的一件趣事：抗战时期，在安顺守护藏存于华严洞的故宫文物时，曾应老同学也是南京古物保存所主任的舒楚石之请，受托代管过一批南京古物保存所的青铜器，其中有件该所珍藏的古物“唐玄宗投紫盖洞铜简”，引起庄严先生的兴趣，乃请同事郑世文制成拓片数份。其后，1944年因“黔南事变”，日军攻陷独山，藏于华严洞的故宫文物奉命紧急转移至四川巴县，代管的南京古物保存所五箱青铜器则奉教育部令移交给安顺民众教育馆接收。不想，几十年后，已身为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庄严先生，因收到马鸿逵夫人刘慕侠捐给博物院的两件文物（唐玄宗、宋真宗的祭泰山玉册），顿使他忆起当年在安顺见过的那枚唐玄宗的投龙简来，于是从筐中翻出当年保存的拓片。据拓片尺寸，该筒高36厘米，宽11.3厘米，厚0.8厘米；正面、背面均铸有文字，楷书。正面文字有五行，每行十九字，文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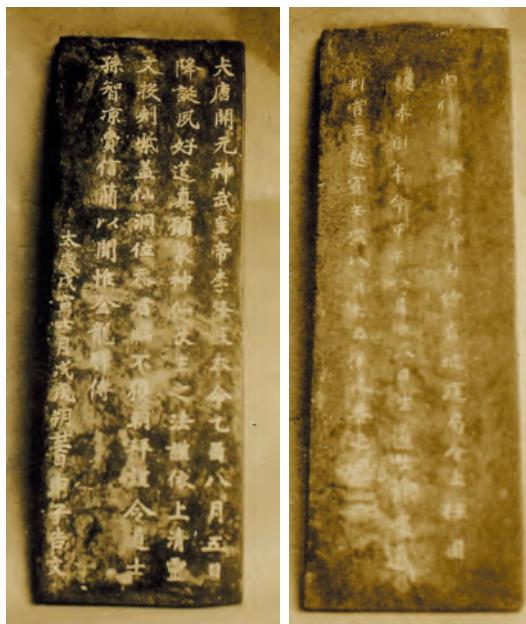
大唐开元神武皇帝李隆基，本命乙酉，八月五日降诞。夙好道真，愿蒙神仙长生之法。谨依上清灵文，投刺紫盖仙洞。位忝君临，不获朝拜。谨令道士孙智凉，黄信简以

闻，惟金龙驿传。太岁戊寅六月戊戌朔廿七日甲子告文。

背面三行，行字不齐。其文为：

内使朝散大夫行内侍省掖庭局令上柱国张奉国，本命甲午八月十八日生。道士涂处道。判官王越宾，壬寅八月七日。僭人秦延恩。

古代社会，自秦始皇泰山封禅之后，历代帝王多有赴名山封禅之举。封禅所用之文称“玉册”，多为石刻，前述唐玄宗、宋真宗禅祭泰山玉册即为石刻。除封禅外，有的帝王还有向神灵求愿祈福之举，用的则是



1952年在安顺展出的唐玄宗李隆基开元投龙简正面。文字清晰、端正，历历在目。

唐玄宗开元投龙简背面。

一种道教仪式，称为“投龙”。祈愿者将其恳请神灵保佑的心愿刻在一枚铜简上，谓之“金龙”，亦称“投龙简”，然后再派人将之带到一些名山大川投放，以上达神灵，此即所谓的“金龙驿传”。奉命投放之地多为名山大川的某个溪涧、沟洞，抑或深潭乃至乱石丛中等等。

李隆基的这枚“投龙简”，投放地为“紫盖仙洞”。据《南岳志》载，紫盖洞又名水帘洞，古称朱陵洞，为著名的“南岳四绝”之一。相传此洞为朱陵大帝居住之地，故道家将之视为三十六小洞天的第三洞天，即所谓朱陵太虚小有之天，简称“朱陵洞天”。传说远古之时，大禹治水，曾到南岳求金简玉书，并在朱陵洞天举行祭祀仪式。这或许正是唐玄宗青眼有加，选中此地“投龙”的原因。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唐玄宗李隆基派遣内侍张奉国带道士孙智凉等人，专程来到南岳朱陵洞投放金龙，祈求长生不老。一千多年后，此简在衡山县被发现，李元度的《南岳志》曾据此记载了此事，并将简上正、反两面文字全部录入，玄宗此举始为后人所知，有人并因此在其投龙之处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

北向独不朝，泻千尺银河，
溅玉飞珠，相望源头来紫盖；
西巡应有恨，弃九重金阙，
投龙续命，空寻洞穴向朱陵。

但唐玄宗的这枚“投龙简”，此后即不知所踪，再未现身。因此，有关此物后来的经历——为何人所藏？又因何而归之于南京古物保存所等等，皆鲜为人知。更何况即使收归南京古物保存所后，此简也从未公开亮

过相。直到1952年，这枚销声匿迹百年有余的珍贵文物，才在边城安顺首次悄然露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当年庄严等人奉令移交给安顺民众教育馆的那一批青铜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为新的地方政府所接收。因系价值不菲的国家文物，地方政府随即将之上报给当时的政务院。1952年，北京有关方面派员赴安顺接管这批古物。离安之前，应地方政府所请，特意在安顺南街店员工会（后为安顺图书馆）举办了一次公开展览，五箱青铜器共118件悉数亮相，其中就包括有这枚唐玄宗投紫盖洞（朱陵洞）的“金龙”铜简。这次展出，时间虽为一周，但毕竟安顺地方太小，又偏居西南一隅，再加也未见有何媒体报道，因此外界多无人知晓，更遑论远在台湾的庄严先生了。故而几十年后，当他重睹当年在安顺留下的拓片，想起这枚难得一见的投龙简，并挥笔写下《唐玄宗投紫盖洞简记》一文时，犹不知其文其事已载入《南岳志》中（两岸睽违，许多地方史志在台难觅），更不知此简曾在安顺公开亮相。但对其文物价值，庄严先生在文中仍给予了极高评价，称之为“传世之唯一孤本”。就当时（1971年）而言，此语毫不为过。但这“唯一”之说，随着1982年武则天的另一枚投龙简在中岳嵩山被一位采药老人发现而打破。传此前曾经发现后又失传的吴越王投龙简为银质，武则天此简却是更罕见的金简，再加其中国历史上唯一女皇的特殊身份，因此，无论就等级还是就价值而言，都远远高于唐玄宗投龙简。话虽如此，该简自身的价值却并未因此而被取代或消抹。武则天投龙简的刻文为：“上言：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太岁庚子七月庚子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她祈求的是神灵帮助去除自己的罪名，而唐玄宗祈求的却是痴心妄想的“长生不老”，可见这位皇帝对仙道的痴迷已到了何等地步。

庄严先生在台北
（庄灵提供）



有趣的是，庄严先生当年请人制作的数份拓片，并非仅为一己之私藏，而是很有可能将之分赠给极少数亲近的师友。在近年整理出版的《马衡日记附诗钞》中，就收有一首题为《题唐玄宗告紫盖洞铜简墨本》的古体诗，诗题既点明为“铜简墨本”，显非实物。而该简就目前所知，也仅有庄严先生委人制作拓片之举。更兼二人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有师生之谊，庄严尝以“叔平师”称对马衡先生，而马衡又是著名的金石学家，因此将该简拓片作为雅玩，赠给老师分享是极有可能的事。其诗云：

有唐开元廿六年，六月甲子岁戊寅。
明皇时年五十四，两京来往倦风尘。
军国大计委牛李，深居习静好道真。
欲求神仙长生术，覆撤甘循汉与秦。
洞天福地遍祠祷，金龙信简空沉沦。
侈言贤士野无余，府兵上下停鱼书。
更以蕃将代汉将，畿辅藩篱尽撤除。
无愁天子等燕雀，不知宫阙将丘墟。
况复纵情娱声色，绝代佳人倾人国。
一朝鞶鼓动渔阳，师出有名清君侧。
马嵬玉陨权相诛，持平敢谓罪斯得。
履霜坚冰一自来，倦勤误国缘多惑。
简文一百卅七言，视作爱书宁过刻。

这也算是唐玄宗投龙简引出的一桩趣事吧。

不过，围绕此简发生的故事仍未结束。

且说转眼就到了2011年，国际道教论坛将于9月下旬在南岳举行。参与筹备此次大会的衡山市南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卫国，极力想为这次国际道教盛会增添更多的实物史料。他通过查阅《南岳志》得知有关唐玄宗开元投龙的记载，一时竟突发奇想：若能找到这枚可直接映证帝王与道教和南岳之间渊源关系的实物，必能为即将开幕的国际道教论坛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于是大感振奋，乃四处查阅资料和打探有关信息。后在与一位网友聊天时意外得知，此简落户在贵州省博物馆，惊喜之余，随即踏上寻宝之旅。如其文中所言：“九月初，笔者独行湘

黔，踏上‘寻宝之路’。几经周折，终于在贵州寻找到‘南岳唐龙告文’这一传世国宝。9月16日，带文物局及电视台相关人员再次赶到贵州，拍摄了实物照片并摄录了电视场景。”（曾卫国《唐玄宗南岳投龙国宝现贵州》）

就这样，已藏身贵州七十多年的唐玄宗开元投龙简，终于揭开其神秘面纱，首次以影像形式在国际道教论坛现身，向世人展示出其“通体苍翠如玉”的真实面容。一时间，媒体纷纷以“惊世国宝——唐玄宗投龙铜简现身南岳”为题，进行了广泛报道。曾卫国后来也特意撰写了《唐玄宗南岳投龙国宝现贵州》一文，对其寻访过程进行了详细叙述。不过，文中在谈到这枚珍贵文物为何会流落贵州时，仍然一本旧说，存在很大的漏洞。作者说他带着此一疑问专访了贵州省博物馆的有关人员，得到的回答是抗战时期藏于安顺华严洞的故宫文物。“为了感谢贵州文物工作者，抗战胜利后，部分文物有意留在贵州安顺未搬回南京，此简与明洪武钞版等都是故宫留赠下来的。1953年，新中国贵州有了自己的博物馆，该简由贵州省安顺县文教科拨交给贵州省博物馆。”此说显然不确。包括唐玄宗投龙简在内的这批青铜器的所属及其得以留在贵州的原因，已如前述。问题在于，1952年在安顺的展出结束之后，按理这批青铜器已被运往北京，何以其中的几件会留在贵州？而且贵州省博物馆成立于1953年，1952年运走的文物为何会有部分归其所有？对此，笔者也不妨作个大胆的推测：悬想当年这批青铜器运至贵阳后，贵州省的有关领导不可能不知晓其事，而此时又恰逢贵州省博物馆正在拟议筹建之中，因此会不会由某些省领导出面交涉，要求留下几件作为贵州建馆的基础？如此顺理成章，才有了此简和大明印钞版等几件文物留黔之事？当然，这只是猜测之言，具体情况如何，尚须进一步的考证和有关资料的发掘、发现。姑聊备一说，权作引玉之砖。

（作者单位：安顺职业技术学院）

苟江红军空坟

文 / 图 周开德

在播州区苟江镇桥头村文学组破浪桥头，有一座红军坟，当地叫红军空坟。为什么叫红军空坟呢？

原来，中央红军于1935年两次经过苟江。第一次有二十多个红军路经桥头村，其中的两个红军在堰角讨食，当他们在何九州家讨食时杀猪匠何子银（九州之弟）手毒，想杀之取枪，但九州不准，让两个红军吃饭后赶路，行至现同心粮站门前坎下，又被保长钟质彬缴枪并欲杀之，钟母力保不准滥杀

无辜。于是钟带两红军到苟江后将其杀害。第二次是有一个落伍的红军（康同志）经过桥头河沟上游被保长朱质彬夺枪后杀死于河沙坝（现赵朝鹏住房处），正保长当赵银舟比较开明外出返家听说后非常惊骇，立即命自己的儿子赵永太设法埋葬。赵永太顺着河流找到尸体后，引尸过了木桥，让尸体漂到团窝兰田北坎回水沱处隐藏后即返回家，等到天黑后无人知晓再去掩埋。等到去埋葬时，尸体已经被水冲走了。解放后，群众为



纪念红军，遂在桥头村文丰原桥头文昌阁遗址上设假塚一个，竖碑铭以记之。1966年7月1日建成，竖碑顶上为一颗五星。碑文从右至左竖写：“于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路过遵义在桥头遭遇土匪不幸壮烈牺牲 生的伟大 死的光荣 康同志烈士之墓”。落款为“苟江公社四清工作队 前进大队全体社员 敬立 一九六六年七月一日”。立红军烈士康同志碑还有些动人故事。上面提到的赵银舟名赵子良，号银舟。当时是该保的正保长。此人是开明士绅，对当地群众也比较好。所以红军在此遇难，他就叫他的儿子赵永太设法将红军遗体埋葬。1966年“四清”时，知道赵子良父子埋葬过红军，苟江公社就命赵永太掘红军尸骨，自然找不到。公社就命赵永太找不到红军尸骨就要为红军烈士磨一口碑。赵永太就用三水锅的锅铁打磨碑石。五十多年后我们还能看出用了很多功夫打磨得非常精细。2005年，遵义县民政局、苟江镇政府在白岩村棺山松林内（双河小学对面100米处）新建一红军烈士陵园，内建有红军烈士纪念华表碑一座。陵园建好后，想把桥头红军空坟移至棺山松林红军陵园内。当地村民却坚决不准移，他们认为红军烈士是保佑他们的神。红军空坟修好以后，他们事事顺利，平平安安，坚决不允许移坟。赵永太的孙子，1962年出生的赵家齐很动感情地说，自从埋了这个红军坟以后，我们这里顺遂得很，周围落雪弹子（冰雹）我们这的一颗都不落。当地村民，对红军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后来，经过再三协商，当地村民只允许取走红军空坟的一撮墓土，放到陵园内保存。红军空坟建起五十多年来，一直有群众去祭奠。清明，有人去挂青。正月十四，有人去亮灯、敬献香烛纸钱。红军空坟已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地名。

就在红军空坟不远处，桥头村水晶坝组，是当年红军长征息脚的地方。遵义县食品公司退休职工范志伦，小时候听老人们讲红军在老家桥头过路、息脚、百姓为他们送粮送饭的故事，一直想为红军做点事。2019年，这位1937年农历7月17日出生的老人，个人出资，请人写文字，找石匠刻字，做了一处摩崖石刻，铭记红军的事迹。摩崖为“水晶坝红军长征息脚处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红军长征从乌江到水晶坝在此处息脚，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政策和工农红军的主要任务，并买了当地李姓的干包谷来充饥后继续行军。红军精神流传万代 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刻”。用油漆描红，非常醒目。摩崖刻在路边，过路行人都可看见。

同样在桥头村，相隔几百米，一个文学组，一个水晶坝组，朴素的村民们，把红军记了几十年，一代一代，代代相传。文

（作者单位：播州区关工委）



平坝万华禅院与“高峰八景”

文 / 胡应铃

一、历史悠久的万华禅院

高峰山位于平坝县县城东17千米的马场镇，距安顺市城区59千米，距贵阳49千米，是西南著名的佛教圣地。

高峰山原名谷陇山，占地4.5平方千米，山为环形，四壁若城，山上峰峦9座，如屏环合，峰林中部为一片凹地，约40余亩。主体建筑万华禅院坐落于凹地之中，占地20余亩。其左有面壁峰、玉屏峰、宝塔峰，右面有福寿峰、天门峰、莲花峰，群峰拱拥，峰峰入云。

万华禅院是一组布局严谨、气势宏大、造工精细的古建筑群。寺院按中轴线对称布局，层层递进。建有山门、山门殿、接引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楼、闭关室等，殿宇房舍达46间。山门用青石砌成，上嵌清代翰林院院士聂延祐题写的“万华禅院”石匾。大雄宝殿高大宽敞，金碧辉煌，有民国时期贵州省主席毛光翔游览高峰山时亲笔题写的“祇园精舍”黑底金字匾额悬挂于大佛殿前。院内古木花草，清泉碧潭，小桥石栏，迴廊曲径，乃佛门净土，清新幽雅。有吴旦《高峰山花月》一首

花时难定是山晴，快事无如此夜清。
新水漫流红树去，香云翻碍碧霄明。

蛙蹲浅草疑经画，鸟宿深枝懒报更。

来往小亭千遍足，不劳秉烛作宵行。

殿内供奉佛像26尊，雕塑工艺精湛，造型逼真。寺藏《大藏经》1部、佛经6部、了尘和尚遗著多卷、大小玉佛6尊、铜佛3尊、舍利子6粒、建文皇帝像1幅、洪武三年置地产碑及历代碑刻10余方等。

万华禅院始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秀峰和尚所建。山上有碑文载：“江西高邮籍僧秀峰，于洪武初年游至平坝谷陇山，观此处幽雅胜境，千山重叠，万峰围绕，人杰地灵，山运当兴，故与苦尼刘都姑买得谷陇山一座，僧侣建立茅庵，更名高峰山，随后修成佛寺5间。自此，高峰山始闻晨钟暮鼓之声。”建寺之后，多有僧人来此结茅，香火鼎盛，信士云集。永乐四年(1406)秀峰和尚圆寂，其大弟子本体接任住持。本体精通儒学、佛学，高立法幢，大开戒坛，兴盛之状不减秀峰之时。

相传明建文帝朱允炆于建文四年(1402)六月离宫避乱，遁迹西南，化装成和尚云游各地。永乐十七年(1419)至高峰山，与住持本体投缘，本体为建文帝修禅台。

建文帝留住期间，在寺侧半山巨崖上书“西来面壁”四字，又在寺前植银杏两株，后成为高峰山八景之“西来面壁”及

“古柏参天”二景。建文逊帝为僧，隐居深山，感慨之余，以诗述怀：“寥落江湖数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草吞声哭未休”（见《贵州通志》）。

乾隆年间安顺进士陈凤仪游高峰山瞻仰古禅台曾留诗一首：

金川门启帝阁空，天下云游寄梵丛。
迹困缁衣防病虎，山藏古寺卧潜龙。
不堪回首六官火，最是伤心十族忠。
怪得文帝无觅处，托词犹说访三丰。

明代末期，战祸殃及佛门，殿宇损毁，寺僧离去无闻。

清顺治八年(1651)，四川峨嵋山僧自然到高峰山主持兴建寺院，“四方善信，闻风景从”，“越明年而殿角廊庑金碧焕然，乃开堂著律，大辟泥蓝，植柏树数千株……”（见卢大济撰《高峰山碑记》。）数年间高峰山蔚然兴起，宗风大振，时与黔灵（贵阳黔灵山）竞秀，同为黔中弘扬佛法之两大名山，为十方衲子游黔参拜之圣地。观山中所建亡僧碑塔，雍正乾隆时期数目众多，可见当时之规模。

咸丰、同治年间，贵州不断发生民变，战祸连连，持续数年之久。其时，黔中一带名山古寺均遭劫难。除史籍有载，今查各山寺历史，大多在咸丰、同治年间曾遭浩劫，或付之一炬，或掠抢一空，多数寺毁僧离，不复存在。高峰山也未能幸免，殿宇被焚三日不灭，化为灰烬，寺中文物被抢劫一空，僧人逃散，所有田产亦被豪强侵吞，从此香火湮灭达数十年之久。至光绪十七年(1891)安平县令赵文炜察视四乡，悯惜名山，函约贵筑县名僧了尘和尚主持兴建。（了尘，法名圆洲，持戒甚严，日仅一餐，曾东流日本求经。工诗文，著有《了尘文集》十卷，收录其所作诗词数千首）。数年后，了尘和尚约请空月、原知二位高僧到高峰山重振禅院，经数年勤苦，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山寺始复原貌，建成“万华禅院”屋宇46间，

有佛像40余尊，后又从日本请回《大藏经》一部。自此，“万华禅院”闻名遐迩，复与黔灵寺分场传教，继承佛陀，广结善缘。

民国三十一年(1942)因捐庙产兴学之风兴起，高峰山即创建“贵州佛学院”又称“西南佛学院”，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太虚法师任院长，求学者接踵而至，有青年学僧50余人，部分来自四川、云南。但当时正是抗战紧要关头，生存困难，佛学院维持到1946年秋，草草卒业。虽然短短几个年头，但由于学院教授均为学识渊博之佛教高僧，如民国时期高峰山寺住持范清、今贵州省佛教协会主席黔灵山弘福寺住持慧海等大师，学成弟子均成为当代佛学界知名高僧，分布于西南各大寺院，有的还远渡海外传经说法。“贵州佛学院”首开贵州兴办佛学之先河，为培养佛教人才、弘扬佛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尚有僧人耕食其间，勤理佛事。当时仍有寺僧40余人，均年过半百，在山上耕种为生，自食其力，生活甚是清苦。“文化大革命”中寺毁人去，原有景观多遭破坏，寺藏文物如“建文皇帝遗像”、数十卷经书等已不见踪迹。六百年古刹，从此销声匿迹。

1992年贵州省佛教协会会长慧海派法师觉锐到高峰山主持重修寺院，得到当地政府支持。经过数年努力，已修通1000多米上山公路，重建了大雄宝殿、经堂、藏经楼、闭关室、僧寮室，增建了地藏王菩萨塔，维修了各代寺僧塔林等。同时，种植树木，培育花草，自然生态逐渐恢复，今日高峰山又成为黔中颇具影响的佛教活动场所。

二、蔚为壮观的“高峰八景”

高峰山之为胜景，有自然赋予的壮丽景色，有佛家创造的历史文化，超凡脱俗，富有灵性。历代文人墨客留连高峰山，品味出“高峰八景”。

“独印把关”。步入山门，俨然一尊高

大韦驮佛像，佛像右侧矗立巨石一块，10尺见方，如天外飞来，独立山门，犹如一枚大印，沉重而庄严。迎面石壁上刻有“无欲为纲”四个大字，字体雄浑，笔法遒劲有力。

“古树参天”。院门两侧之两株银杏树(俗称白果树)，高10余丈，4人合抱，树干笔挺，直插云霄，故名。每至深秋，果实累累，可收银杏数百斤，善男信女皆视为圣果，食之吉祥，每取回家中赠长幼。此树相传为明建文帝亲手所植。古人有诗曰：“身归清净域，根者白云乡。有志撑霄汉，无心作栋梁。”惜“文化大革命”中被砍伐，树桩犹在。

“乌鸦早朝”。又称“群鸦早朝”。高峰山上树草繁茂，浓荫蔽日，百鸟翔集，莺啭鸟鸣。山中犹以乌鸦为甚，栖息在寺周，每当早出暮归，一齐高声鸣叫，声传殿宇，不绝于耳。相传建文帝住寺时，忆百官早朝三呼万岁之情景，百感交集，写诗一首曰：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团瓢。南来瘴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袞龙袍。百官此日知何处？唯有群鸦早晚朝。”1958年“大炼钢铁”及“消灭四害”等运动，树林被砍伐殆尽，鸟类作为“四害”也被捕杀绝迹，从此这一景观消失。近20余年来，退耕还林，加强绿化，高峰山自然生态逐渐恢复，鸟类也逐渐增多，但唯独不见乌鸦。

“平地烟霞”。寺前有一平坦洼地，呈圆形，四面峰峦叠翠，周围草木丛生，当旭日东升之时，常见云气喷涌团聚于地面之上，缕缕白云平地升起，飘浮于寺前，日照之际，云烟缭绕，灿烂夺目，身临其境，如履云际。前人诗曰：

烟霞生地底，楼阁出天中。
欲礼庄严相，高居兜率宫。

“怪石蟠龙”。寺侧玉徒关与平关之间古道之旁，重峦叠嶂，奇石峥嵘。密林深处一石，宽约丈余，上有石纹，形若游龙，盘旋腾跃；又有似石龙爬坡，隐现潜形，曲折蜿蜒，盘卧其上，昂头藏尾，仰卧静止，似

听诵经，俨如佛境守卫。

“玉屏夹道”。山寺前左行数百步，玉屏关路旁，奇峰耸立，斜插天际，层峦高峙。于岩畔之间青石峭壁，高10丈许，形似素屏，中有白色石壁，上刻“玉屏”二字，传为建文帝所书。以其有境可通，故名。道旁有石墩，游人至此，尚可少憩。古人有诗曰：

地间琅环境，天开白玉屏。
禅心如古镜，常照万年青。

“殿阁双流”。进入万华禅院，拾级而上，为古寺中殿。越中殿为大雄宝殿，殿后院天井中，于法堂之下有两股清泉自地下潺潺流出，交叉流入殿前池中。池呈半月形，上有石桥，形若泮池；池水澄碧，四季如镜，清冽甘甜，不盈不竭，取水煮茶，清香四溢。僧人常以此泉水待客，世人视为圣泉，每至寺内，必求饮之。有诗曰：

熟挽曹溪水，分从殿角流。
不嫌尘世浊，且上此峰头。

“西来面壁”。寺后半山腰中有石壁高数丈，如刀劈斧削，自然天成，松竹围绕，翠色如烟。壁上镌刻有“西来面壁”四个大字，字大如斗，古朴苍劲，相传为建文皇帝所书。两旁刻有对联，为清康熙翰林院庶吉士周渔璜所书，联云：

九年烹炼，功修不减西来真面目；
片刻徘徊，迤逦屹然东峙护塔铭。

石壁下有本体和尚为建文帝所建石砌禅台，台外3座石塔，为隆庆年间3位和尚之塔。

“西来面壁”为佛教故事，相传达摩祖师由印度来华，会梁武帝，言不契机，遂到嵩山少林寺打坐，面壁九年。建文帝禅坐于此，似殊途而同归，故书“西来而壁”，世人深信无疑。有诗曰：

凌云瞻此日，石壁畅当年。
永乐今安在？篆名满大千。

高峰山乃黔中有名的佛地灵山，长年香火旺盛，每至农历二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举行的高峰山庙会，信徒蜂拥，蔚为壮观。文

（作者单位：安顺市文化和旅游局）

黄平“两州”三十二景

文 / 图 廖尚刚

黔东南黄平县是一个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十分厚重的多民族聚居县之一，早在元中统元年（1260）就设黄平府，属播州辖治，隶四川行省管理区域，史称：“黄平在黔为文物声名之地……”仅以旧州和新州（县城）两地，景观景点就达32处之多。令人感慨的是在这32个景点中，旧州和新州各占16处，这种巧合之处让人在品读上，如身临其境，悬念万分，然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变迁和人为建设等因素，这些景点仍有大部分尚存完好，但也有的已消失或逐年惨遭“涂鸦”。笔者通过翻阅相关历史文献后，现搜集出明清时期黄平县旧州和新州两地各16处名景，让我们回到历史去领略这些大自然和古代匠人们赏赐的神工杰作。

一、旧州十六景

1.鼓台仙景

“鼓台仙景”，位于旧州城南2.5公里。旧志载曰：“高数千，险仄处，维以铁垣，登者挽之乃上。”可见山势之陡峭。鼓台山下为纵横交错的深涧，多奇花异木，山麓的岩穴长年涌出山泉，登台人们沿途捧饮，倍感甘香异常。上得台顶，旧州万亩大坝尽收眼底，即使心理有压抑的人来到这

里，也会心旷神怡。难怪清代孙光启（字仲熊）有《台仙景》诗云：

突岬危峦涌出然，空中楼阁接重元；
红云盖接通明殿，银汉流来卓锡泉；
歌笑扪萝惊野鹿，遨游陟顶挟飞仙；
传闻佳方飘翩集，抚崔吹笙万仞巅。

“文革”期间，“鼓台仙景”横遭浩劫。改革开放后，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如今在当地善男信女的筹建下，鼓台山上的宗教设施在不断完善，香火已逐渐恢复过去的旺盛之状。

2.铜顶铁峰

“铜顶铁峰”与鼓台山对峙，高锐如笔。山腰的崖壁多处赤如铜色。神话传把此山与天并连，古代五丁^[1]在射日时，以铜钉钉于崖壁上而形成。另传，过去每逢旱灾，当地的官民还到此杀牲祈雨，天公即刻灵应，普降甘霖。虽为神话，但这里山势高耸入云，实古今一方山川之秀。清人陈于宸（字庚虞，知州）有《铜顶铁峰》诗云：

突出奇峰似笔形，尖头插汉撼奎星；
管昂天外临苍点，颖落江心蘸洞庭；
何客借书苍吉字，无人掇草太元经；
文峰八面铜钉锐，博得封侯是五丁。

3.晴岚拥郭

“晴岚拥郭”，位于旧州城东2.5公里处，连绵的山脉长达10余公里，过去被旧州人供为“城东护山”。旧志载曰：绵亘十余里，岚光四时不散。城市村庐，曾在空举浮兰之内。难怪清代诗人李通（字彻明）至此巡游时，对这里的山气所吸引，于是就写下《七里晴》的诗句：

七里峰峰晓露涵，迎晖楼上座晴岚；
翠烟作带山腰束，碧雾如虹日影含；
飞入海涛成蜃阁，迎来朝气润书龕；
须臾三足天中布，野眺悠悠兴正耽。

4.白鹭盈洲

“白鹭盈洲”，位于旧州城北1公里的白纸桥村纸坊潭沙洲。原舞阳河水经此地东流而下沅江，1935年因山洪摧毁老里坝后，河水才改道中桥河，如今“白鹭盈洲”已被村寨和农田淹埋。过去这里为舞阳河上游的一片滩涂，每天千百只白鹭集散于此捉鱼捕虾，鸟声齐鸣，翔阵回旋，形成了一道雪亮的景观。清代陈正心（字知先官博士）给后人留下的《沙洲鹭集》千古绝诗：

紫霭山山衬夕阳，春锄敛翼泊溪旁；
鸿归错认千门雪，鸥过咸惊六月霜；
玉瞻瓶前横瘦影，芦花洲上舞霓裳；
携樽对饮何须烛，胜尔崑岩袭夜光。

5.宜娘营垒

“宜娘营垒”，位于旧州城南5公里的山邦农场山上，营垒遗址上可容万人。相传宋时杨再兴之妹杨宜娘为防御蒙古军队入侵，并屯兵于此保护乐源郡（今旧州）。如今营垒遗址尚存。清代郭崇爵（字仰台）有《宜娘营垒》诗云：

南山土阜接云平，野史相传女将营；
旧骇风雪安虎豹，今看壁垒穴鼯生；
岚光尚幻旌旗影，溪响犹疑鼓角声；
二百年来文教洽，囊弓囊矢控名城。

6.梯子巖崖

“梯子巖崖”，位于旧地重游城南3公里的地方，山上路径蜿蜒曲折，山顶高逼云端，远远望去，上山游人若步入青天一般。清代张问德（字惺初）有《梯子崖》诗云：

悬崖峭壁势攒峋，鬼斧神工一线宽；
曲磴下惊无世界，浮云高拟作澜干；
从来不信幽关险，过此何忧蜀道难；
百折千回天路近，尘寰杖底任漫观。

7.宝相寺

宝相寺为旧州一带最早的古刹，建于唐朝时期，后毁于明朝平播^[2]年代，右副都御史贵州巡抚郭子章重拨银两修建，宝相寺当年为旧州最宏伟的建筑壮，香火繁旺，现已毁。过去，寺内古钟声传数里。清人陈文正有《宝相寺》诗云：

寺自播平复，名仍宝相归；
钟声传近郭，池景静朝晖；
初至花如侍，暂停鸟不飞；
青螺留古碣，玉蕴早通微。

8.白岩仙洞

“白岩仙洞”，位于旧州城西10公里的上塘白岩寨。洞内深邃复杂，夏凉冬温，钟乳石千形百态，宛然仙景。明代高任重著有《白岩仙洞》诗云：

白云常锁洞门阴，丹灶烟硝岁月深；
仙子不来灵液在，冬能作雪夏为霖。

新州
“草庭书院”摩崖



9.翁播龙潭

“翁播龙潭”，在“城北5公里的的龙灯堡，在旧州去一碗水乡途中，现潭水因舞阳河水转移和河床的升高，已不复存在。过去龙潭两岸壁立，每逢大旱之年，尽管上下水道皆涸，然此潭渊涵如故。明翰巡抚郭子章于潭前修有庙祠，供百姓求雨。明代高任重对此还专门写有《翁播龙潭》的诗句，就是对当时翁播龙潭的写照。

灵物蜿蜒蟠处深，兴云作雾昼阴阴；
须知变化原未测，潭水沉沉自古今。

10.宝珠古刹

“宝珠古刹”即“岑卡寺”，位于旧州城西4公里的岑坡（今为勤坡）。古刹过去山高路曲，古树扶疏。相传岑卡寺始建于唐宋，后毁于1960年代的“文革”运动。旧志赞曰：“境内奇观无有先于此者。”清人李占春（字少白）有《珠刹》诗云：

琪花瑶草衬琉璃，古刹丹青映水湄；
宝藏三车藏贝叶，珠光五色见摩尼；
上方钟击哆罗韵，半夜禅参法导师；
安得尘缘都解脱，频来此地啖松脂。

11.马苑桃花

马苑位于旧州以南3公里的鼓台山下，地势平旷，过去为州民放牧园地。境内水曲而清澈，溪中各种色彩卵石累累，映水鲜妍，如烂熳桃花，落英荡漾。为打造马苑和自然景观，早在明朝时期，鼓台山僧人还下山于河溪两岸种植桃树，使溪中的桃石在春季与桃花相映，形成了“岸上桃花溪内结”的胜景，并被时任黄平州牧的杨凤翥名之为“小桃源”。难怪清《黄平州志》对马苑景点载曰：“波际经其地者，不啻人间世，误入渔郎也。”对此，清代陈良能（字心猷）还专有《马苑桃花》诗云：

云封古壁透溪沙，更有山桃二月花；
入睫忽惊矚谷采，举头犹讶赤城霞；
渔郎扣石仙扃闭，游客流觞野性恰；
不独武陵春色媚，此中依旧采桑麻。

可惜昔日的“马苑桃花”胜景因后来山上石漠化的产生，造成生态的改变，使溪水不断涸缩，人们再也看不到“小桃源”的原貌了。

12.陡岩赤壁

“陡岩赤壁”，位于现在旧州老里坝沿河之上300米处，现景犹存，两岸削壁，石色呈丹霞状。旧志载道：间以丹枫碧草，望之蔚然，泛舟其下者，率流连不欲去。”清代张拱北（字子美）有《陡岩赤壁》诗云：

赤壁枫林两岸秋，正堪载酒荡轻舟；
星稀月朗雄安在，衣锦裳无梦已收；
遐举不须穷海岳，浪过聊可狎凫鸥；
陡岩不减临臯胜，夜醉金风泊蓼洲。

13.马踪峻岭

“马踪峻岭”，位于旧州城西北10公里的松洞至红梅及波洞一带连绵山岭。山岭形如飞马，腰间有阜如鞍，旧设岩关于此。李占春^[3]有《马踪峻岭》诗赞云：

形势盘旋岩驾辔，神驹蹀躞万峰连；
踪批雪嶺苍松老，足踏云根怪石坚；
控勒不加闲菟袅，斗升难攀绝崩蹇；
遥看隐见河图影，疑在羲皇未画前。

14.石堑游龙

“石堑游龙”，位于旧州城北1公里的河中，即现在白纸桥村三拱桥一带。过去，河中的石堑犹如一条栩栩如生苍龙横躺在舞阳河上游弋，被当地百姓称为旧州水口之门关。清人张居乾（字正之）有《石龙水口》诗云：

采源不独峙千峰，更喜波心控石龙；
力障狂澜横一柱，金春碧落巩崇墉；
东流江汉源何远，西注彭涪势自雄；
水秀山明称独胜，龙饶海浚足提封。

15.两岔渔歌

“两岔渔歌”，位于旧州城西5公里的

两岔河水库，波洞河与上塘水系汇流于此。在古代，这里汪洋弥漫，鱼虾富足，两岸居民均捕鱼为业，因此渔歌之声朝夕不绝。清初李占春有《两岔渔歌》诗云：

两水潏回抱远岑，渔舟随浪任浮沉；
歌声竞唱三更月，网影齐铺一壑阴；
蓑笠治生饶隐趣，风波谋食亦惊心；
道人不禁江湖想，往往被衣泽畔吟。

16.万坳占侯

“万坳占侯”，位于旧州城北勤坡1130多米的山顶，即现在的万营山。明朝时期，黔国公沐英总兵南党屯兵十万于此。屯兵期间，军士日食操练和布防，使场地沟壑交错。由于地理位置险要，长年烟雨和晴云交集，故又名“万坳阴晴”。李占春有《万坳阴晴》诗云：

山形锦亘势纵横，开国英雄细抑营；
累峰瀑泉悬露布，层崖古桧挂风旌；
结成密雾知将雨，散尽浮云喜欲晴；
地利天时都占却，年来谁复事南征。

二、新州十六景

1.榜山凝秀

“榜山凝秀”，位于新州（今黄平县城）北1公里许的架梁坡下的马家岩，崖壁呈白岩状，高200余米，崖间钟乳石自然凝结为大士像，身形与莲座依稀可辨。为鼓励乡人勤学上进，清王耘^[4]于峭壁上题“中”字摩崖大书，以励志功名。元岩上当不可名状。

榜山乃黄平城古今自然大景之一，明景泰五年（1454年）甲戌科进士周瑛（曾官广西布政使）就撰有《榜山凝秀》的诗句：

苍龙山势抱孤城，峭壁平平类削成；
雨暗苔痕疑墨古，月移云窦讶文生；
前临泮水千寻碧，下瞰江流一派清；
为变乾坤多秀气，丹梯飞上自题名。

2.带水环流

“带水环流”，即现新州城之北门河。

旧志载：“溪水自南来，经折桂桥，汇仁里水，过西门，绕北门，旋折而东，回环如带。”明代朱定元（黄平人，官山东巡抚）有《带水环流》诗云：

宛转清泉绕洞河，通江入渐自盈科；
环溪鸥鹭飞腾早，曲渚渔龙变化多；
野波云横山有色，芳堤风静水无波；
一弯碧浪围青嶂，月岸时闻孺子歌。

3.东阁梅开

“东阁梅开”，位于新州城东门后山，山是有五座耸出的山峰，形若梅花绽放。《黄平州志·艺文志》有文曰：“积雪未消，莹然在望；无烦策蹇扶筇，恍若暗香浮动。”清代胡同寅有《梅岫春登》诗曰：

几多春色到梅花，灌木声中鸟语哗；
翠柳依依弥野岸，锦桃灼灼偏溪沙；
登临举酒情编剧，拈韵分题兴转发；
醉后啸歌天地小，不妨潦倒接离斜。

4.南楼春晓

“南楼春晓”，位于新州城南山顶，高20米许，为全城之巅。过去楼房顶长着茂盛的茅草，冬不枯死，春至更荣，百姓认为是一处有灵气的地方，因此人们喜欢至此登楼，特别是春节要把第一个捷足者视为获得灵气的人。周瑛有《南楼春晓》诗曰：

百尺危楼倚碧霄，登临佳景值春潮；
桃花点点飞红雨，柳树依依锁画桥；
一水护田烟浪绕，四山耸翠雪痕消；
远听牧笛间渔唱，尽是康衢击壤谣。

5.云崖仙岛

“云崖仙岛”，即现在的“飞云崖”，位于县城东10公里，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贵州通志》称其“诡异玲珑，为黔中第一境。”近百年来，文客骚人咏赞“飞云崖”的诗文很多，仅《黄平州志》记载的就多达百余首。下仅录明代黔东南第一进士周瑛的《东坡仙岛》诗首以鉴，诗文如下：

层峦叠障耸琼楼，仿佛三山东海头；
水泛碧桃流涧壑，烟笼绿柳锁汀洲；
祥光隐隐陀头起，紫气阴阴洞口浮；
白鹤云翥栖自古，苍苔仙迹旧遨游。

6.玉峡飞虹

“玉峡飞虹”，位于新州城东6公里西南侧，双崖陡峭，一水中通，飞瀑破空直泻而下。崖间横架二桥为径，水色山光，日影炫耀。明代朱定元有《玉峡飞虹》诗曰：

汨汨清泉一经通，碧波深处隐长虹；
涧云生白常疑雨，野树排青不断风；
五夜鸟明因月上，四时山翠落江中；

7.宝塔凌霄

“宝塔凌霄”，位于黄平县五里墩山上，为东流一柱，回澜荡漾，云雁翔翔，若蘸清波而书碧落，为新州胜概。过去人们在此修建宝塔，主要是从风水学上来慰藉官民思想和意识，认为可以镇邪庇荫。于是在明清时期，每天到宝塔朝拜的信士都络绎不绝。后来塔体年久失修，早已损毁。

8.龙潭布雨

“龙潭布雨”，位于县城西南龙洞塘之下。《黄平州志》载：“州西里有潭，深不可测，龙潜其中，即龙渊也。潭云初起，山雨欲来，不崇朝而遍布，有祈祷之无不相应也。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信然。旧名曰：‘龙渊灵异’。新州以前的‘龙渊书院’由此渊而得名，现址已不存。明代周瑛有《龙渊灵异》诗曰：

古洞深沉别有天，水云深处老龙眠；
为灵能应四时祷，分脉常沾万顷田；
吞吐烟霞岩空里，倒悬星斗石桥边；
箇中风景应难识，异草奇花不记年。

9.炉山瑞拱

“炉山瑞拱”，位于新州城南10公里的冷屏山顶。《黄平州志》载：“炉山高入云表，端正方崖，圣宫前案也。烟雾常见其

巖缥缈，氤氲晴既特佳独石肤之奇，雨中尤胜。旧名‘炉山烟雨’。”周瑛对此有《炉山烟雨》诗云：

炉峰怪奇自天成，非艺沉枵得此名；
带水含烟疑变幻，远波近淡卜晴阴；
山腰漠漠横苍翠，水面濛濛照浅清；
绝顶方塘灵莫测，为鱼为物若多情。

10.沙镜空明

“沙镜空明”，位于今天的颐景园之地，旧志载：“循北门河下流三里有园洲焉”沙莹若镜，积水空明，日色由高山倒影，烟树迷离，鸟语清幽。虽盛夏经之，几忘酷暑，若夜游然。旧名‘沙洲夜月清’”。清代朱定元^[5]有《沙溪夜月》诗曰：

一轮皎洁静无声，引入清溪鸟篆平；
桂魄彩月沙一渚，苔痕冷侵月三更；
烟笼雪岸连天碧，风扫银蟾照水明；
此际有人闲坐望，人间天上斗变清。

11.官渡安流

“官渡安流”，位于今重安镇铁索桥处。《黄平州志》载：“为滇黔孔道，水势宽平深静，柱石于两岸而穹其端。亘以巨索，自北而南，竖短桅于舟首，循索而渡，不用篙楫。輿者，骑者，担者，负者，杂沓河干，称三津焉。旧名‘安江待渡’。”明末周瑛有《安江待渡》诗曰：

新州“炉山瑞拱”



重安江色绿于萝，江艇催人急似梭；
风岭烟开曦叹出，霓旌风袅使轩过；
闲窥鹭步沙清浅，静听滴歌韵猗那；
更是四时饶景色，青山两岸白云多。

“安江待渡”遗址为现今的重安铁索桥处。清同治癸酉年（1874）修建铁索桥后，于桥面铺以木板，使人马过河之艰，才使天堑为通途。旧志将《官渡安流》归入新州十六景内。

12.虹桥普济

“虹桥普济”，即在新州北门河上之独孔石桥。《黄平州志》载：“城虽在众山中，而西北东三面复流环绕，平越（今福泉）、遵义诸邑及蜀中来者，俱由城（今旧州）达此，初颇病涉。朱中丞（即朱定元）捐资修桥，称永赖焉。从北山瞰之如虹飞渡城廊，市肆皆疑蓬阁矣。”新州北门河独拱石桥今仍保存完好，然未见前人有对此桥的咏赞。

13.北岭雄关

“北岭雄关”，位于新州城北3公里许的凉风坳下，当地人称为“杀人洞”。过去洞前刻有石人，取名“石人洞”，后被讹为“杀人洞”。此处过去兴隆卫（今新州）通往遵义的要塞，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有说是军队战斗时歼敌于此然，虚实难考。周瑛有《北岭雄关》诗云：

造物分明巧凿开，嶙峋高出白云隈；
西连蜀剑嗟同险，北并秦关怯远来；
夷泽惊从天外语，析声疑在日边回；
强功劲弩休经此，马车轰轰气自衰。

14.西坡叠嶂

“西坡叠嶂”，位于新州城西3公里，现称“望城坡”。峰峦绮交，或平或峭，列屏聚笏。每逢天色下雨前，山上香吐云雾；晴天来临，满山则刻露烟岚。下有巨泉沿麓岩穿洞而出，是历代养育新州城的主要生活源泉。泉眼一侧为清代周瑛讲学之所——

“草庭书院”，学堂早已无存，现仅留下“草庭书院”四个摩崖大字。

15.风岭来青

“风岭来青”为如今的重安江岸的金凤山，山势飞舞，插汉昂霄，如凤凰翔于千仞之上。隔江观望，山影倒映江中，碧波鳞照。在重安古镇登楼远眺，一片天外青葱之色。清代余兴贤有《风岭来青》诗曰：

风岭岩峣接绛霄，琳宫深处彩霞飘；
十洲不慕神仙景，一经频来士女朝；
林霭经风青不断，石岚过雨翠难消；
老来结得同心侣，共向山中采药苗。

16.灵崖挂瀑

“灵崖挂瀑”，位于黄平县城东飞云崖内。《黄平州志》载：“飞云层崖上有泉悬焉。振鹭上飞，白龙下饮，与金枝翠旗相为辉映，盖瀑虽供崖之胜而亦以助崖之奇，匡庐三瀑布不得专美也”。清王楚士《飞云崖八景诗》载有《灵崖瀑布》诗云：

颖是银河落九天，飞流直向碧峰悬；
千村泽自层涛出，万壑雷从一涧穿；
帘捲朱光澄洞口，练拖云影拍青山；
到来漫问桃源渡，一望仙源更杳然。^{〔文〕}
（作者单位：中共黄平县委党史研究室）

注 释：

- 〔1〕神话传说中的力士。
- 〔2〕“平播之役”是明朝政府镇压播州（今遵义）土司杨应龙的反叛的战争，也是遵义地区迄今规模最大的战争。
- 〔3〕李占春，黄平县人。其父是卫指挥，官至副总兵。生性好文喜客，豪迈不群。明熹宗天启年间（1621~1627），以选贡历云南通判，虽才识为上官倚重，然落落不得志。明朝灭亡后，回乡隐居，撰《黄平州志》。
- 〔4〕王松，字文重，号蒲水，世称文庄先生，黄平新州人，康熙二十六年（1687）中举，出任石阡府学教授，又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中进士。其五个儿子中，有举人二人、文进士一人、武进士一人、太学生一人，被誉为“五子登科”。
- 〔5〕朱定元（1686-1770），字奎山，清乾隆贵州黄平举人，历任山东巡抚，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

红色朗洞尽朝晖

文 / 图 王世海 周年荣

朗洞镇位于榕江县北部，地处万山合围的河谷地带，距县城古州北约85公里，距省城贵阳东约120公里，处东经108° 33'、北纬26° 21'，海拔575m；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冬暖夏凉；现今交通便利，为几条公路的交通枢纽，即将落成的剑榕高速公路串镇而过。朗洞古城历史文化灿烂，史来地属黎平府，清乾隆二年建城，于城内置朗洞营参将和城南守备署，属五开卫仍由黎平府辖，宣统元年，城内城外皆归古州厅，民国三年朗洞为榕江一等分县。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2月，中央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后，由湖南通道转兵入黔。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后，红三、五军团和中央纵队，经黎平的八里、尚重到达高洋。红三军福建师击溃国民党榕江常备队和地主款团后，挺进榕江的八书、盘假、半溪、羊全，于12月23日到达朗洞安营整编，并于朗洞四面的村寨驻兵设卡。12月25日，红军离开朗洞，经剑河，继续北上长征。

红军在朗洞期间，设指挥部于邱家大院，并于城东门口田坝岩梁冲溪口处，召开了近万人的军民大会，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还在大街小巷张贴和书写宣传标语，号

召群众投身革命，打倒反动势力，推翻封建统治。红军在朗洞纪律严明，团结群众，为群众修桥补路、修整庙墙、访贫问苦、看病送药、挑水扫地，受到群众的爱戴和拥护。群众为红军挑东西、打草鞋，有的还参加了红军。村民王尚祥、王贵玉、姜义有等群众抢救和收留红军伤员在家养伤，邱家丫头田桃花等还为红军洗衣送菜。红军离开朗洞后，朗洞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因伤掉

红军长征陈列馆



队的罗光照、刘光国、李世勋、朱开英、邹永春、胡金山、张秋松等20余位红军战士，红军从此在朗洞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人民群众是红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深厚基础，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红军长征胜利的重要因素”。

80多年过去，今日朗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发生了沧桑巨变，改革开放后的朗洞以日新月异的面貌站在新时代的潮头。人们怀念红军过朗洞时的光辉岁月，广大群众以无限崇敬的心情保留了当年红军留下的旧址遗迹并珍藏了他们的遗物，还兴建纪念碑、烈士陵园，每年举办红军过朗洞的“长征文化节”等，纪念、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朗洞红军驻地旧址”于2018年7月被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六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红色朗洞在黔中大地熠熠生辉。

榕江朗洞红军驻地旧址文物清单如下：

一、红军指挥部旧址 位于朗洞镇东门街，坐南朝北，处东经108° 33'18"、北纬26° 21'40"，海拔575m。旧址为青砖窰子，始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平面呈长方形，通面阔12米，通进深30.35米，占地面积364.2㎡。

旧址自前至后沿中轴线由门墙、前厅、天井、正屋、后院组成。门墙八字外开，通高13.4米，墙顶饰瓦檐；中下开大门（相似石库门），阔1.4m，高2.2米，门额饰横匾，今有行草横书“红军长征朗洞陈列馆”。前厅进深5.6米，木构两层，四排三间小青瓦屋面，设地楼以防潮。天井宽7.6米，进深3.1米，由大石砖铺墁，其左右靠墙设木构走楼连接前厅与正屋。正屋进深9.2米，木构两层，四排三间，小青瓦面；明间为燕窝门，上层装一马三箭格棂窗，下层设地枕地楼以防潮。后院进深4.4米，置青石雕花太平缸一口。

旧址原为民宅，即邱家大院，红军过朗洞时为红军指挥部，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政治委员邓小平、军长张云逸、参谋长龚楚、

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等曾先后在此开会，研究作战任务，今为“红军长征朗洞陈列馆。”

二、红军首长驻地旧址 位于朗洞东门街，坐北朝南，与指挥部旧址隔街相对，处东经108° 33'18"、北纬26° 21'40"，海拔575m；始建于清乾隆年间（1736—1795），为四合院式封山马头墙两层穿斗木构青瓦顶建筑，平面呈长方形，通面阔21.4米，通进深34.3米，占地面积734米。

旧址自前至后由门楼、倒座、两厢（天井）、正屋及后厦组成。门楼位于临街左侧，斜向东南，八字外开，面阔4.2米，通高12米，上设青瓦雨檐，下开青砖石库门，门额凹墙饰匾，其上正楷横书“三槐世第”。门墙上留有红军标语两幅共11条，竖向行书，内容为“苏维埃政府反日主张（共5条）”和“白军抗日六条纲领”，落款为“红军全体宣”（红军北上后，标语为石灰覆盖，1965年，县文化馆王殿禹馆长及馆员杨芳明等走访群众得知后撬掉石灰，原迹显现。1979年标语被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倒座进深（不含外檐墙体）10米，六排五间，上下两层，穿斗木构青瓦顶。天井宽9米，进深5.6米，青砖铺墁。两厢各为三排两间，穿斗木构青瓦顶，面阔8米，进深4米。正屋进深8.8米，六排五间，上下两层，穿斗木构青瓦顶；一楼明间双开门，高门坎；二楼装一马三箭格棂窗。紧靠正屋设后厦，进深6.4米，穿斗木构青瓦顶，为厨房。

首长驻地旧址原为民宅，即王家大院，红军过朗洞时为红军首长驻地（首长待考），有警卫人员站岗和进出。红军走后，王家继续居住，上世纪80年代渐次朽坏，今存正屋三间及后厦。

三、红军驻防旧址 为宰林天后宫，位于朗洞城南2.5公里处的宰林村三自然寨之间，地处东经108° 32'49"，北纬26° 20'21"，海拔612米；始建于清康熙年间（1662—1722），毁于咸丰苗民起义，光

绪三十年（1904）重建正殿，文化大革命时又部分损坏，1993年、1996年、2001年均有关维修。今存残损正殿及门墙。

宫坐东南朝西北，原貌为三阶高封火山墙二进院落穿斗木构青瓦顶建筑，通面阔16.5米、通进深28.5米，占地面积470.25平方米。门墙青砖砌成，八字外开，石库门，上有青瓦雨檐；面墙砖饰立柱4根、拱门窗6个（大门左右各3个）。前殿进深6.87米，四排三间，穿斗木构青瓦顶，雕枋头，鹅颈檐。天井宽阔，植树种花。正殿进深9.2米，穿斗木构，明次三间，五柱落脚，小青瓦面；檐下横匾一块，上书“天后宫”；殿内正中供奉林默菩萨（即妈祖、天后），其左为观音，右为如来；左右排扇枋均有浮雕，内容为人物、古庙、佛塔等。

天后宫原为朗洞民众的宗教场所，红军过朗洞时为红军驻防之所，曾有两个连驻防宫内，并于宫外通往南面九董、色同、高表的大路上设哨卡一处，警戒白崇禧驻扎古州方向的两个师。天后宫南面外墙上存有当年红军标语一条“坚决剿灭特务土匪武装，为民除害”，落款为“中国工农红军红三军团福建师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四、军民大会遗址 位于朗洞城东门口田坝岩梁冲溪口处，占地面积约8500平方米，由田土与河滩构成。红军进驻朗洞城的第三天，当地群众喜气洋洋从四面八方赶来，因是开会，人越来越多，原定朗洞学校操场容纳不下，就临时在岩梁冲溪口田坝搭台举行。大会由政治部主任陈豪人主持，军长张云逸首先登台讲话，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民族政策和团结抗日的主张。总指挥李明瑞接着宣读了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发布的《关于实现“创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训令》及《关于我军沿途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向朗洞广大群众阐明我党的政治主张，反复强调维护革命纪律对于保证战斗胜利、对于求得民众支持的重要意义

（部分资料由省党史办提供）。开会当天，红军还在朗洞的大街小巷张贴和书写标语，号召民众投身革命，打倒反动势力，推翻旧中国。

五、红军桥遗址 位于朗洞镇南2.5公里宰林老寨溪口，处东经108°32′48”、北纬26°20′10”，海拔612米。当年红军在朗洞休整、整编时，曾在“天后宫”处设立哨卡驻守。为便利宰林及附近村寨群众跨水过溪，便于溪口处修建一座木桥。桥南北走向，长约18米，宽约4米，溪中设木笼石墩，两岸以卵石垒砌为桥头，墩上架杉原木10根，并于桥面两侧绑树条为桥栏，群众行走或挑担过桥，非常便利安稳，称桥为“红军桥”。

群众还编歌一首，赞美红军：“红军桥，红军桥，修得好，修得牢。桥面宽又平，左右还修栏杆靠。红军修桥为群众，村民永远忘不了”。

民国二十七年（1938），桥被洪水冲段。今朗洞人民政府于遗址上建起了钢筋水泥大桥。

六、干巴溪红军哨卡 位于朗洞镇平地村东北岸干巴溪口旁边，处朗洞通往剑河县太拥乡的山路上，距平地村0.5公里，距朗洞镇北约2.5公里。1934年12月23日，中央红军于此设哨卡，青石垒墙横于山路，南北走向，高约1.5米，路北长约2米，路南长约4米。卡墙北傍石崖，崖上有大荷木树一棵，枝叶繁茂。哨卡西河岸上为基坑山，南为棉花坪，红军在哨卡左近的岑王寨驻防警戒一个连。哨卡今存遗址。

七、宰练红军哨卡 位于朗洞镇宰练村侧，处朗洞通往羊全、半溪的大路上，距朗洞东北约1.8公里，山石垒砌卡墙，长约7米，高约1.5米。红军在宰练寨驻防警戒一个营。哨卡今存遗址。

八、棉花坳红军哨卡 位于朗洞镇与

奔坡溪之间的棉花坳上，距朗洞西南1.5公里。卡墙由山石垒砌而成，长约12米，高约2.3米。红军在此驻防一个排，警戒西南空申、空烈、两汪、乐里及西面台江之敌。哨卡残墙尚存。

九、红军长征过朗洞纪念塑像 位于朗洞镇北侧（原主大街街头），处东经108° 33′ 19”、北纬26° 21′ 49”，海拔582米，由朗洞镇人民政府于2004年5月为纪念红军长征过朗洞而立；基址圆形，直径14.98米，占地面积176.2平方米，圆周设栏板望柱；基址正中为塑像，朝东，塑像由底座和人物塑像组成：底座为正方体，高、宽各3米，贴朱红色瓷砖，正面有贵州省军区副司令员张量（长征中曾过朗洞的老红军）题字，竖向隶书阴刻“红军长征过朗洞纪念碑”；人物塑像为3个红军战士，一人高举火炬，另两人各持刀、枪。

十、红军长征过朗洞纪念碑 位于朗洞镇大桥东面的小山下（通往羊全、半溪的公路旁），处东经108° 33′ 26”、北纬26° 21′ 48”，海拔598米；基址为高台，平面呈长方形，面阔10米，进深4.9米，占地面积49平方米；有21级水泥踏步可登。

纪念碑由碑座、碑身、碑帽组成。碑座

正方体，长、宽、高各为1.96米，贴朱红色瓷砖。碑身为四棱柱体，上略小，高约12米，正面向西，竖向隶书“红军长征过朗洞纪念碑”10字。碑帽悬山式，盖朱红色彩瓦。纪念碑由朗洞群众集资始建于1997年4月，原址位于朗洞镇主大街北头（现在的纪念塑像处），2003年12月由朗洞镇人民政府于今址重建，2005年竣工，至今保存良好。

十一、朗洞烈士陵园 位于朗洞北门外碉堡坡半山，距镇北0.5公里，处东经108° 33′ 20”、北纬26° 21′ 45”，海拔600米；始建于1993年秋，复修于2014年夏；基址为高台，平面略呈三角形，西面边长20.97米，南面边长12.26米，占地面积约140平方米。陵园中建有烈士纪念碑，用砖石及水泥浆砌，水泥粉面，面向东方。纪念碑由碑座、碑身、碑帽组成。碑座正方体，高1.7米。碑身略呈四棱柱（上略小），高约9米，正面用水泥塑字，竖向正楷“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碑帽近似覆斗形，高约1米。

园中有烈士墓4冢，并排而立，安葬红军战士罗光照、刘光国，解放军战士潘尚、王昌海。

朗洞的红色文物及红色文化红遍朗洞河畔。为展示中央红军过朗洞的光辉岁月，缅怀为革命而牺牲的革命烈士，弘扬红军伟大的革命精神。朗洞人民群众于近年间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长征文化节”纪念活动：唱红歌、演红戏、着红军服装游行、重走长征路、清明扫墓为烈士敬献花圈、召开文艺座谈会、创作文艺作品、把红色文化引进校园等。如今的朗洞迎着西部旅游大开发的春风，挖掘打造红色旅游文化，引领地方群众走向致富之路。

长征革命精神永垂千古，朗洞广大群众世代相传。❶

（作者单位：榕江县朗洞镇综合文化站）

红军的宣传标语



郑珍与唐树义的画外深情

文 / 图 王珺偲

一

晚清的郑珍(1806年--1864)是黔地文化的卓越代表,平生成就固在学术和诗文,但丹青造诣也是清代贵州屈指可数的大家。

郑珍作画,多是意兴所至,偶一为之,但是在画作背后,无不深刻的蕴含他的醇醇深情,《待归草堂图》便是郑珍存世不多的画作之一。

“待归草堂”位于贵阳市郊之堰塘坎,又名唐家花园,占地数十亩,主景为水域广阔的堰塘,塘中碧波荡漾,广植荷花,岸上竹树茂密,亭榭棋布,怪石嶙峋,号称“贵阳第一园林”,是时任湖北按察使的唐树义所建。咸丰二年(1852),唐树义致仕后回到贵阳,郑珍与他多次在待归草堂雅园漫步,吟诗酌酒。

《待归草堂图》为水墨圆扇,图上篆体落款:“待归草堂鄂生属柴翁作。”鄂生,便是唐树义的儿子唐炯的字,柴翁是郑珍的自号。

画中用简逸的笔墨绘房屋一楹,屋侧篱边梅树、梧桐各一株;临水湖石叠磊错落,石旁幽篁数竿,轻盈随性;小舟偃于湖岸,古木竹间隐约有人影在看书行吟。

然而,景致号称“贵阳第一园林”待归

草堂,在郑珍的画作中,却无意雕梁画栋,意境冷寂深幽。其实这幅送给“鄂生属”的画作背后,是郑珍借景抒怀,对唐树义的深切情思,凄凉而潸然。

咸丰三年(1853)初夏的夜晚,郑珍与唐树义在待归草堂中最后一次相聚话别。本以为还可以相逢相见,但无奈竟成永诀,成为郑珍心中最酸楚的遗憾。

二

郑珍与唐树义的情谊源于家世,郑珍的祖母程倩就是唐树义的表姑,辈分上唐树义是郑珍的表叔。郑珍在老家天旺里(今播州区鸭溪镇)时,就与唐树义的族伯唐源洪家毗邻而居。郑珍童年时,经常随祖父、祖母与唐家亲戚相互串门,五岁发蒙读书时,表伯公唐源洪还送了一方端砚给郑珍。

唐树义(1793——1855),字子方,生于贵州遵义北门。道光年间,唐树义出仕湖北为官,郑珍在进京参加科考以及游学湖襄时,都前去拜望唐树义。郑珍的勤奋与才学给唐树义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两人经常书信来往叙述诗文情谊,情感递增。

十数年过去了,郑珍勤奋与努力成为了著名的学者,声名远播。唐树义也官居高

位，为政一方。此时，唐树义的四儿子唐炯已满十八，从湖北回贵州参加科举考试，唐树义就叫唐炯回乡后去拜望郑珍，向他学习讨教。

唐炯回到遵义后，向郑珍学习诗文，一起游历黔中山川名胜，两年后高中举人，两人交往甚密，情谊深笃。

唐树义一生在外为官，多年的宦迹让的唐树义思乡心切，只想致仕待归，于是他在任湖北任布政使时“寄声其家，为构一区于贵阳城，颜曰待归草堂。”

咸丰二年唐树义致仕，了却“待归”的心愿，回到贵阳成山（今贵阳乌当区水田镇水田坝）待归草堂。是年秋，郑珍带着历经数年收集的黔北诗文手稿《遵义诗抄》前去贵阳，拜见表叔唐树义。

郑珍在唐树义家居住了较长一段时间，与黔中名士一起“诗酒流连，抵掌纵论天下大事”。在此期间，唐树义看了郑珍带来的上至明代万历二十九年（1601）播州改土归流，共250余年间黔北地区的两千多篇诗文掌故，爱不释手，十分赞赏。他对郑珍说：

“乡里耆旧，其行义文采已多无传，赖有此，不宜更闕。”

唐树义还将《遵义诗抄》改名为《播雅》，并出巨资刻印刊行。郑珍日以继日的编稿点校，每到贵阳，也必到成山待归草堂看望拜访唐树义，两人往来密切，情谊深笃。

三

唐树义致仕回乡那年，太平天国在起事，风起云涌，从广西北上占领了武汉、攻克了南京，震动清廷。咸丰三年（1853）初夏，朝廷重新起用卸任了的唐树义为湖北按察使，帮办湖北军务，征剿太平天国。

唐树义临行前，郑珍到贵阳前去送行。唐树义在“待归草堂”中设宴款待郑珍，两人把酒而言，别离话长，郑珍把与唐树义告别的情形写成一首长诗：《送唐子方伯奉命安抚湖北兼寄王子寿主事》。

郑珍和唐树义从太平天国的兴起说起，谈到湖北荆楚大地“盘盘大都会，雄踞荆扬



待归草堂图
(《柴翁书画集钞》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

喉”的战略地位；谈到“鬼哭熊江城，血沸鸛鵚洲”的战乱惨象，为着“哀哉亿万家，积尸成陵邱”的生灵涂炭而悲悯。

酒入衷肠，感慨万千。虽然一旨诏书，打乱了唐树义致仕清修的生活，但是在国家危难面前，唐树义同样有着“男儿当此时，何暇为身谋”的凛然气概。

郑珍虽然是一介书生，但是其博学也让他对战事有深刻的看法，他向唐树义提出：“连云固北洛，淮黄鞭敢投。武昌当其中，握运看纵收。上流捍荆樊，下风临粤瓠……扼中全在此，成谋预宜周”。唐树义深感认同，并邀请郑珍一同前往，郑珍以“小草无远志”要编纂《播雅》以及著书而婉言相拒。

酒到酣畅时，郑珍把唐树义比作宋代名将韩琦、范仲淹等人物，写下“我公韩范姿，虑能制盘馐”的豪言相赠，祝愿他在疆场上建立不世功勋，并期望在战争平息之时，再与唐树义一起“早晚持櫜具，相逢黄鹤楼。”

唐树义到达湖北后，四处招募军士，初与太平军交锋，三战三捷。后来，湖广总督吴文镕率兵七千余人进驻黄州以北的堵城，命唐树义领水师千余人扼守上游，围攻黄州的太平军。在向黄州发起进攻前，唐树义曾向湖北巡抚增请兵马弹药未果。战斗打响后，陆军被太平军击溃，唐树义的水师也被包围在金口，唐树义所招募的军士也所剩无几，突围无望时，他写下绝命词投水而亡。

贵阳成山的“待归草堂”再也等不到那个“待归”的唐树义，残酷的战争，让郑珍的美好祝愿和“把酒相逢黄鹤楼”的约定落空，郑珍失去了一位亦师亦友的知己长辈。

四

咸丰四年（1854）年正月二十三，唐树义在湖北金口投水阵亡的消息传回贵阳，唐树义的儿子唐炯在伤痛之余立即动身赶赴湖北，寻找父亲的尸体。郑珍得到唐树义投

水阵亡的消息时已是初夏四月，他正在老家禹门，心中悲伤、愤慨交织，写下《闻唐子方方伯正月二十三日舟至金口，贼大上，募卒尽散，遂投江死》：

处义从容见若人，播州而后有名臣。
楚藩未老先投组，天步方艰却致身。
办贼孤拳余痛哭，拊心一死报君亲。
知驱江汉滔滔水，净洗妖尘愤始伸。

郑珍回想两家的姻亲渊源和密切的关系，想到了唐树义对自己的支持和帮助，两人诗酒相和惬意往事，不禁痛哭涕零，在禹门家中开设灵堂祭奠唐树义。

郑珍年少时随父母搬迁到禹门尧湾，其居住的房屋较为破烂，父母都有营造新房的愿望，但是未建成便离世，葬于子午山。后来，郑珍编修《遵义府志》所得的银两买得子午山空地，他将房屋新建在父母的坟茔不远处，朝夕相望，取名为“望山堂”。郑珍把唐树义的灵堂便设置在“望山堂”中，把他当作自己最亲的亲人祭奠，并还给唐树义立了一个衣冠冢。

郑珍在望山堂设灵位祭奠唐树义，心中思绪万千，想到与唐树义的情谊，想到唐树义的死难悲壮，哀思绵绵，他提笔写下《四月望，设位山堂奠子方，酌以诗四首》，其中第一首回忆去岁今时的别离，唐树义当时就是慷慨而去，虽然遗骸不在，但其正气存于天地：

去岁今朝别故关，出门已判不生还。
令斌有托先成许，鲍信无伤独可潸。
正气但存天壤内，委骸终在地球间。
听歌楚些留堂眺，应笑真游子午山。

在诗的最后，郑珍原注：“公曾梦至山堂，言其地宛似。”在这句平淡的注释中，蕴含的是唐树义与郑珍的那些未完之约的遗憾，回思黯然。

郑珍在这四首悼诗中，还有一首诗回

顾了唐树义助刊《播雅》以及帮助自己的种种事情，两人虽是表叔侄，但是情同手足知己。郑珍写下：“文书何感志千秋，事赖相扶胜自谋。墓下偷生成我老，人间知己到公休。”

“墓下偷生成我老，人间知己到公休。”这种活于人世，再无知己的寥落感慨；这种超越年龄辈分的情谊，以最残酷的方式诀别，郑珍心中最伤痛、深情、凄凉的呐喊，化着“寂寞苍山风月夜，梦魂相遇话时忧”的诗句，催人泪下。

五

郑珍在给唐树义开设灵堂祭奠后月余，唐炯在湖北寻找父亲唐树义的尸遗骸，多亏了当地人将其埋葬在金口江边。唐炯寻得遗骸后，立即给郑珍写了一封信，讲述了寻找尸体的过程和种种情况。郑珍接到唐炯的信后，得知遗骸已经寻到，心中也算放下一桩心事，又得知唐树义左眼被长矛刺杀失目的状况，心中哀痛，他写下《闻奏得子方尸金口旁小水，体有矛伤失其左目》：

旬初已讣寔冠裳，忽喜尸存夏浦旁。
骨母但宜收贾贩，江鱼岂敢葬忠良。
几人亲见从容死，独怪何来数十创。
会有能言他日事，此中天鉴不茫茫。

也在这时，郑珍被选为荔波县教谕，他并未前往荔波任职，而是在老家整理唐树义的诗词遗稿，编入唐树义亲自定名的诗集《播雅》之中。

咸丰四年八月，黔北一带兵乱四起，桐梓人杨凤（又名杨隆喜）起兵占领县城，四方抢掠，直逼遵义城，兵乱的局势开始失控，郑珍所在的禹门也深受其害。

为了躲避兵乱，郑珍在咸丰四年冬月底前往荔波，上任教谕。正值岁末年近，郑珍一家分两路凄冷的赶赴荔波。郑珍独自来贵阳，前省府出具上任“文书”，然后再辗转

去荔波与家人汇合。

郑珍到贵阳已是腊月中旬，他来到成山唐树义家待归草堂，回想去年初夏时节的夜晚，他与唐树义在这里话别，堂内的明灯高悬，杯盏交错。虽是别离，但是情浓意长，相约日后的把酒重逢，然而这一切都成了镜花水月。

郑珍独自坐在待归草堂的亭台中，腊月的寒风也不及他心中之寒，往事历历，满目凄冷。亭台周围的花草树木，奇石流水都是那么的熟悉，映现着与唐树义在梅边柳下把酒作诗著文，同榻而眠，同舟泛月的美好时光，每一处景致都带着与唐树义的深深回忆。郑珍久坐在这里，触物苍凉，仰天叹息，哀思无限，他写下《过唐子方待归草堂》一诗：

麦秋时节夜灯悬，薄送于畿忆昔年。
怪石重摩应识我，荒亭独坐久瞻天。
梅边未撤看云榻，柳下犹沈泛月船。
触物苍凉无限思，当时分手已凄然。

再看郑珍所作的《待归草堂图》中，怪石荒亭、梅树云榻、幽湖月船的冷寂深幽，不正是此时郑珍诗作中意境吗？画作背后的无限思绪，尽在凄凄然中。

咸丰五年（1855）二月，唐炯将唐树义的遗骸运回贵阳，葬于成山水田坝。是年九月，郑珍辞去荔波教谕，举家来到贵阳祭奠这位既是长辈，又是知己的表叔。次年二月，郑珍又与唐炯前往成山悼念唐树义，并为其撰写碑文；咸丰九年（1859），郑珍在读唐树义的书札时，仍然痛哭不已（余不知涕之泫然也）。

郑珍与唐树义相聚相别的待归草堂已不复存在，但存世的《待归草堂图》，不仅是对曾经那个“贵阳第一园林”的写照，而在画的背后，是郑珍与唐树义的那段深情厚意，也是郑珍难以言怀的凄然哀思。文

（作者单位：凤冈县交警大队）

朱洪祚：“三湘英烈”血沃黔北

文 / 图 吕金华

最近，读饶怀民主编、湖南省革命烈士传编纂委员会编、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的《三湘英烈传》（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1卷），读到一篇“朱洪祚传”，发现与黔北绥阳、桐梓大有关系。现录全文于此。

朱洪祚，原名周金波，又称朱大耳朵，生年不详，湖南长沙县人。因家境贫寒，“曾投营当勇”，嗣“寄住黔西州属”桐梓县境内，靠做小贩谋生。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期间，随着各种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化，少数民族反抗清朝压迫的斗争此起彼伏，贵州先后爆发张秀眉、姜应芳领导的苗民大起义。这些起义被镇压后，汉、苗族官僚地主的残暴统治变本加厉，人民不堪忍受。朱洪祚对清廷腐朽统治极为不满，即以“货郎”身份游走四方，联络各地会党和农民首领，准备反清。1879年2月8日，朱洪祚路遇素识之会党头目姚方二（即姚和尚），由姚引至徐小满家。徐身背菩萨，声称能言祸福，见朱洪祚“相貌奇异”，乃言“朱洪祚是真主出世能成就一番大业”。朱洪祚对徐所言深信不疑，反清之志益坚。

1879年4月9日，朱洪祚在桐梓月亮洞邀集姚方二、徐老大、徐老二等十数人“歃血

订盟”，发誓反清。朱洪祚封姚方二为军师、徐老大为元帅、徐老二为将军，并派人前往各州县联络会党，“暗制器械”，待机而举。嗣后，朱洪祚与姚方二等人以绥阳县属黄村坝山上的一座古庙为据点，发动周围贫苦群众，武装反清。

1880年6月，桐梓地方农民首领毕香亭、田洪山、王善廷、成子江等率众前往投奔，



（清）岑毓英撰《岑襄勤公奏稿》三十卷

朱洪祚势力大增，即封毕香亭为“开国大元帅”，田洪山、王善廷、成子江等为先锋、将军，并遣人在老厂、杨村坝一带山洞制造器械、旗帜，刊刻“天道复明”木印，以“反清复明”为宗旨，散发札符号片，联络会众。不久即聚众数千人。朱洪祚与毕香亭等人商议，决定于10月6日正式竖旗举事，由毕香亭率众打前锋，“先取桐梓，再夺遵义、绥阳”等处城池，朱洪祚则负责联络各方，“准备接应”。

1880年10月6日夜，毕香亭、成子江等率部按原计划先攻打桐梓县城，孰料署桐梓县知县魏学恒已于10月4日侦知起义之事而早有准备，加之该夜风雨大作，义军后路不济，攻城失利，成子江兵败被擒，毕香亭被记名提督何秀林所部俘获，朱洪祚逃至桐梓水城犄角地方。贵州巡抚岑毓英以朱洪祚在逃未获，“实有除恶未尽之憾”，惟恐朱洪祚伺机再举，即“分咨邻省，通飭各州县，立重赏，并选派文武员弁一体购线踩缉”。1881年3月28日，朱洪祚为清副将蒋柏胜擒获，不久被清政府凌迟处死。

顺着该文提供的线索，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清实录》《清代帮会史》《哥老会的起源及其发展》《晚清哥老会研究》《贵州通志》等多种图书都载有朱洪祚的点滴事迹。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岑毓英奏稿》、《清代稿钞本》（六编第287册）、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岑毓英集》、成文出版社民国年间出版的《岑襄勤公奏稿三十卷》等图书中，载有两篇由时任贵州巡抚岑毓英写的奏稿，详细叙述了朱洪祚在绥阳和桐梓率众起义的经过情况。现录两稿全文于此：

扑灭桐梓县会匪折 （光绪六年十月二十日）

奏为桐梓县会匪窃发攻城，旋经扑灭，擒斩首要各犯，地方现已安靖，恭折由驿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黔省苗、回杂处，跬步皆山，外来匪徒，往往勾通本地土匪，结盟滋事。由于岩

洞幽深，发觉不易，臣到任以来，虽屡次严办，未尽歼除。本年又叠据各府厅营县，先后拿获威宁州匪犯郑二、毕节县匪犯常麻子、龙泉县匪犯万步青、水城厅匪犯姬秉璋、兴义县匪犯方小详、清镇县匪犯贾正魁、安顺府匪犯熊正亭、修文县匪犯曹理堂等，共六十七名，皆系哥老会匪，罪不容诛，均于讯明后即行正法。一面仍飭各属文武认真查拿去后，嗣臣在普安厅城校阅营伍，接据署桐梓县知县魏学恒飞禀：本年九月初一日，访有毕香亭，伪称元帅，在桐属老厂、杨村坝一带潜纠匪党数千人，散给伪札、号片，定于本月初三夜窃发攻城。该署县当即飞咨邻邑，请兵协剿，一面会营集团守城。是夜果有伪先锋成子江带匪数百人直扑城下，幸该县汛督同兵团击退，杀毙执旗贼目二名，生擒伪先锋成子江及贼目张和尚、罗二、卢长受三名，从身中搜出伪札。提讯成子江，供认系属伪先锋，张和尚等亦承认系伪头目不讳。该署县恐有疏虞，即将成子江等四犯正法，臬示城上，禀请调兵剿办，将伪札呈验等情，并据遵义府协各禀报前来。

臣查阅伪札，词甚悖逆，当以逆匪等结党既多，聚集不散，若非重兵迅往扑灭，转恐蔓延为患。即经飞调记名提督何秀林，统带安义、松桃、归化、水城等营练军驰往剿办。藩司林肇元在省接禀后，亦檄派统带大定等营练军候补知府杨熙瑞、管带长寨营练军参将李上荣分道星夜往剿。

适管带遵义协练军都司江翰清、彭元春等先于初五日遵调带兵驰抵该县。署知县魏学恒先贴告示，解散胁从，一面与桐梓汛千总周有才，会同江翰清等前往围攻老厂贼巢。该匪并力迎敌，魏学恒等督阵力战，毙贼多名，斩获贼目首级十一颗，生擒贼将张明山、徐满二名。官军乘胜力攻，贼势抵敌不住，越岭而逃。当将老厂贼巢攻破焚毁，查点兵团带伤四名，随即移攻杨村坝。因闻逆匪有夺犯之谣，即将张明山等二犯一并斩首臬示。

至初八日，匪党闻官军四集，畏惧潜逃。伪帅毕香亭力不能支，弃杨村坝，率死党寅夜逃窜。官军跟踪尾追，武举王心霖、贡生

令狐正容、监生陈连曾等带团先抄小路至仁怀县属之尖茶溪地方，将贼拦截，犹存五十余人，抵死相拒。队目杨光元、江玉元、陈东等均受重伤，我兵枪炮齐施，轰毙贼将马长受及余匪二十余名，复奋勇追杀。署绥阳县知县李钟杰亦带团合围。其时贼势已穷，纷纷扑入溪水，即在该处擒获伪元帅毕香亭、伪将军田洪山二名，余匪皆淹毙溪内，无一漏网。现在各属地方安靖，派去各营官兵，皆陆续撤回。

叠据该文武等禀报到臣，当即批飭该地方文武再行搜捕余孽，毋稍松劲，并查明被害村寨，妥为安抚。仍将毕香亭、田洪山二犯解省审办。臣于阅毕普安、兴义等处营伍后，即折回省城，督同司道提犯研鞫。

缘毕香亭、田洪山籍隶桐梓、绥阳等县，均不务正业。光绪六年正月十四日，毕香亭与素识在逃之王善廷、岳春山、陈洪润（即曾品山）、杨辅堂等会遇，知有外路人朱洪祚（即朱大耳朵），年约三十岁，扮作货客模样，在绥阳县属黄村坝山上古庙暗结匪党，邀同往见。毕香亭因见朱洪祚相貌奇异，随受开国大元帅伪封，允为纠夥相助。朱洪祚因往别处邀人，毕香亭当与王善廷等四处结拜弟兄，并纠已获之田洪山、成子江等入伙，伪封先锋、将军等职，在老厂等处山硐制造器械、旗帜，刊刻“天道复明”木质伪印，散给伪札、号片，本约先袭桐梓，再取遵义、绥阳、正安各处城池。

至九月初三日，毕香亭派成子江先行攻打桐梓县城，自带后队前进，因机关败露，官兵早有准备；又是夜风雨大作，毕香亭后队不济，未至城下，致成子江被官兵击败擒获。维时王善廷等先已各自逃匿，毕香亭尚集党与负隅抗拒，旋经官兵围剿，将毕香亭、田洪山擒获，解省审办，据供前情不讳。追查伪印、名册，据供在老厂被官兵攻破焚毁，无从缴案。

查毕香亭等二犯谋为不轨，皆罪大恶极，未便稽诛。臣于十月十八日讯明后，恭请王命飭委署中军参将李景昌、贵阳府知府汪元庆将毕香亭、田洪山二犯绑赴市曹，凌迟处死，并将首级解赴犯事地方，悬竿示众，以昭

炯戒。

伏思桐梓县会匪毕香亭等，胆敢听信妖言，受封伪职，暗约匪党，窃发攻城，实属悖逆已极。兹幸仰仗天威，克日歼灭，免致涂炭生灵，地方幸甚。未获匪犯，现通飭各属悬立重赏，购线踪缉，并咨会云南、四川、湖南、广西各邻省督抚臣一体飭属密访查拿，务获惩办，以绝根株。惟黔省苗疆地方，人心本易煽惑，且山深箐密之处，伏莽尚多，全赖地方文武官绅尽力搜捕，俾消患于未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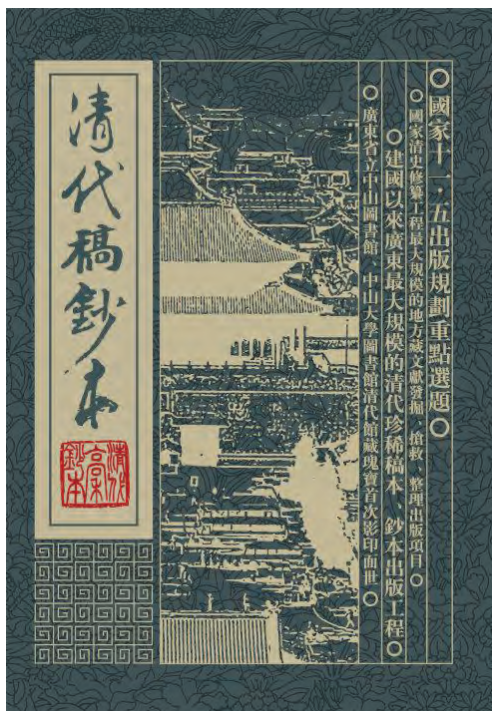
所有前次梵净山、董倒寨及此次桐梓会匪滋事各案内，在事出力文武员弁绅团，不无微劳，可否仰恳天恩，容臣分案汇单，择优保奖，以昭激劝之处，出自逾格鸿施。

除将伪札咨送军机处备查外，谨将扑灭桐梓县会匪擒斩首要各犯缘由，会同云贵总督臣刘长佑、贵州提臣张文德恭折驰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拿获逆首朱洪祚正法折

（光绪七年五月初六日）

奏为上年桐梓县会匪滋事案内逆首朱洪祚，业经拿获讯后正典刑，谨将获案审办情形，恭折附驿具奏，仰祈圣鉴事。



清代稿钞本

窃案查光绪六年九月初三日，桐梓县有会匪窃发攻城。经该署知县魏学恒会营集团将贼击退，生擒伪先锋成子江等正法，稟请调集官兵先后攻破老厂、杨村坝贼巢，剿灭匪党，擒获伪帅毕香亭等解省审明惩办。当将擒斩首要各犯办理情形，臣已于上年专折奏明在案。所有案内逆首朱洪祚(即朱大耳朵)在逃未获，实有除恶未尽之憾。复经臣分咨邻省，通飭各属悬立重赏，并选派文武员弁一体购线踪缉，期在必获。兹据贵西道曾纪凤禀：访闻该逆首朱洪祚，潜匿水城犄角地方。该处山径崎岖，悬崖万丈，为人迹所罕到。经副将蒋柏胜等，于二月二十九日设法擒获，由该道提犯讯供不讳，将该犯解省审办等情。据经批司查案发审去后，兹据署按察使张煦督同贵阳府知府汪元庆提犯研讯明确，按拟招解前来，臣随提犯研鞫。

缘朱洪祚(即朱大耳朵)，本姓周名金安，因欲煽惑人心，随改姓名朱洪祚，原籍湖南长沙县，寄住黔西州属，前曾投营当勇，后因犯事斥革。光绪五年正月十八日，朱洪祚在威宁州黑章地方，路遇素识在逃之姚方二(姚和尚)，将其引至徐小满家，见徐小满身背菩萨，口言祸福，妄言朱洪祚是真主出世。惟时

有杨溃受、徐老大、徐老二在旁，俱愿结党相助。朱洪祚信以为真，遂起意谋反，约定三月十八日在月亮硐吃血酒议事。届期姚方二等邀同甘五溃等，齐集硐歃血订盟，商议各纠同党，暗制器械。朱洪祚当伪封姚方二等为军师、元帅、将军等职，以后时聚时散，并无一定住址。六年正月间，朱洪祚与姚方二等在绥阳县属黄村坝山上暗结匪党。当有已获正法之岳春山等，带同毕香亭等往见朱洪祚，即封其为伪元帅。毕香亭亦允纠夥相助，商约一切齐备，夺取城池。朱洪祚遂往别处纠人。后毕香亭拟定九月初三日先取桐梓，再夺遵义、绥阳、正安等处城池之言，遣人与其暗通消息。朱洪祚即与姚方二等暗纠贼党，准备接应起事。旋经署桐梓县知县魏学恒先期访闻，会营集团查拿防守。是日该匪攻扑县城，经该县营将贼击退，生擒伪先锋成子江等正法梟示。复稟请调集官兵，攻破贼巢，擒伪帅毕香亭等，解省审明，照律惩办该犯。朱洪祚等在逃未获，悬赏购线严缉在卷。经副将蒋柏胜等于本年二月二十九日将该逆首朱洪祚拿获解省，当经批司查案发审去后，兹据署按察使张煦督同贵阳府知府汪元庆审明，按拟招解前来。

臣提犯研鞫，据供前情不讳，案无遁饰。查律载，谋反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等语，此案朱洪祚(即周金安)，听信徐小满妖言，辄敢起意改姓惑众，谋为不轨，复敢纠结匪党，袭取城池，实属罪大恶极，自应按律问拟。朱洪祚(即周金安)，应如该司等所拟，合依谋反大逆，但共谋者不分首从，皆凌迟处死律拟凌迟处死。该犯情罪重大，未便稽诛。臣于审明后，当即恭请王命飭委署臣标中军参将李景昌、贵阳府知府汪元庆，将该犯押赴市曹，于处决后，传首犯事地方，悬竿示众，以昭炯戒。该犯讯无父母兄弟妻子，亦无家产，毋庸查办。其在威宁、绥阳、桐梓一带潜匿纠匪，各该地方官始虽失于觉察，及该犯败露后，即选派丁役，认真查缉协获，尚知愧奋，请免置议。逃犯姚方二等飭缉获日另结。

再，该犯朱洪祚于谋逆后，竟逃避深



三湘英烈传

山，几被漏网。该副将蒋柏胜等不避艰险，设法擒获，得净根株，实为异常出力。豪勇巴图鲁候补副将蒋柏胜，合无仰恳天恩，赏换清字勇号，并加总兵衔。其随带出力之武生李培基等十名，容臣酌给外奖以把总六品顶戴，分别咨部注册，以示激励。

除全案供招咨部外，谨会同云贵督臣刘长佑恭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这两篇奏稿记述了湖南人朱洪祚（本名周金波），于光绪五年到光绪七年（1879—1881），在绥阳黄村坝和桐梓县组织农民起义，欲先攻占桐梓城，再取遵义、绥阳、正安等城池，结果功败垂成，起义失败，朱洪祚等人被凌迟处死的全过程。

另外，在民国《绥阳县志》中载有一篇《岳春山之乱》，也是关于朱洪祚起义的内容，全文如下：

光绪六年（庚辰）秋八月，桐梓县岳春山谋乱，寻剿平之。

桐邑川东坝老厂岳春山，素充哥老，光绪庚辰年二月朔，游郊外，见一人卧地呻吟，就问之云：“不食数日矣，但得救我者，必有以报不负也。”扶起谛视，其人魁梧奇伟，殆所谓耳垂肩，手过膝者，心异之，扶持维谨，不敢慢，既谓岳曰：“相逢非偶，尔福命已至，如相信，可约集同志，夜至黑壳洞中会议大事。”岳如约往。比至见灯烛辉煌，几案陈设，其人金冠龙袍，俨如王者。岳等惊喜，相率展拜已，其人曰：“我日间所以如彼者，特试汝心耳。时会已至，尔等作速招兵买马，克日举事。此间粮、饷、器、械俱备，尽可勿虑。”遂导至深处，见金、谷充溢，兵书、宝剑之类，无所不具，群以为真主果出矣。于是传知远近，两月间聚党数千，约四月十八夜破县城。先遣七十余人、日间入城，各以红、黑宝六门摊青龙千之宝之类，分摆各街，诡谋内应。县署查知其异，会汛署闭城，尽捉之。是夜大雨，后至者方抵距城十里之袁田坝，闻警

遁去。其在城内应之赵平川并和尚一人，亦被查获。知县魏学恒飞禀上宪，飭与绥阳县李钟杰会同查办。时新站武举王作清获贼盟单，内多绥阳人，随带团丁，一路侦至黄村坝，呈交李令。因而两县齐至宽坝，住十余日，获党多人，就地戮之；并获伪元帅田洪山及岳，解省正法，其事遂靖。查岳党肇衅时，耗费数千金，皆由洞中携出迨事发再往，则人物俱渺矣。妖耶？狐耶？古云：“妖由人兴，亦虫人灭”。岳党谋乱不成，徒遭显戮，宁非素来作孽，有以召之欤？

朱洪祚等人的起义，是太平天国运动和贵州张秀眉、姜应芳领导的苗民大起义的继续，反应出了当时各种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官僚地主对广大人民残暴统治，人民不堪忍受，愤而揭竿起义的社会现实。朱洪祚等人的壮举无疑是一种革命行为，但因为三篇文章的作者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以镇压者的观点来写的，所以将朱洪祚等农民起义领袖极尽能事地进行了妖魔化。我们今天当站在客观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分析起义原因，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三湘英烈”血沃黔北，朱洪祚（周金波）的血没有白流，在他被凌迟处死20年后，腐朽的满清政府终于被革命的巨浪冲毁了。文

（作者单位：绥阳县委宣传部）

参考文献：

- [1] 湖南省革命烈士传编纂委员会.三湘英烈传(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卷[M].朱洪祚传.北京.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1: 158-159
- [2] 桑兵.六编清代稿钞本(第二八七册)[M].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341-345
- [3] (清)岑毓英.岑襄勤公奏稿[M].影印本.桂学文库//广西历史文献集成.潘琦主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1785-1788
- [4] 胡仁、李培枝.民国绥阳县志[M].中国地方志集成//贵州编(36).成都.巴蜀书社.2006: 395